古巴革命中的三位华裔将军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

[美] 玛丽－爱丽丝·沃特斯 编著 / 王路沙 译 / 王平 校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译者简介

王路沙，男，1980 年出生于内蒙古，曾就读于荷兰大学国际工商管理专业，现在内蒙古电视台任栏目编导。

序 言

玛丽-爱丽丝·沃特斯

阿曼多•蔡（Armando Choy）、古斯塔沃•崔（Gustavo Chui）和莫伊塞斯•邵黄（Moisés Sío Wong），三位华裔古巴青年，经过地下斗争和1956～1958年的革命战争洗礼，逐渐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正是这场战争推翻了美国支持下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打开了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他们一生中的革命事迹，使他们成为古巴革命军中的将军。通过他们在本书中为我们讲述的关于古巴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到是什么使古巴获得了新生，并为我们开创了新纪元。

我们看到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些统治者视而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拒绝接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生活，为了他们的梦想走上历史舞台，改变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自己获得了全新的自我。

玛丽-爱丽丝•沃特斯：探路者出版社主席，马克思政治理论杂志《新国际主义》编辑。她曾编写了数十本有关古巴的访谈、著作和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讲话。

最初是哈里•比耶加斯（Harry Villegas）发起建议出版此书的。他本人是古巴革命军准将和古巴革命英雄。比耶加斯现在是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民族理事会执

行副主席，国际上称他为“磅礴”（Pombo），这个名字是古巴-阿根廷革命领袖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于1965年给他起的，那时他们一起在刚果，之后的两年他也和格瓦拉参加了在玻利维亚的反帝国主义战斗。

2002年2月，探路者刚刚编辑完成了维克托•德雷克（Victor Dreke）的作品《从埃斯坎布拉伊到刚果：在古巴革命的漩流中》。书中有关古巴中部前拉斯比亚斯省鼓舞人心的人物和有关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的描写，使本书备受哈瓦那国际书市的欢迎。当时我们还准备了两部有关古巴革命和其在国际上地位的书：一部是托马斯•蒂兹（Tomás Diez）的《1962年10月：古巴眼中的导弹危机》；另一部是《战争中的玛利亚纳》，是关于古巴高级女军官迪特•普玻拉（Tetè Duebla）准将和古巴革命战争中玛利亚纳•格拉哈勒斯（Mariana Grajales）妇女排的故事。

一天早晨，人们邀请我们来到国家战士协会总部，把我们介绍给阿曼多•蔡、古斯塔沃•崔和莫伊塞斯•邵黄，《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一书的构思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

这三位华裔古巴人，他们年龄相仿，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生活在古巴不同的地区，每个人都循着各自的

人生轨道，走进共同的革命事业当中。他们将自己献给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巴蒂斯塔专制政党，反对帝国主义对北方的猛烈攻击，保卫古巴的主权与独立。

根据有关记载，中国移民在古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迹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人数上讲在古巴的中国移民比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国移民都多，甚至包括美国在内。事实上，成千上万最初到美国西部修建铁路的华工，后来为寻求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移民到了古巴。

数万名中国农民被贩卖到古巴——他们被迫服役、他们到古巴的死亡之旅、他们在甘蔗园替代非洲奴隶的契约劳动合同；他们的反抗、斗争和关于他们在1868～1898年间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独立战争中的纪录，所有这一切都在本书中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是一个在古巴以外鲜为人知的故事。

然而，这不单单是一部历史，这是今天古巴革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1959年前对华人和黑人的种族压迫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政府结束对华裔古巴人的歧视和解决遗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一切使华裔古巴人在今天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待遇。正如邵黄所说，反对种族歧视最大的措施就是“革命”。

“古巴的华人社区有别于秘鲁、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他强调说，“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革命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还不是故事的结束，而只是开始。古巴的劳动人民开始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勇于面对资本特权的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特权控制着强大的影响全球的帝国主义势力。从此古巴劳动者和古巴政府成为那些寻求如何改变生活和如何取得胜利的人们的灯塔与联盟。

多年来，蔡、崔和邵黄在革命军队和政府中肩负着许多方面的工作，作为古巴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参与了古巴在海外的国际主义任务，并且表现得十分出色。

“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蔡解释说，“古巴的革命者应该寻求为了居住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或仅仅是古巴民族的利益。”

1975～1988年，他们三人于不同时期在安哥拉工作过。那时，应安哥拉政府的请求，他们前去帮助刚刚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安哥拉人民，打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南非雇佣军武装力量对安哥拉的入侵。

崔协助在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建立古巴国际主义军事援助使团，1986～1992年，蔡任古巴驻佛得角大使。邵黄，作为古中友好协会的主席，协助委内瑞拉的劳动者扩大小型城市农业。

还要讲讲古巴在安哥拉16年的国际主义使命，因为

即使在古巴，也没有对此内容的广泛深入报道。这里三位将军提供的第一手经历和评价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南非历史上的那段重要时期，这些资料你不可能在古巴以外得到。附录里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88年12月的演讲、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ala）和卡斯特罗1991年7月在古巴马坦萨斯的讲话节录充实了本书的内容。书中有力地展现了1988年3月古巴－安哥拉军队在奎托夸纳瓦累重挫南非雇佣军的战役，此战役对非洲和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的书名是由崔将军提议的，他以革命的观点，从书中三位主人公不断增加的工作任务中捕捉到这个书名。在书的最后一部分，“特殊时期和以后的日子”中他们展望了未来。

今天，蔡将军领导了清理哈瓦那海湾、改进哈瓦那港的基础设施的项目，这是一个大规模、多方面、为期很长的项目。哈瓦那港的进口量约占古巴的70%，出口量约占古巴的90%，这还不包括糖和镍的出口。这是古巴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项目。

邵黄将军还在继续负责他20年前的工作，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这项任务不仅决定着当前古巴的军事防御，也决定着古巴政府面临自然灾害时能否采取有效措施。例如，袭击本岛的丹尼斯飓风和威尔玛飓风，政府

及时为人民提供了救援物资和各方面帮助，在这方面古巴政府与美国资本主义政府完全不同。

从1990年起，崔将军就承担着建立和领导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的责任，今天这个组织有30多万具有10年以上经验的革命骨干力量，其中包括反对巴蒂斯塔暴君的起义军、地下斗争的骨干和那些在世界各地完成国际使命的青年医生和教师，以及“古巴革命五英雄”（这5个人被诬陷阴谋从事间谍和谋杀活动，目前在美国联邦监狱服刑）。这一组织对影响每所学校和地区的政治教育计划负责。

这三位将军都清楚地表明，古巴人民的将来是由古巴的劳动人民决定的。

■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一书已经出版发行了将近4年，有英文和西班牙文两个文本，是根据2002～2004年一些集体和个人的访谈组成，2005年2～8月完成。为准备此书的出版，我们尽可能地改正那些难以避免的时间和细节上的错误。例如，在开始时，邵黄也和蔡与崔一样，只是保留着古巴革命军的军官身份，当我们在2005年8月中旬和他进行最后一次访谈时，他已经被召回到工作岗位上。在4年的时间里，蔡竭尽全力指导清理、维护和发展哈瓦那海湾，那里除了2001年米歇尔飓风所造成的破坏还有许多其他的飓风，如伊万飓风、查利飓风和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丹尼斯飓风所造成的破坏。

最重要的是这4年里国际敌对阶级日渐猛烈的斗争打开了世界政治的新局面。在华盛顿率领下，美国统治者及其同盟军打着“全球反恐主义”和军事活动“改革”的旗号，从中东到太平洋，从非洲到欧洲以至北美步步为营继续加速其帝国主义的政治攻势。国内外劳动人民在对待主战派和资本大亨的尖锐攻势时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

在我们这里，战斗着的委内瑞拉劳动者所面临和需要战胜的挑战改变了政治平衡。当面对不可避免的来自帝国的侵略时，战斗在前线的古巴人民、委内瑞拉人民乃至整个美洲人民，大大提高了帝国主义为此付出的代价。

■

阿林•霍金斯（Arrin Hawkins）、马丁•考贝尔（Martin Koppel）、路易斯•马德利德（Luis Madrid）和麦克尔•泰伯（Michael Taber）他们每个人都一次或多次参加了形成本书的访谈。麦克尔•泰伯指导将此书译成英文，并编写了汇编、注释和索引。路易斯•马德利德负责西班牙文手稿。这两本书得以出版，是世界各地200多名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本书印刷过程中，他们从整理最初的译本、构图、校对、为印刷准备数码文档直至最后定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哈瓦那“何塞•马蒂”国家藏书馆，

包括馆长伊利亚德斯•阿科斯塔（Eliades Acosta），副馆长特里斯塔•莫拉莱斯（Teresita Moraks）和高级图书管理员丽西亚•普利托（Lisia Prieto），她负责图书馆有关古巴华裔移民资料的档案。此外还有馆员们插入和复制的那些图片，更使本书增加了活力。

其他历史照片和图片得到了格拉玛的德尔分•西奎斯（Delfin Xiqués）、波希米亚的曼纽尔•马提尼斯（Manuel Martínez），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密尔顿•齐（Milton Chee）的帮助以及蔡、崔、邵黄将军个人的帮助。

埃尔达•阿古里丘（Iradida Aguirrechu），作为古巴共产党出版社政治编辑部时事编辑，她参加了所有阶段的会谈。若没有她的决心、勤奋、精确和对细节的注意，本书亦不能出版。

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阿曼多•蔡、古斯塔沃•崔和莫伊塞斯•邵黄将军在访谈中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从而使本书得以出版。

我们确信那些为此献身的人们必以感谢的心接受这样的观点：战斗着的新一代人，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者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榜样。

2005年11月

Cuba
HAVANA
MATANZAS
GUANAJAY
HAVANA
PINAR DEL RÍO
MATANZAS
BAY OF PIGS
CIENFUEGOS
SAGUA LA GRANDE
REMEDIOS
SANTA CLARA
CABAIGUÁN
SANCTI SPÍRITUS
CIEGO DE ÁVILA
PLAYA GIRÓN
JUAGUA
CIENFUEGOS
NUEVA GERONA
ISLE OF YOUTH
CAMAGÜEY
VICTORIA DE LAS TUNAS
LAS TUNAS
HOLGUÍN
MOA
MAYARÍ
BAYAMO
MANZANILLO
YARA
PALMA SORIANO
GRANMA
GUANTÁNAMO
U.S. NAVAL BASE
SANTIAGO DE CUBA
0 50 100 miles

United States
ATLANTIC OCEAN
GULF OF MEXICO
Bahamas
Cuba
Puerto Rico
Haiti
Jamaica
Dominican Republic
Mexico
Belize
Honduras
Guatemala
El Salvador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Costa Rica
PACIFIC OCEAN
Panama
Colombia
Venezuela

目　录

三将军简介 …… 1
阿曼多·蔡 …… 3
古斯塔沃·崔 …… 7
莫伊塞斯·邵黄 …… 11
“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人在古巴 …… 13
三次革命 …… 15
阿曼多·蔡 …… 15
投身革命斗争 …… 18
拿起武器 …… 23
古斯塔沃·崔 …… 26
“七·二六运动”骨干 …… 30
莫伊塞斯·邵黄 …… 32
参加革命运动 …… 36
起义军一员 …… 39
秘密任务 …… 42
在切·格瓦拉的纵队 …… 45

中国人在古巴 54
独立之战 58
华人社区的建立 65
对华人的歧视 69
华人内部的阶级划分 71
1959年后 74
古巴的事例 77
加强革命 80
1975～1991年古巴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使命 82
奎托夸纳瓦累战役 88
领袖们的榜样力量 91
古巴的战略使命 96
与南非的谈判 98
整个古巴都是安哥拉的后盾 101
非洲历史的转折点 104
安哥拉巩固了古巴革命 106
全民战争 112
“没有储备的领导就不是好领导” 175
特殊时期和以后的日子 181
面临食品危机 183
“特殊时期”的开始 186

有机菜园的建立..... 188
运动的发展阶段..... 194
城镇农业体制的组成部分..... 196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环境..... 200
哈瓦那港..... 205
古巴、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 208
古巴的合作..... 211
城乡农业项目..... 215
保卫委内瑞拉，保卫古巴..... 217
意识形态斗争..... 222

附　录

奎托夸纳瓦累：为了全非洲的胜利..... 229
附录一　尽我们所有资助安哥拉
菲德尔·卡斯特罗..... 230
附录二　对非洲人民自由运动史无前例的贡献
纳尔逊·曼德拉..... 240
附录三　给我们国际主义战士的最高赞赏
菲德尔·卡斯特罗..... 245
附录四　个人、组织、事件汇编..... 250
译者后记..... 279

三将军简介

2004年2月接受访谈时的阿曼多·蔡。

革命胜利后第一个月，作为革命法庭成员，阿曼多·蔡（左）在审判巴蒂斯塔统治集团战犯，与米盖尔·杜奎（Miguel Deque Estrada）上尉（中）和维克托·博尔东（Victor Bordón）司令官（右）。

1991年任佛得角大使时的阿曼多·蔡。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阿曼多·蔡

1934年，阿曼多·蔡·罗德里格斯出生于拉斯比亚斯省福门托。14岁时同家人迁居至圣克拉拉市。[1]

在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952年军事政变之后，蔡参加了反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组织“青春家园”（Young Homeland）。他是1955年“七·二六运动”[2]的发起人之一。1958年初，蔡成为拉斯比亚斯省“学生先锋”的领袖并领导了该省的地下学生运动。1958年4月9日，蔡带领一批革命武装力量参加了当日爆发的古巴全国大罢工。因为革命活动，蔡曾先后6次被巴蒂斯塔独裁政府逮捕并监禁。

1958年5月，蔡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Escambray Mountains）参加了由维克托·博尔东（Victor Bordon）司令官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游击队。当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Rebel Army）第八纵队于当年10月抵达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后，博尔东的部队加入了起义军。同年12月26日，格瓦拉授予阿曼多·蔡上尉军衔，当时起义军中位列第三的军衔。

---

[1] 1976年以前，古巴分为2个区，后全岛被重新划分为14个省和一个特区，拉斯比亚斯是古巴一个历史省份。其境内是古巴现个省的西恩富戈斯、圣基皮里图斯和比亚克拉三省。福门托位于现圣斯皮里图斯省。

[2] “七·二六运动”——为了纪念1953年7月26日的反巴蒂斯塔武装起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与者于1955年6月建立的革命组织。详情见汇编部分。——译者注

1959年1月1日，独裁政府被推翻后，蔡参与了革命法庭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战犯的审判。1959年中旬，当3支起义军分别在古巴中部、东部和西部建立时，蔡被任命为中央战略军步兵团副团长。1960年他领导了拉斯比亚斯省民族革命民兵部队，协助组织那里的对反革命武装势力的斗争。

1961年初，蔡成为刚刚组建的中央军在职人员事务主管。1961年4月，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反革命雇佣军在古巴猪湾登陆，对革命政府发动突袭，蔡指挥的圣斯皮里图斯省第345陆军营参加了这次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战斗持续72小时后，雇佣军在吉隆滩（Playa Giron）被歼灭。同年末，蔡被指任组建并指挥圣斯皮里图斯及特立尼达地区的陆军师，这两支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的对反革命武装的战争。

1962年12月蔡升任为司令官，1963年4月他被调至革命空军防空防御部（Anti-Aircraft Defense and Revolutionary Air Force，简称DAAFAR），成为西部防空部队的指挥官。1973年蔡被任命为防空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和革命空军防空防御部的副司令官。1976年11月蔡荣升为空军准将（Brigadier General）。

1980～1981年，蔡参加了古巴对安哥拉国际主义军事支援行动，返回古巴后至1986年12月，他一直在革命空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军防空防御部领导层服役。1986年12月被任命为古巴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直至1992年卸任。

蔡现任国家劳动部“清理、维护和发展哈瓦那湾工作组”的主席。他负责哈瓦那港的管理，在哈瓦那港代表运输部长行使权力。

1992年蔡从“革命武装力量”退役，他是古巴共产党的发起者之一，同时也是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ombatant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的成员。

2004年2月接受访谈时的古斯塔沃·崔。

1987年12月，古斯塔沃·崔在安哥拉对部队士兵讲话。

1980年崔在升为陆军准将（左一）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右一）在一起，中间是弗朗西斯科·卡布里拉（Francisco Cobrera）上将和林德尔·卡尔扎迪拉（Linder Colzadilla）准将。

没有一个华人是饭桶

古斯塔沃·崔

古斯塔沃·崔·巴尔特兰1938年生于古巴圣地亚哥市，16岁参加革命。在圣地亚哥革命战争第一阶段，他在“七·二六运动”城市地下活动中十分活跃。

1958年春，他来到马埃斯特腊（Sierra Maestra）山区，参加了起义军并成为吉尔耶莫·加西亚（Guillermo Garcia）指挥的第三纵队中的一名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期间，崔参加过多场战斗。

1959年1月革命胜利几天后，崔被分派到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Juan Almeida Bosque）司令指挥的驻扎在哈瓦那郊区的马那瓜军营。在那里他先后被分配到一个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连服役。1959年他被派往比利时学习陆军军械。1960年9月回国后，他成为马那瓜军营战略物资部（Department of War Materiel at Camp Managua）的一名工程师，之后他主管革命军空军（Revolutionary Air Force）的军械工作。

1961年4月他被任命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司令手下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军械长官。在这期间，他负责武装民兵以及武装其他与反革命武装交锋的部队，同时期他也在猪湾直接参加了对抗反革命势力的战斗。

1962年崔成为西部军军械首脑。1965年他成为“革命武装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军械代理处的第二负责人。1968年他成为“革命武装力量”装备处（Armaments Directorate）的第一负责人。

1971年9月他被分派到负责国际任务的“革命武装力量”第十行政处作第二负责人。1975年12月劳尔•地亚斯•阿尔戈拉斯（Raúl Diaz Argüelles）在安哥拉阵亡后，崔成为“革命武装力量”十行政处的第一负责人。同时期他被派往“革命武装力量”特种指挥所（Minist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Special Command Post）担任领导工作，在古巴支援安哥拉的国际任务中，他协助总指挥官菲德尔•卡斯特罗及“革命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之后在埃塞俄比亚设立古巴军事委员会的任务中崔担任副总指挥。他也在莫桑比克及尼加拉瓜帮助当地政府建立古巴军事委员会。

1981年起崔担任“革命武装力量”干部处（Cadres Directorate）领导，负责部队人士流动以及维持部队的军令结构，确保军令的准确、及时、畅通。

1983～1986年，崔担任革命军空军部参谋部副参谋长。

1986年崔被派往安哥拉担任副总参谋长。1987年12月份他被任命为驻扎在马兰热省的第90坦克旅总指挥。1988年3月，在安哥拉北部执行任务时，他乘坐的坦克车

压到反坦克地雷，他被炸伤，不幸丧失了一条腿。

1990年初，当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1993年成为正式国家机构）在比那尔德里奥省作为试点项目设立的时候，崔负责在协会领导层的财务供应部担任领导。

1998年崔退役。

他是古巴共产党的发起者之一。

2005年8月接受访谈时的邵黄。

1959年1月，邵黄时任起义军第八纵队的成员。

1996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卡洛斯·拉格（Carlos Lage）（中）在一起。

莫伊塞斯·邵黄

莫伊塞斯·邵黄1938年生于马坦萨斯省。1947年邵黄同其家人迁居哈瓦那。在中学时邵黄就参加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斗争，并积极参与各种示威游行。1955年“七·二六运动”建立后不久，邵黄便成为其中一员，在赫拉尔多·阿布鲁·冯堂（Gerardo Abreu Fontán）指挥官手下领导哈瓦那第一青年突击队。

1957年邵黄参加了在马埃斯特腊的起义军野战排（Command Post Platoon）第一纵队，直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1958年他参加了粉碎巴蒂斯塔军对马埃斯特腊山区发起的总围剿的战斗。同年8月他被分派到由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领导的第八纵队，并随第八纵队由马埃斯特腊山向拉斯比亚斯省进发。

1959年革命胜利之后，邵黄晋升为中尉并成为起义军军警（Rebel Army's Military Police）创立者之一。在1961年4月抵抗流亡政府入侵猪湾的战役中，邵黄是格瓦拉指挥的比那尔德里奥第七步兵师首领。之后他成为西部军的创立者之一，并成为西部军首位军事行动长官，同时他在革命空军防空防御部负责中央师空防及空军事务。1965年邵黄被任命为“革命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

斯特罗的助手，并在此职务上工作7年。

1976年在古巴国际军事援助安哥拉的任务中，邵黄负责部队的后勤。同年11月他荣升准将。1982～1985年期间邵黄担任“革命武装力量”干部处领导，负责部队将士的调派以及维持部队军令构架。

1986年至今，邵黄一直担任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e Reserves）局长。1987～1988年，他负责组织古巴援助安哥拉的后勤工作。

作为古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邵黄还是古中友好协会主席。同时作为古巴人权国民议会和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邵黄还是古中友谊议会集团主席。20世纪90年代，他倡导了城区小规模农业计划，如今城区小型农业已经遍布古巴。从2003年起他作为参赞帮助委内瑞拉进行城区小型农业规划。

邵黄于1998年退役，又于2005年恢复工作。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人在古巴

1960年9月古巴华侨“新民主同盟”成员在哈瓦那集会，反对美国联合拉美政府共同封锁古巴的企图。这次反对华盛顿的集会被称为“哈瓦那第一次声明”，旗帜上写着：“华侨支持古巴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

三次革命

爱丽丝•沃特斯：20世纪50年代末，您和您的战友们作为那个年代的青年投身推翻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您和您的战友们不但转变成革命者并用自己的力量捍卫了“美洲第一自由领土”。

我想请问，您和您的战友们是怎样成为革命骨干的？您和您的战友们生长的革命前的古巴是什么样子？由于您和您的战友们的华裔血统，您和您的战友们都遭到过怎样的歧视？您和您的战友们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运动？

阿曼多•蔡

阿曼多•蔡•罗德里格斯：1934年我出生于拉斯比亚斯省的福门托，我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儿。福门托地区的矿藏丰富，农业发达；当地家畜养殖也很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被送往城市屠宰场；另外那儿还有铜矿和两个糖厂。在当时的古巴算得上是最富有的地区了，甚至到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古巴主要的咖啡及烟草生产地。

福门托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社区，其中一部分华人对当

地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并拥有一部分产业。比如福门托棒球场就属于我祖父和他的一位中国合作伙伴，另外我祖父自己还拥有很多房产和店铺。1959年后，古巴国家经济改革直接影响了我祖父的私人财产，他便离开古巴到美国去了。

我父亲出生在中国，1918年随他的叔父来到古巴。他的叔父是一位富有的中国商人，在哈瓦那省的巴鲁斯拥有一家店铺。

我父亲跟其他中国移民有些不同：他曾经从古巴返回中国，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古巴。当时中国移民很少有人能支付起昂贵的船票，从这一点也能说明，如果当时不是他叔父很富有的话，我父亲是没有经济能力回中国的。

小时候在家里我们只说西班牙文，当时我父亲曾跟我说："除非学校教你们，你不用学习中文。"

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古巴妇女，她是古巴人民党（亦称"正统党"，Orthodox Party）领袖埃都阿尔多·奇瓦斯（Eduardo Chibás）的忠实追随者。同样，我父亲也很崇拜奇瓦斯。20世纪40年代，每个周末晚上8点我父亲都会收听奇瓦斯的广播。因此我家里对我从事革命事业是不反对的。在我决定上山参加革命的时候，我母亲并没有阻拦我，她只是对我说了一句话，"当心点儿。"

当时在福门托只有小学教育机构，孩子们只能上到六年级。为了能够让我继续上学，1948年我14岁的时候，父母举家移居到当时拉斯比亚斯省的省会圣克拉拉。今天圣斯皮里图斯、西恩富戈斯、比亚克拉拉三省就是当年的拉斯比亚斯省。

马丁•考贝尔：那时候您父母是做什么的？

蔡：家父是一个零售商，一开始他有一个杂货店。后来他代表不同的进口公司做旅行推销员。当我们搬到圣克拉拉后，他又开了一家小百货店。

从那时起我白天在父亲店里帮忙，晚上就去圣克拉拉的工商学校学习会计。这样的生活我过了5年。其实我对会计毫无兴趣，那时候我真正想学的是历史，但家父考虑到他的生意还是让我选择了会计。

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中午，一个男人走进我家商店，眼中挂着泪水，因为他总是从我家店门口经过，所以我一眼便认出了他。他不是在做戏，他请求我赊给他1磅玉米粉[1]，这1磅玉米粉将成为他、他老婆和他两个孩子一天唯一的正餐，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父亲看到后对我说："他不会还你这1磅玉米粉钱的。"

[1] 类似于我国的玉米面糊糊，拉丁美洲最常见的主食。——译者注

我说："无所谓。"

你知道当时1磅玉米粉多少钱吗？7分！那个人连7分钱都没有！

另一件事情也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圣克拉拉回福门托度假。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在福门托，他家条件很不错，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白种人。他交了一个双亲都是西班牙裔的女友。一天晚上我和他俩去西班牙居民区附近参加一个派对，当时在古巴每个城镇都有西班牙居民区，我朋友要我一起去跳舞，我对跳舞没兴趣，就在一边儿呆着看。但他俩还没等进舞池就让人赶出来，因为我朋友是华人，而那个舞会是只有白人才可以参加的了。这样的歧视让我深深意识到革命胜利前古巴社会的不公。

投身革命斗争

沃特斯：您是何时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的？

蔡：1952年3月10日，就在巴蒂斯塔发动政变的那一天，那时候我还在圣克拉拉念书。

我反对政变，并马上加入到反巴蒂斯塔组织中。这些都发生在卡斯特罗攻打蒙达卡兵营前[1]。当时在圣

克拉拉有两支革命组织。一支是由奥斯瓦尔多•埃雷拉（Osvaldo Herrera）领导的“公民宪法”（Accion Civica Constitutional）。另一支是由本尼诺•皮内罗（Benig no Pineiro）领导的“青春家园”，我当时加入了“青春家园”，然而本尼诺最后背叛了革命。

在1953年7月26日那天我就宣称自己是菲德尔主义者，当那天广播中说菲德尔攻打蒙达卡兵营时，我就说：“这正是我们推翻独裁政府所需要的领袖！”

1955年一位圣地亚哥“七•二六运动”的领袖从弗兰克•派斯（Frank Pais）来到圣克拉拉建立组织。虽然我没有见到那位领袖，但是正是从那一时起，包括我在内的大批青年加入到刚刚在城市中组建的“七•二六运动”中。当时“七•二六运动”在我们那儿的领袖是昆汀•皮诺•马查多（Quintin Pino Machado）。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最后和我们一起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者。

当时我是一名学运领袖，主要组织并参与学生运动、示威游行、罢工等各种反独裁运动。因此我被当时的政府多次抓进监狱。

阿林•霍金斯：为什么？

蔡：自从我加入“七•二六运动”以后，我就变得越来越倾向于行动派。一开始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事儿，比如

❶ 攻打蒙达卡兵营和其他历史事件的数字见汇编部分。

说在墙上写反巴蒂斯塔独裁的标语和参加示威游行。一开始这些游行都比较平和，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政治局势的发展，最后游行总是以暴力对抗警察以及“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收场。同样我也参与破坏活动，一般使用“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和巴西手雷（Brazilian grena-des[1]），尽管那些手雷从来都没有爆炸过。

因为以上这种种起义行为，他们6次把我送进监狱。另外还有两次我在被递交“紧急法庭”[2]（Urgency Court）前被提审，后被宣判无罪释放。

1958年初至4月9日，我成为拉斯比亚斯省“七•二六运动”学生先锋的首领，同时还负责领导两支破坏别动队。

沃特斯：在1958年4月9日这一天，“七•二六运动”策划了反独裁全国大罢工[3]。然而这次罢工运动以全面失败告终。在这一天圣克拉拉究竟发生了什么？您又在做什么？

蔡：那天早晨很多队青年工人和学生在等待组织来发放武器，组织约定以牧羊姑娘教堂（La Pastora

[1] 自制燃烧弹的一种。——译者注
[2] 见汇编，紧急法庭（Urgent Courts）。
[3] 见汇编，4月9日总罢工。“七•二六运动”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记述了有关4月9日的事件，参考阿曼多•哈特的《古巴地下革命工作内情》（1952～1958）（探路者，2004）。在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古巴革命战争片段》（1956～1958）“决定性的会议”（探路者，1996）一章中，记录了4月9日罢工后重组“七•二六运动”的有关事件。

Church）的钟声作为出动信号，当上午11时钟声敲响时，我们便冲到街上支持罢工。可实际上只有我领导的工商高校学生和康达多区（Condado barrio）的队伍有枪。他们有莱福枪，而我们只有4把手枪。

我们的同志本该去敲响教堂的钟，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却一直没去。康达多地区的队伍和我们在牧羊姑娘区的队伍在没有收到信号的情况下冲上了街头。在与独裁政府军和警察的战斗中，康达多地区的队伍作战很勇猛。安东尼奥•奥卡尔•希梅内斯（Antonio Aucar Jimenez），戴维德•迪亚兹•瓜达拉玛（David Diaz Guadarrama），埃克托•马丁内斯•瓦亚德雷斯（Hector Martinez Valladares）这些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天爱德瓦尔多•加西亚（Eduardo Bayoya Garcia）也被残暴的独裁政府党羽逮捕并杀害了。

由于没有收到起义信号，我们这一队工商高校战士所做的仅仅是让一个落单的警察缴械。

现在想来那天我们同志没有敲响教堂的钟声还真是万幸，不然的话我们只有5把猎枪，4把手枪，再算上从警察身上缴获的左轮枪，我们就拿这点儿装备跟政府军打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当然那时候自己年轻，并没有想这么多。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转入了地下斗争。

4月底组织将我转移到了西恩富戈斯城（Cienfuegos）。去西恩富戈斯城之前我在圣克拉拉躲避政府军追捕，组织告诉我阿莱伊达•马奇（Aleida Mardi）会在特定的某一天来见我。阿莱伊达•马奇是革命武装游击战的出色战士，后来她嫁给了格瓦拉。罢工失败后，我们都成了地下斗争的同志。那天阿莱伊达告诉我第二天我家附近一个叫摩瑞虹（Morejon）的“七•二六运动”司机同志会来接我去西恩富戈斯城。在摩瑞虹车上另外还有两个去西恩富戈斯的从大萨瓜来的同志。一个叫维克托•德雷克[1]；还有一个叫卡利多，他的弟弟在萨瓜被杀害了。卡利多是一个胆小鬼，后来背叛了革命。德雷克却是个很不错的战士。

到达西恩富戈斯后，我们在一家诊所中伪装成病人。其中一位叫维克托的革命者护士给我起了一个新名字——阿曼多•庇。

“为什么给我一个西班牙姓？”我当时就问他，“给我一个中文姓，这样大家才知道我是谁。”

“你想想，如果敌人知道你是谁，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干掉的。”维克托说，“所以，还是保留我们给你的名字吧。”

到达西恩富戈斯之后，我就上山加入了游击队。

[1] 更多有关德雷克自己的描述，参考《从埃斯坎布拉伊到刚果：在古巴革命的旋风里》（探路者，2002）。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拿起武器

考贝尔：您上山后又发生了什么？

蔡：5月9日这一天我成为了埃斯坎布拉伊山区（Escambray Mountains）“七•二六运动”游击队的一员。当时，这支队伍刚刚组建，由维克托•博尔东（Victor Bordon）指挥官领导。我是第19个加入游击队的成员。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在8月的时候博尔东提升我为上尉。

我们这一支拉斯比亚斯的游击队伍在现存关于“七•二六运动”的记载中记录甚少。1958年10月在与格瓦拉司令的第八纵队合并前，我们一共和政府军打过6次。我的第一把全自动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obal）来福枪就是我在曼杜鲁（Mandulo）地区（现西恩富戈斯省内）的一次突袭战中缴获的。

在此期间我们和埃斯坎布拉伊山区（Escambray Mountains）的一个名为“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民族阵线”（Second National Front of the Escambray）的组织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摩擦，该组织出卖并分裂“革命指导党”（Revolutionary Directorate）。这个组织的大部分士兵其实还可以，主要是他们的长官都是土匪。1959年革命事

业胜利后，这个组织彻底转变成反革命武装。最后，事实证明这个组织是帝国主义武装。

1958年10月，我们收到了向东行进的命令，我们必须穿过山脉，与从马埃斯特腊山区[1]艰难赶来的切[2]的部队会合。我们向东行进了两天。一开始我们认为会与“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民族阵线”（Second National Front of the Escambray）遭遇，所以我们整个的行动都很隐秘。幸运的是这次并没有发生遭遇战，毕竟两支革命队伍间发生战斗是痛苦的也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当时这支先遣队是由埃德伯雷特•冈萨雷斯（Edelberto Gonzalez）上校领导的65名战士，我在其中担任副指挥官。

当我们到达拉斯皮纳斯（Las Pinas）地区以后，切给我们发表了讲话。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联合军事行动。

12月份，切提升我为上校，并分派给我一支26人的新兵排。作为切的纵队的一员，我参加了多次帮助“起义军”解放拉斯比亚斯省的战斗，我们在圣克拉拉的战斗

---

[1] 1958年9～10月，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领导的起义军从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腊到中部的拉斯比亚斯省的进军，参考格瓦拉《古巴革命战争片段》（1956～1958）“从巴蒂斯塔最后的进攻到圣克拉拉战役”和《拉斯比亚斯战役》1958年9～10月。

[2]“切”（che）是格瓦拉的绰号，1953年12月，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支持当时左翼总统阿本兹（Arbenz），据说就是在危地马拉他得到了“切”这一绰号，从此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切”。“切”原本是西班牙语中的一个感叹词，在南美被广泛使用于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中，在阿根廷“切”为“mate，pal”之意，类似于中文中的“哥们儿”一词。——译者注

最为艰苦，一直坚持到1959年1月，巴蒂斯塔逃往国外后圣克拉拉才被解放。

之后我所在部队又被调回博尔东的纵队作为先头部队，并被重组为第二纵队，在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的指挥下向哈瓦那进发。1月2日当我们抵达曼坦扎斯（Mantanzas）后我们接管了那里的投降部队。1月3日我们抵达哈瓦那，并接受了政府军主要军营哥伦比亚军营（Camp Columbia）的投降，之后我又再次被调回切的纵队。

沃特斯：是否因为您是华裔而影响了您革命事业的发展？

蔡：不是。其实作为一个中国后裔，我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感情，我特别崇拜那片热土和那片热土所养育的无私人民和伟大英雄。然而，在革命中，我是作为一个古巴人加入到革命中的，我是从古巴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华人的立场。

当我加入“七·二六运动”，并成为学生先锋的领导时，我所领导的来自古巴各个大学的年轻人都把我当作一个古巴人对待，并接受了我的领导。在革命内部歧视是不存在的。

古斯塔沃·崔

沃特斯：崔将军，您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市长大。您和蔡将军的家庭背景一样吗？

古斯塔沃·崔：不，完全不一样。在圣地亚哥市有一个仅次于哈瓦那的中国城，那里居住了很多中国移民和中国后裔，规模相当大。

我的父亲何塞·崔（Josè chui）是中国人，而我的母亲是一位贫苦的古巴黑人，她叫希尔达·巴尔特兰（Hilda Beltran）。当我出生后不久，他们两个就产生了矛盾，主要原因是我父亲最亲密的同胞们当时存在比较严重的种族偏见，他们反对这桩婚事。特别是我父亲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他俩共同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为了剥夺母亲对我的监护权，我父亲和他的商业伙伴花钱收买了法官，并在法庭上更改了我的出生证明，将我的出生日期从1938年改为1936年。而我母亲，一个穷苦的黑人女子，没有经济实力去捍卫她的权利。因此，我一直是在我父亲的抚养下长大的。直到我母亲去世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

我的童年是在杂货店里和其他在那儿工作的华人一起度过的。大部分时间我呆在杂货店的后院儿里。一步也没

有迈出过杂货店，也从来没和任何邻居家的孩子接触过。因此那时候我只会说广东话，而不会说一句西班牙语。我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我和我母亲接触。

我住在圣地亚哥的劳斯•奥尔摩斯（Los Olmos）区，伍德将军大街（General Wood Street）从这里穿过［如今这条大街改名为雷内•拉蒙斯•拉图尔大街（Rene Ramos Latour Street）］。我家就在鲁比欧帆布鞋厂（Rubio canvas shoe factory）对面，如今这里是纺织厂。

当我5岁的时候，家里人第一次让我到杂货店外面玩儿，从那时起我开始和我同龄的小孩儿一起玩耍。但是周围的小孩儿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同样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对我说西班牙语，而我却只能用中文回答。因此所有孩子都取笑我，于是我自己就慢慢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而渐渐忘记中文。后来甚至我父亲用中文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用西班牙语回答他。

华人们都管我叫康昌[1]，因此我儿时的伙伴也这么叫我。如今在圣地亚哥很多我的老朋友仍然这样称呼我。

我父亲在古巴除我之外没有别的孩子。在来古巴前，他有几个孩子，但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的母亲与他不同，她还有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弟弟豪尔赫•路易斯（Jorge Luis），目前他住在古巴圣地亚哥市。

[1] 根据秘鲁有Conchan Beach被翻译成“康昌港”，因此此处译为康昌。——译者注

阿尔塞尼奥•孔（Arsenio Hung）是家父的主要合作伙伴，在孔叔的大家族里我是最年长的孩子，我也帮孔叔照顾他的孩子。由于父亲不断更换工作，不能经常照顾我，我曾和祖父母住过。在我儿时，我有过三个养母，这使我到现在还有一大帮干兄弟姐妹。

家父同大多数在圣地亚哥生活的华人一样，依靠零售业谋生。华人一般经营的买卖包括：小餐馆、饼屋、洗衣店、酒吧、菜摊儿等等。

家父和孔叔合资开的杂货店后来倒闭了，他们之后又在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的一个叫圣何塞•德阿瑟拉蒂洛（San Jose de Aserradero）的地方盘了一个饼屋，然而这次经营依然以失败告终。

之后在我堂兄拉斐尔•黄（Rafael Wong）的劝说下随父亲搬到了哈瓦那。我的堂兄在曼莱克街（Manrique Street）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就是现在日间托儿所的位置。之后，堂兄卖掉了糖果店，又在圣拉斐尔街（San Rafael Street）买了一家酒吧。没多久他又卖了酒吧，买下了维尔土德斯街（Virtudes Street）上的陈利宝（Chan Li Po）自助餐馆。在这期间的两年中，我一直和我堂兄的家族在一起生活，并受到芭芭丽塔（Barbarita）的照顾，她是我那个时候的养母。

在哈瓦那我就读于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

学校，之后又继续在坎普斯学校读书。这两所学校都在我父亲和堂兄居住的劳滕（Lawton）附近。

沃特斯：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您和您的生母保持过联系吗？

崔：我父亲的家族曾恐吓她并禁止她接近我，每当她想我的时候就只能偷偷躲在远处，默默地望着我。这些都是我在长大后才知道的。

1945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还住在哈瓦那。之所以我能记得这些，都是因为那时的一首儿歌，“呼呼，柏林被嘣啦，唠唠，日本被炸啦。”孔叔让家父返回圣地亚哥，因为孔叔在苏埃努（Sueno）附近又开了一家叫“古巴小妇人”（La Cubanita）的饼屋，至今这家饼屋依然存在。之后孔叔就结婚了，并生养了很多小孩儿。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最安稳的10年。

家父和孔叔后来卖掉了饼屋并又在同一地段买了另一处叫美州人（Las Americas）的饼屋。从那时起我开始到马希奥体育场对面的圣卢卡斯教会学校（San Lucas Episcopal School）学习，在那所学校我一直念到七年级。

家父和孔叔买卖饼屋可谓是相当频繁，我在圣地亚哥的很多地方都住过。现在我依然还可以指出好多饼屋是以前我家开过的，比如说索莱比区（Sorribe）的“摩登女郎”饼屋（La Moderna）；阿尔托德•肯特罗斯（Alto de

Quinteros）的“新中国”饼屋（Nueva China）。

“七•二六运动”骨干

霍金斯：是什么吸引您参加革命的？

崔：其实那时候我的家庭条件还不错，基本上没受过穷，生活也相对安逸。然而我却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身边社会和政界的动荡。

1952年独裁者巴蒂斯塔发动的军事政变，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感到震惊。在蒙达卡兵营事件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独裁政府的残忍和不公正。

1957年初，我加入了“七•二六运动”。并成为米盖尔•马利亚诺•马丁内斯•叶雷苏埃罗（Miguel Mariano Martinez Hierrezuelo）领导下的小分队中的一员。米盖尔是一位英勇的革命斗士，后来他成为起义军的一员。

一开始我只是参加各种辅助性行动和破坏行动。执行的第一次任务是帮助躲藏着的和受伤的革命者取得食物和药品。之后我开始发放传单、制作炸弹，并进行其他表达我们要推翻独裁政府决心的行动。这种类型的任务我一直执行到1958年4月9日大罢工前夕。罢工失败后，我就到马埃斯特腊山参加了由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

（Juan Almeida Bosque）司令领导的名为马里奥•幕诺斯•蒙罗依（Mario Munoz Monroy）的第三先锋队。

其实我能到马埃斯特腊山参加革命斗争还要感谢我的养母莉迪亚•云吞（Lidia Wanton），是她带我上的山。莉迪亚及他的丈夫安东尼奥•冯都是家父的朋友。他们在马埃斯特腊有一个叫“夜明星”（El Lucero）的小农场。因为他们的儿子已经到马埃斯特腊山加入了第三先锋队，她便特意到圣地亚哥来带我上山。

上山后我和恩里克•洛佩兹（Enrique Lopez）上尉一样被分配到阿妮塔兵营，并加入由伊达尔戈拉德•里瓦夫拉查（Idelgarde Rivaflecha）中尉（外号“军刀”）指挥的队伍。1958年夏季抵抗巴蒂斯塔政权进攻结束后[1]，我成为吉尔摩•加西亚（Guillermo Garcia）司令官领导的圣地亚哥第三纵队的一员。

作为第三纵队的一员，我参加了多次抵抗政府军的战斗，最有名的一次是逮捕帕尔马•索力阿诺（Palma Soriano）的战斗，正是这次战斗让我们产生了进攻圣地亚哥市的打算。1959年1月1日，在我们向圣地亚哥进军的途中，当部队走到埃斯坎德尔村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政府军投降的消息。

[1] 1958年4月9日失败后，巴蒂斯塔军队利用短暂的胜利，向马埃斯特腊派来10000人的部队，企图消灭革命军。进攻开始时罢工，5月底，起义军战士只有300人，200支可用的枪，7月底，打败了这次反攻。对这一段的描写，见《古巴革命战争片段》“从巴蒂斯塔最后的进攻到圣克拉拉战役”和《古巴地下革命工作内情》（探路者出版社）。

胜利后的当天我们成功接管了圣地亚哥市，1月1日夜，我们第一排被分派去守卫塞斯配德斯公园（Cespedes Park）。正是这一天，我们的总司令菲德尔向圣地亚哥市的全体民众宣布了古巴的独立。

之后我们随同卡斯特罗领导的“自由之车”（Liberty Caravan）向哈瓦那进军[1]。

莫伊塞斯·邵黄

沃特斯：邵黄将军，据我了解，您自幼在哈瓦那长大，您的家庭背景和崔、蔡两位将军的家庭背景是有所不同的。是这样吗？

邵黄：是的。1895年家父和他第一位妻子一同由中国大陆来到古巴。他们在中国育有一子，就是我大哥，他们来古巴的时候家父把我大哥留在中国并交给我祖父抚养。

沃特斯：他们是怎么来到古巴的？

邵黄：家父搞到些钱，买了来古巴的船票，就这么简单。他们到古巴后，就在马坦萨斯省住了下来，当时马坦萨斯有很多华人居住并形成大规模的华人社区。刚开始家父在劳斯·阿拉伯斯（Los Arabos）自治市城郊一个名叫

[1] 从1959年1月2日至1月8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胜利的起义军纵队由马埃斯特腊地区向哈瓦那进军，这次行动被称为“自由之车”。沿途经过的所有城市和地区都有大量民众自发地组织游行欢迎卡斯特罗的队伍。

圣•佩德罗•德•马亚蓬（San Pedro de Mayabon）的村庄开了一家小杂货店。

家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一共育有五子，只有大哥在中国。不久后家父的妻子去世了，家父成了鳏夫。当地农民都认为续弦是必要的，于是家父又娶了一位姓黄的女子，这便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只有15岁，当时家父与前妻的4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11岁。我母亲仅仅比他要照顾的最大的孩子大1岁。

我母亲可称得上是一位英雄母亲，她一共生了9个孩子，加上她抚养家父与前妻生的4个孩子，一共是13个孩子，我母亲真应该因此获得奖牌。当我在1938年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11个孩子了，在家里我排行第12。

我儿时的头些年是在圣•佩德罗•德•美雅宝度过的。那儿是个很小的村庄，居民大都是农民。我那时也没去上学，就在家跟我大姐安吉丽塔（Angelita）学习读书写字。我大姐上过几天学，不但教我读书还教我加减法。

当时在家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说中文，但同时我也学会了西班牙语。尽管我没有上过古巴学校，但是我周围的伙伴很少有中国人，他们都说西班牙语，久而久之由于很少使用，我便渐渐忘记了中文。

1947年，我9岁那年，父亲由于中风而残废，为了让

父亲得到更好的照顾，我们全家搬到了哈瓦那。

我记不清是1942年还是1943年，这一年我姐姐伊萨贝尔（Isabel）嫁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华人。他们的婚礼是我见过最奢华的。古巴各地的华人都纷纷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从哈瓦那来的卡车满载着啤酒、糕点、糖果和所有你能想到的好吃的，特别是七层高的婚礼蛋糕。那时我仅仅是个孩子，然而现在这些事情仍使我记忆犹新。我的这个姐夫当时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古巴的秘书，同时还是一位很富有的商人。

我姐夫在哈瓦那开了个饭店，位置就在圣•拉萨罗街和克雷斯波街（San Lazaro and Crespo Street）。当时我们所有兄弟姐妹都在他的饭店作工，他基本上不给我们付工钱。

当时最低工资是60比索一个月。我哥哥后来告诉我，我姐夫每次都作假账，让税务局认为他每月支付我们60比索。而实际上我姐夫每月最多付给我哥45个比索，有时候甚至只有30个比索。而我们这些年幼的小孩儿基本上都是给他白干。顶多有的周日他给我们两毛钱去看场电影。

我那时候还以为那个饭店是属于我哥的，实际上我姐夫才是真正的老板，他一直在利用我们全家人。

在我参加革命战争之后我意识到了这一切，一次回家的时候我跟我母亲说：“普尼托（Benito）一直在利用我们。”

而我妈妈却说：“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都是你姐夫他为家里挣钱，帮家里搞生意，给了我们大家工作的机会。”

这倒也是一种理解方式，他帮助我们家开了饭馆。但我认为，从我的观点来看，他是在剥削我们，利用我们为他赚钱。我们兄弟姐妹成天累死累活地干，而他却是最终受益人。直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是“人对人赤裸裸的剥削”。

在我们移居到哈瓦那后，我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小学。因为当时我已经会读书写字了，学校给了我个小测验，就直接让我上了三年级。暑假的时候，姐姐给我找了个家教，等开学以后我便直接升到了六年级。之后的一个假期里，这个家教又带了我一个假期，我便顺利地通过了初中的入学考试，这就是我如何能在两年中修完小学的原因。当时我家人为我更改了出生证明，让我比实际年龄大一岁。因为那时候规定只有12岁才能上中学，而我仅仅11岁。

初中的第一年是在一家私立学校念的，之后我就转到了哈瓦那中等教育学院一中（Institute of Secondary Studies No.1）。当巴蒂斯塔于1952年3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我正在这所中学念书。

参加革命运动

考贝尔：您是怎样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的？

邵黄：在古巴的革命活动中，学生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沿。1952年3月10日，军事政变当天，哈瓦那大学的学生就在年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何塞•安东尼奥•埃切韦里亚（Jose Antonio Echeverria）[1]这些古巴学运领袖带领下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从这一天起，反对独裁政府的行动便开始了。

我们学校和哈瓦那大学有直接联系，我们学校的学生运动搞得很激烈。当时我受高中学长的感染，很快就参加到了革命行列中，尽管当时我很年轻并且对政治一无所知。然而通过革命行动我们心中对社会公正失衡的不满可以得到释放。就这样我和其他一群年轻人很活跃地参加到革命行动中。

我们一开始便和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一起参加了反对独裁政府的示威游行。1953年7月26日攻打蒙达卡兵营事件之后，我们和哈瓦那大学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哈瓦那大学在古巴革命运动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1933年的革命运动中[1]，哈瓦那大学就起到了带

[1] 何塞•安东尼奥•埃切韦里亚于1957年3月13日发动进攻总统府刺杀巴蒂斯塔的行动，然而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所有突袭队成员包括埃切韦里亚本人都被独裁政府杀害。——译者注

头作用。

在7月26日之前，我们和古巴人民党（Orthodox Party，亦称“正统党”）左翼有联系。菲德尔当时就属于人民党左翼。就是从那时起，我投身于革命运动并认识了一大批革命者，如尼科•洛佩兹（Nico Lopez）和埃尼奥•莱瓦（Enio Leyva）。

当时我们一群住在庞塔（Punta）居民区的年轻人组织过一系列我们称之为“国内对话”的和革命者的谈话。每次都是尼科•洛佩兹给我们进行演讲。尼科个头很高且很消瘦，他是一名为人谦虚的贫苦工人，他参加了攻打蒙达卡兵营，并在后来的“格拉玛（Granma）号”登陆事件中遇害[1]，每次对话的内容都是有关于革命和政治的。活动地点就在哈瓦那绿树成行的步行街帕拉多（Prado）109号，人民党办公室。当时“七•二六运动”还没有诞生，菲德尔是领导人民党左翼的领袖之一，其他的领袖还包括尼科•洛佩兹（Nico Lopez）、埃尼奥•莱瓦（Enio Leyva）、胡安•曼努埃尔•马尔克斯（Juan Manuel Marquez）、雷内•罗德里格斯（Rene Rodriguez）。

“七•二六运动”是在1955年攻打蒙达卡兵营后成立的，成立的同时我们就加入到运动中。在哈瓦那组

[1] 见汇编，1933年的革命。

[1] 1957年菲德尔带领队伍乘坐“格拉玛号”由墨西哥返回古巴打算组织政变，然而由于船比预定日期晚到达两天，接应的队伍已经撤退；再加上他们登陆的地点也不是原定的，结果遭到政府武装部队的袭击，随船的大部分革命战士都惨遭屠杀。——译者注

建了“七•二六运动”青年旅，其主要成员是学生和青年工人。它的领导人是一位叫做赫拉尔多•阿布鲁•冯堂（Gerardo Abreu Fontán）的黑人青年。他是一名出色的革命者，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诚实、直爽、无私都是他的特点。青年旅的主要贡献是散发传单，在墙上写宣传口号，破坏商店橱窗，投抛“莫洛托夫鸡尾酒”等小规模的破坏活动。冯堂任命我为位于庞塔区（La Punta barrio）的第一青年旅的首脑。

1957年中旬，哈瓦那革命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组织决定让我去马埃斯特腊山避避。我在7月4日离开哈瓦那，那天正好是美国的独立日。我记得当我路过一台电视的时候，正好看到里面播放美国在举办独立日庆典，当时电视里还奏响了美国国歌。

7～11月，在得到山上组织的认证之前，我一直住在巴亚摩（Bayamo）。当时我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便假装成一个在当地开洗衣店的华人的侄子。直到1957年11月底，我才获得组织认证加入到菲德尔的纵队。

起义军一员

沃特斯：您上马埃斯特腊山后发生了什么？

邵黄：当时游击队正在经历非常时期。

上山后，除了武器，组织还给了我一套制服、一双靴子、吊床等所有日用品。当时我和三位来自曼萨尼约（Manzanillo）的年轻农民同志一起上的山，他们也想参加起义军但是他们却连衣服和食物都没带。

我随身带了一封曾参加过“格拉玛号”登陆的战士写的推荐信。推荐信本应该是冯堂给我写，因为他是我的直接上司，然而在山下逗留期间，我遇到了这名“格拉玛号”上的同志，他当时正在生病，我们把他藏在一个隐蔽的房子里。对我们来说，他是一名英雄。

“别心急，我会为你给菲德尔写封信，你一定可以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的。”于是这名同志就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我让邵黄去找你，他为了革命事业逃避敌人的追击，并对革命事业义无反顾。署名：某某某”我手里拿着这封信觉得上山加入革命队伍一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然而，对我来说，仅仅登上马埃斯特腊山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首先我从小在城市长大，对于野外生活毫无经验；另外我只是个学生，而且我在上山前刚刚从一场感冒中康复过来，身体相当虚弱，特别是登山的头四五天。当我在攀登第一座山峰的时候，我晕倒了。向导想把我丢下不管，我就对他说，“如果你撇下我，我就写信告诉菲德尔，让他把你枪毙了。你必须把我带上山！”向导听了很害怕，就跟附近的一个农村寡

妇借了一匹马，他让我骑马跟着队伍一起走，就这样我最终登上了马埃斯特腊山。

当我到达菲德尔的指挥所时，我听到有人向菲德尔喊："嗨，菲德尔你看，连这儿都是中国人啦！"这就是对我的欢迎词。

有几个同志拿了我的介绍信，把它带进了一间小屋子，给菲德尔看。我满怀希望地等待各位同志们会敞开怀抱迎接我。然而当菲德尔从小屋子中走出来的时候，他看着我们说："你们都是因为参加了地下革命斗争才逃难的吗？你们都从哪儿来？"

其他几个一起上山的人回答道："不，不，不，我们不是和这个中国人来自一个地方的，我们从卡里希托（Calicito）来，我们烧毁了当地的甘蔗园。"

正好那时候菲德尔的一个排也在卡里希托烧甘蔗园，"既然是你们烧的甘蔗园，为什么巴桑特上校（Captain Basante）报告说是他的队伍烧的？"菲德尔说。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真的烧毁了甘蔗园，但是菲德尔当时确实是派他的队伍到卡里希托去执行烧甘蔗园的任务。

之后菲德尔扭头对我说："是某某某叫你来的？"

"是的，长官。"我回答说。

"很显然他把自己当成了一名英雄，他不来这里跟我们一起打仗，却沉浸在'格拉玛号'登陆的故事中。"

菲德尔接着说，“你以为这是哪儿？大使馆？做一点点小事儿就能把这里当作避难所。你不带武器，不带制服，不带靴子，你不带食物，你差不多什么都没带。”

“克雷森西奥[1]（Crescencio），”菲德尔喊，克雷桑西奥是农民出身的后卫队成员。“克雷桑西奥，把他们都关起来，关三天除了米饭什么都别给他们。”

当我们被押着经过营地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坐在岩石上的人说“如果他们其中有人想跑，就开枪打他们的脚。”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人正是劳尔•卡斯特罗。

第二天，菲德尔来到河的下游看我们，“请原谅我昨天对待你们的态度，”他向我们道歉，“但是某某某真的事儿办得太不漂亮了，他竟然违背我给他下达的直接指示。现在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时期，我们缺食物、衣服、武器。实际上我们什么武器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你们都可以回去，等以后日子好了你们再过来。”

“长官，我不能再返回哈瓦那了，”我说，“那里到处都在抓我。”

于是我留了下来，其他三个一起上来的人都回去了。之后我一直在菲德尔领导的第一纵队，并最终进入指挥所。直到1958年巴蒂斯塔发动总围剿的那个夏天，我一

[1] 克雷森西奥•佩雷斯（Crescencio Perez），1895～1986年早在“格拉玛号”登陆前，就是马埃斯特腊山区“七•二六运动”成员，是第一个加入起义军的农民，革命结束时他成为第七纵队的指挥官。革命胜利后，他一直在“革命武装力量”不同岗位担任职务。

直在拉•帕拉塔（La Plata）。

秘密任务

沃特斯：我听说当您在指挥所的时候，您接受了一个返回哈瓦那的秘密任务。是这样吗？

邵黄：对，1958年1月底，菲德尔打算派人去哈瓦那寻找冯堂，并把他从哈瓦那带到马埃斯特腊山，当时政府的特务正在四处追查冯堂，他随时处在危险之中。因为我从哈瓦那来，雷内•罗德里格斯（Rene Ro-driguez），“格拉玛号”登陆的成员，就向菲德尔推荐我去执行这项任务。然而这期间爆发了第二次皮诺•德尔•阿瓜（Pino del Agua）战斗，我不能离开。这场战斗发生在2月4～5日，在4月7日我们就收到了冯堂遇害的消息。

冯堂是“七•二六运动”青年旅的一名领袖，他是一位诚实、坚定、勇敢无畏、出类拔萃的革命同志。他了解哈瓦那所有的革命组织，然而尽管巴蒂斯塔的爪牙对他施尽暴行，他却没有吐露一丝消息，自始至终对革命坚贞不渝。

冯堂的死讯让我悲痛万分，不仅因为冯堂是我的第一位领导，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来教育我们何谓革命。再加上我已经知道菲德尔计划派我把他从哈

瓦那接上山来，这就更使我悲痛不已。

几天后，我接到另一个任务，到哈瓦那找到塞尔吉奥•冈萨雷斯（Sergio Gonzalez）。冈萨雷斯被人们称为“小牧师”（El Curita），是负责组织在首都进行破坏活动的首脑。他也在躲避政府的搜捕。

在这期间，由劳尔和胡安•阿尔梅达领导的新组建的纵队正准备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区到其他地区开辟第二、第三阵线。因此直到3月10日我才下山。那段时间正赶上巴蒂斯塔庆祝他的政变纪念日，得益于此，我才顺利地来到巴亚摩（Bayamo）并通过一些朋友的关系抵达哈瓦那（当时政府还在抓捕邵黄将军）。

一天夜里，我在哈瓦那维博拉（Vibora）区莫纳克（Monaco）电影院门口的公园里见到了塞尔吉奥•冈萨雷斯（Sergio Gonzalez）。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的会面。我首先传达了菲德尔的指示，由于哈瓦那非常危险，我必须带塞尔吉奥•冈萨雷斯（Sergio Gonzalez）离开哈瓦那前往马埃斯特腊山。

“告诉菲德尔，请他原谅我不能遵从他的命令，”塞尔吉奥•冈萨雷斯对我说，“在当前如此复杂危险的局势下，作为组织的领袖我不能抛弃我的革命同胞。我相信菲德尔会理解的，非常感谢他能为我的安危着想。”

无论我怎样劝说，他都不愿随我离开。

这次与塞尔吉奥•冈萨雷斯的会面是在3月13日，而我必须在14日左右离开哈瓦那。当我设法通知菲德尔我不能完成任务的时候，菲德尔很难过，因为他知道独裁政府打算置塞尔吉奥•冈萨雷斯于死地。3月19日，独裁政府对塞尔吉奥•冈萨雷斯下了毒手。

塞尔吉奥•冈萨雷斯、冯堂等都是菲德尔想要保护的革命事业的骨干，他们勇敢无畏，在革命事业中证明了自己。

菲德尔了解在城市中的地下斗争非常艰苦，冯堂实际上是被卧底告发的。独裁政府将这名卧底保护起来，每天让他在警察的护送下坐在巡逻车上搜寻冯堂，直到一天他在街上发现了冯堂并逮捕了他。

我总是将这些事情作为菲德尔在革命斗争中如何关心革命骨干和照顾自己兄弟的好例子。在这些事件中，菲德尔展示了他对人的关怀，他总是尽量把革命同志的损失缩减到最小。这些事件同样也说明这些革命骨干们是如何坚定地从事革命事业并用自己的行动承担革命使命的。

冯堂知道自己是政府最想捕获的人之一。实际上，正是冯堂把我派到马埃斯特腊山的。“他们已经发现你的行踪了，”他告诉我，“你必须离开。”然而他自己却一直留在哈瓦那。同样塞尔吉奥•冈萨雷斯在收到菲德尔

的命令后仍然选择留在哈瓦那，这证明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其他很多革命者都是这样的，菲德尔本人也是如此。有一封战士们写给菲德尔的信，劝告他不要亲自参加到战斗中去，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常常冒险[1]。

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革命时期最艰苦的是城市中的地下斗争。与山区不同，在那里奇袭是由我们游击队发动的，可城市中的敌人掌握了所有的优势。当时哈瓦那又是全国进行地下斗争难度最大的城市。

在切·格瓦拉的纵队

考贝尔：您刚才提到了1958年夏天巴蒂斯塔政权对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的围剿，在那几个月中您在做什么？

邵黄：在反围剿第一阶段，我和菲德尔在一起。菲德尔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到靠近帕尔玛·莫恰（Palma Mocha）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南部布置地雷以阻碍敌人援军的推进。当时敌人的飞机向我们投放炸弹，其中1枚100磅的炸弹没有爆炸，我们就将这枚炸弹制作成了地雷。当时敌人的一支由马赫尔·盖维多（Major Quevedo）指挥的名为雨燕（Swift Battalion）的精锐部队在埃尔·赫格

[1] 这封信可在格瓦拉的《古巴革命战争片段》中“皮诺·德尔·阿瓜的第二场战争”中找到。

（El Jigue）投降了我军；巴蒂斯塔派遣援军试图冲破我们的包围。为了应对巴蒂斯塔的援军，菲德尔派我和切纵队中的一个班加入到拉蒙•帕兹（Ramon Paz）上校的纵队中。

而实际上敌人的援军没能到达埃尔•赫格（El Jigue），因为他们遭到了安德烈斯•格瓦斯（Andres Cuevas）上校纵队的激烈抵抗。在这次决定性的战斗中，安德烈斯•格瓦斯上校英勇牺牲了。

在接下来的反围剿中我一直在这个班里，参加了多次战斗，不仅包括菲德尔领导的埃尔•赫格（El Jigue）战斗[1]，还包括卡萨•德•皮德拉（Casa de Piedra）与婆罗文丹西亚（Providencia）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拉蒙•帕兹（Ramon Paz）上校牺牲。之后我又参加了约沃（Joval）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雷内•拉蒙斯•拉图尔（Rene Ramos Latour）指挥官牺牲了。反围剿结束的时候，我仍然留在切的纵队。

8月末，菲德尔派切和卡米洛组建了两支新纵队，分别是切领导的第八纵队“西罗•雷东多”（Ciro Re-dondo）和卡米洛领导的第二纵队“安东尼奥•马塞奥”（Antonio Maceo）。第八纵队的任务是向古巴中部进军，第二纵队的

● 埃尔•赫格战斗发生在1958年7月11～21日，是马埃斯特腊山反围剿战斗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军的进攻，并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中的转折点。

任务是向古巴最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1]（Pinar del Río）进军。

菲德尔的这次决策是相当有水平的，因为他指定的两位领导都是军中的杰出人物。切称赞卡米洛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战士和天才游击队领袖。卡米洛领导的部队曾经在奥连特省（Oriente）的巴亚摩（Bayamo）平原和政府军对抗数月。他的部队有平原作战的经验。然而像我一样，很多士兵仅在山区打过游击而没有在平原作战的经验。卡米洛部队的90%都是作战老手，他们装备了全自动武器。这就是为什么会派卡米洛负责这项任务。

切的纵队由140人组成，我们的装备是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武器。我们的纵队里有在马埃斯特腊地区参加过战斗的排长和班长，而大部分战士都是刚从米纳斯·德·弗里奥[2]（Minas del Frio）军事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当时我被分派到先遣队第二班，我们排是由最有经验的战士组成的，同时我们装备了全自动武器。

在我们出发前，切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重申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就算到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战士活下来，”切说：“他也必须到达目的地完成这次菲德尔交给我们

[1] 10月份菲德尔·卡斯特罗命令第二纵队继续留在拉斯维拉省，与第八纵队共同作战。
[2] 为了招募新兵，1958年，切·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地区的米纳斯·德·弗里奥建立了一所起义军学校。参加学习的人不但接受军事训练，同时还接受文化课和政治课的教育。

的任务！”

我认为菲德尔选择切来组织古巴中部的斗争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控制这一地区可以切断政府军，将其一分为二；其次，由于拉斯比亚斯省有多支革命武装，菲德尔的目标是团结这些革命组织从而将政府军切断，因为切不但是一名战士他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能力和超凡的组织能力都使他成为领导这次行动的不二人选。

拉斯比亚斯省当时有以下四支革命队伍：

维克托•博尔东（Victor Bordon）领导的“七•二六运动”。

法乌莱•乔蒙（Faure Chomon）领导的“革命指导党”（Revolutionary Directorate）学生队。

“人民社会党”（Popular Socialist Party），一支在拉斯比亚斯省北部的由费利克斯•托罗雷斯（Felix Torres）领导的部队。

脱离“革命指导党”，并和“真理党”（Authentic Organization）有关联的“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民族阵线”（Second National Front of the Escambray）。

向古巴中部的行进异常艰难，我们用了45天才到达埃斯坎布拉伊。行进途中11名战士因身体不适留在了路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惨遭独裁政府的毒手而失去了宝贵

的生命。

我们走过沼泽，穿越卡马圭省的北部，在经过5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后，大家的脚都走烂了。在山林中游击队占有先机，然而在平原上却正好相反，因为敌人有先进的车马装备，他们移动快捷。更何况那里是敌人的地盘，他们更了解地形。为了避开敌人的优势，我们选择了最难走的、马匹和车辆都无法通行的地方。

每当我觉得自己走不动的时候，我都会看看前面的切•格瓦拉，这位来自阿根廷的同志，随时准备为古巴革命事业而献身的伟大战士。他身患哮喘，平时要靠服哮喘药维持正常生活。我就想，“他都能坚强地走下来，我为什么不能？”正是切给了我坚持走下去的力量。当然好多同志都给了我帮助，在我累得拿不起武器的时候，他们就帮我拿我的M1轻型卡宾枪。毕竟我在城市长大，体重只有不到100磅，这样的环境和跋涉对我来说都相当艰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于1958年10月到达了埃斯坎布拉伊。

霍金斯：当您和您的战友们到达埃斯坎布拉伊时发生了什么？

邵黄：我们一上山就和寅苏斯•卡雷拉斯（Jesus Carreras）领导的“第二民族阵线”的部队发生了矛盾。在

进山的路上卡雷拉斯留了一条这样的告示：“除‘第二民族阵线’外，任何部队严禁通行。”他们知道我们的纵队将要到来，还留下了这样一条告示，显然这是一种挑衅。

早在我们进入埃斯坎布拉伊山区之前，维克托•博尔东（Victor Bordon）就派了两名长官来为我们作向导，他们已经告诉了我们“第二民族阵线”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切成功地联合了“革命指导党”、“七•二六运动”和“人民社会党”，并和“革命指导党”签订了《采石人公约》（Pedrero Pact）。《采石人公约》中规定了由切领导并指挥“革命指导党”的所有部队。不久，“人民社会党”也签署了公约。只有“第二民族阵线”没有签。

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埃斯坎布拉伊后我们并没有休息，切马上就指挥我们攻打了政府军在山下和村庄中的几处驻军，包括圭尼纳•德•米兰达、巴瑙和卡拉库斯。

圭尼纳•德•米兰达是我们到达后打的第一仗。我们攻击了一支由40人组成的敌人驻军。清晨5点我们向敌人发动突袭，为了躲避敌人的空军我们必须在太阳升起前发动进攻。

我们从马埃斯特腊山来的时候，带了一支在夏天反围剿战役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火箭筒。但是拿火箭筒的

同志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当战斗开始的时候，他向敌人发射火箭筒，第一炮飞得离敌人特别远，第二炮又太近差点儿把自己炸了。一看这样，切赶紧跑过去："嗨，小伙子！你在干嘛呢？"话音未落便从那个同志手中接过火箭筒，亲自向敌人开火；一炮便射入敌人据点的窗口，于是很快敌人就投降了。

接下来的几周，巴蒂斯塔的军队向埃斯坎布拉伊山发动了进攻，虽然攻势很凌厉，然而仍然被我们一一击退。之后政府军就再也没有对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发动过进攻。

最艰难的战役发生在福门托，就是蔡将军的老家。那是12月16日，我们第一次在城市里遇到大规模的驻军。在随后3天的战斗中，我们利用空军力量攻打敌人。在敌人投降后，我们便继续去解放其他城市，包括卡白关（Cabaiguan）、普拉西塔斯（Placetas）、圣地•斯普里塔斯（Sancti Spiritus）、雷曼迪欧斯（Remedios）和凯巴•雷恩（Caibarien）。

其中发生在卡白关的战斗令我记忆犹新。

我所在的冲锋排潜入敌人驻军的后院儿，与敌人只有一街之隔。我去报告切，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有利的地势。想要到后院儿，得先从房顶跳到围墙上，然后再

从墙头翻入后院儿。当时正好是凌晨4点钟，四处一片漆黑，切突然一脚踩空从房顶摔下来并摔断了胳膊。

“我的M1没事儿吧？”是切从房上摔下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他摔断了胳膊，却关心他的冲锋枪。

战事在圣克拉拉达到白热化。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在1959年1月1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巴蒂斯塔逃离了古巴，我们全速开进哈瓦那。

当时我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那时候的感觉有点儿像是洛佩兹•古巴（López Cuba）在《创造历史》[1]（Making History）一书中描述的。我应该高中毕业了，只要再读两年我就能拿到大专文凭。于是我去找切：“切，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今后想成为一名电器工程师。”我说。

“你现在就走？”切反问，“别这么不够意思，现在革命才刚刚开始啊。”

沃特斯：从那以后您就一直受切的领导？

邵黄：1959年1月上旬我被晋升为第一中尉并成为一名哈瓦那卡瓦尼亚堡（La Cabana）的军警。卡瓦尼亚堡是切的指挥所，军警是负责监督军队纪律的。同时我晚上还去中等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Secondary Stu-

[1]《创造历史：古巴革命军四位将军访谈录》（Making History: Interviews with Four Generals of Cuba's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一书出版于1999年，探路者出版社出版，作者玛丽－爱丽斯•沃特斯。

dies）学习。那时我已经离开学校4年了，再加上肩负起义军的好多职责，我发现继续学习相当困难。

几个月后阿根廷记者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Jorge Ricardo Masetti）创立了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绝大多数起义军是农民，我是其中不多的读过书并且接近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马塞蒂知道我的情况后便打算雇佣我。他找到我并对我说："你愿不愿意成为一名记者，我们共同创立拉丁美洲自己的出版机构？"

于是我去请教切。

"切，马塞蒂建议让我去他的拉美通讯社工作。"

"还得让我跟你说一次？别这么不够意思，我们部队现在正需要你。去告诉马塞蒂到别的地方找他的记者吧。你是绝对不能走的。"

这是切给我上的又一课。

在切被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裁后，他给我上了第三课。

那时候我姐姐的婆婆在澳门快要去世了，她需要50美元办签证。她找到我希望我能去和切沟通一下。

于是我就很天真地去找切。

"切，我姐姐的婆婆在澳门快去世了，她想去看她婆婆，但需要50美元来支付签证。"

切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

“我就有125比索，”当时所有的官员每个月的工资是125比索。

“如果你需要你就都拿去吧，”切继续说：“但是我实在是没有美元。”

这是怎样的一课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我毕生革命生涯中，有几件事是让我感到万分荣幸的。最具革命教育意义的是，我曾为三位伟大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工作过。首先，在马埃斯特腊山我为菲德尔效力；其次，成为切的第七纵队的一名战士；最后，从1965年开始，我成为“革命武装力量”部长劳尔的助手，并协助他工作7年之久。在这期间，我还有幸为胡安•阿尔梅达工作了一年半（当时劳尔去参加军事学习，胡安接替“革命武装力量”部长之职。）

能够为品格高尚的领导人工作，能够与他们相知相识，能够受他们的指挥，能够向他们学习，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一生无尚的光荣。

中国人在古巴

沃特斯：作为华裔古巴人，您三位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请给我们讲讲华人到古巴移民的事，以及这个事件在古巴历史上所居的地位。

邵黄：华人移民古巴是从1840年代开始的，也就是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当时欧洲列强将鸦片贸易作为金融杠杆来控制中国，鸦片被大量销往中国，中国清朝政府意识到鸦片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毒害，光绪皇帝颁发针对鸦片的禁令，并派遣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这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虎门销烟。之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以销烟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战败。随后，列强们逼迫中国统治者做出很多让步。开始，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了5个口岸进行贸易，即：广东（今广州）、阿莫依（今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随后20年，列强们又强迫中国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不仅是向英国还有其他国家，如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中国在沿海对外国开放了不同的港口，列强们便在这些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

英国殖民者发现他们可以从多方面来控制中国并从中获利。他们与华人签订所谓的劳工合同，并将这些中国劳工运往他们在西半球的殖民地做苦力，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圭亚那和巴巴多斯。

西班牙王室也发现了这一现象，更认为劳工制是代替奴隶制来发展他们在古巴殖民地蔗糖工业的最佳途径。

早在1817年，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便签订了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条约。而西班牙并没有遵循这一条约，在违反条约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着残忍的奴隶贸易。事实上，1817年之后被运往古巴的非洲奴隶比以前还要多，然而因为西班牙殖民者不能公开进行奴隶交易，被运往古巴的非洲奴隶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1]。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影响西班牙决定引进中国契约劳工。1841年，西班牙人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古巴101.7万人中只有41.8万白种人，15万混血自由人，43.2万奴隶。这就说明，奴隶和混血自由人之和已超过白种人的数量。

当时在古巴已经发生过多起奴隶起义。1844年，一个名为“梯子阴谋”（Ladder Conspiracy）的事件轰动一时。在这一事件中混血诗人普拉西多（Placido）被枪决。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阴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是西班牙殖民政府害怕起义而进行的预先镇压。这就可见当时的西班牙殖民政府是多么害怕奴隶起义。

受英国政府的启发，1844年西班牙在厦门港设立了从事运送中国劳工的公司。同时他们还在厦门建立了兵营。厦门是位于台湾海峡正对台湾的交通要道。

中国劳工的合同上规定8年工期，日薪4比索，外加衣

[1] 见汇编，古巴的奴隶制（Slavery in Cuba）。

食。中国劳工必须为任何购买他们劳工合同的人工作，他们的合同以70比索出售。因为他们签订了契约，在8年合同期满后，他们可以选择回中国或以自由劳力身份呆在他们的劳动国。当然，这些中国劳工别无选择，他们只能留在他们被卖往的劳动国，因为在经历了血淋淋的剥削后他们根本无法支付昂贵的回国船票。

第一批被运往古巴的中国劳工是在1847年6月3日由西班牙双桅帆船“奥肯德号”（Oquendo）运抵哈瓦那湾的雷格拉（Regla）港的。当时船上有206名中国劳工。雷格拉港是西班牙殖民者用来引进非洲奴隶的港口。运抵的中国劳工被关进兵营，然后他们的合同被劳工贩子卖给当地富有的庄园主，这些庄园主仍然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这些中国劳工。同年6月12日，一艘英国的商船“阿盖尔公爵号”（Duke of Argyle）又运来365名华工。在4～5个月的航行中，很多华工都死去了。1847年期间的500～600名华工是第一批来到古巴的华人。

后来，西班牙王室为了回应公众对于虐待劳工的不满，而宣布废除劳工合同。然而好景不长，西班牙女王于1852年恢复了合同制劳工。

据估计，1848～1874年期间，有14.1万名华工被运往古巴（其中10%～15%的华工死于途中）。这一数字与同期被贩卖到美国的华工相近。然而，根据人口比例，

华人对古巴的移民更具影响。在1870年，古巴的人口是140万，而美国的人口则是3800万。

这些华工都在甘蔗园和其他各种农场工作，条件极其艰苦。首先他们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交流；其次，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甘蔗刀来砍甘蔗。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庄园里其他的工具。

很多华工和非洲奴隶一样逃往山中，当时有叫做“栅栏”（Palenques）的地方，是逃亡黑奴的归所，华人也这么做了。有一些华工选择了自杀，面对残忍的虐待他们宁愿选择死亡。

除了直接从中国来到古巴的华工外，1865～1875年期间，5000多名华人从美国设法来到了古巴。其中许多华人都曾经修建过美国南北大铁路，为了逃避当时美国恶劣的处境，他们选择来到古巴。最近我看的一部由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主演的影片《义海倾情》（Wyatt Earp），其中就有中国劳工修建美国大铁路的情景。

独立之战

1868年10月10日，古巴独立战争爆发[1]。共和军[2]解放了奴隶，并宣布所有中国劳工的合同作废。成千上万的

[1] 见汇编，古巴独立战争（Cuba Independece War）。
[2] 见汇编，共和军（Republic in Arms）。

华人和非洲人加入了革命斗争的行列。甚至有整营、整连的官兵都是由华人组成的。

在哈瓦那利尼亚（Linea）街和L街的拐角处，有一座为纪念独立战争中的华人而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贡扎罗·盖萨达（Gonza lo de Quesada，曾任何塞·马蒂组建的古巴革命党党书记）将军留下的千古名言："没有一位古巴华人是叛徒，没有一位古巴华人是逃兵。"在古巴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件华人帮助西班牙的事例，绝无一例！我们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很多古巴出生的古巴人都参加了志愿军。所谓的志愿军是一群臭名昭著的行尸走肉，他们为西班牙殖民政府充当警察的职务，这样西班牙部队就能腾出手来攻打独立军部队。

很多年前，菲德尔问我有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华人参加了1868～1898年期间的古巴独立战争。我告诉他这几乎是不可能确定的，因为很多华人在到古巴后用当地姓名代替自己的中文姓名，如古斯塔沃·冈萨雷斯、拉蒙·费尔南德斯，他们经常随他们雇主的姓，因此中国名字不会在军队簿上出现。一些历史学家估计有近6000名华人战士参加了独立战争。然而，并无一人确定。也许更多的华人战士参与了独立战争。

之后菲德尔又问我："那在1957～1959年期间的解放战争中，又有多少华人后裔参加了呢？"

我告诉菲德尔，这个数字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因为除非这个人的父亲是华人，否则他是没有中国姓的。因此，是不是华裔不能简单地通过他的姓氏来判断。比如说古巴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埃斯特班•拉索•埃尔南德斯（Esteban Lazo Hernandez），他的祖父就是华人。古巴国内贸易部部长芭芭拉•卡斯蒂略•古伊斯塔斯（Barbara Castillo Cuestas），她的祖母是华人。古巴国务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拉萨罗•巴雷多（Lazaro Barredo）的祖父母都是华人。这些古巴领导人都是华人的后裔，然而他们都没有中国姓氏。

蔡：关于大概有多少华人参战，可以给您一个思考范围。仅在1874年，拉斯•瓜西马斯（Las Guasimas）一役就有一个营共500名中国籍华人在马克西莫•戈麦斯（Maximo Gomez）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战斗。整整一个营。

邵黄：华人除了成为战士直接参加战斗，还在如提供食物等其他各方面对革命进行了帮助。

家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95～1898年，家父在马坦萨斯开了一家小店铺。一天西班牙殖民政府因为家父将食物免费发放给路过的“曼比”[1]而责骂家父。

政府官员问：“你为什么不跟他们收钱？”

[1] 曼比在当时是西班牙殖民者对革命战士的蔑称。详情请见汇编，曼比（Mambi）。

“西班牙人也路过，他们也从我这儿白拿东西。”这就是家父的答复。

许多城市中的华人还为革命军提供情报。在西班牙殖民者眼中，所有华人看上去都长得一个样。所以华人进城的时候通常是不会被怀疑并检查的。如果有人对他们质疑，并查问他们时，他们就只说一句话：“I no understand, I no understand.”❶

沃特斯：那时大部分在古巴的华人主要是说汉语呢，还是他们已经开始说西班牙语，或是两种语言都说？

邵黄：到这儿的华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西班牙语，后来他们开始学习一些词汇，但是在独立战争中交流仍是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会组成独立的作战营、连。

有一段关于埃尔南德斯（Hernandez）上校的轶事。埃尔南德斯上校在伊格纳西奥•阿格拉蒙特（Ignacio Agramonte）将军手下效力，他被派去指挥中国营。由于语言障碍，官兵之间经常误解对方，因此还造成一些华人士兵违反纪律的事件。因此上校决定面见阿格拉蒙特将军。当上校还没到阿格拉蒙特将军的帐篷时，将军就知道他是为何而来的。

“上校，你一定为你的营而感到自豪吧，”将军对

❶ 内容大意为“我不懂，我不懂。”之所以不翻译，因为这两句话是不符合语法的病句，正体现出华人假装不会说西班牙语而躲避审讯的机智，因此保留原文。——译者注

刚进帐篷的上校说到，“你必须为这一英雄营而感到骄傲，并且作为他们的长官，他们是多么地爱戴你。”你想想，不等上校开口，将军便不停口地称赞华人，称赞他们是多么爱戴指挥官，以及他们的英勇事迹。上校最后没有说出他真正来找将军的来意。其实上校找将军的原因是因为语言交流障碍，他厌倦了和华人打交道因此而想调换岗位。

另一事件也描绘了华人参加独立战争的范围。

1901年，在最后一次独立战争结束后制定的宪法中第65条规定，任何一名为古巴自由而战满10年，有武器装备的外籍人员，都有资格加入古巴国籍。他甚至可以成为古巴共和国的总统。这一条文是由马克西莫•戈麦斯（Maximo Gomez）提出的，他曾经指挥军队作战，他是一位多米尼加人。然而马克西莫•戈麦斯拒绝了竞选总统的提案。他是一名多米尼加人，一名外国人，你能想象到吗？

当时只有4人满足这一宪法条文，来自多米尼加的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来自波兰的卡洛斯•罗洛夫将军（Carlos Roloff）和另外两位华人——何塞•卜（Jose Bu）中校和何塞•托龙（Jose Tolon Lai Wa，中文名黎华）。他们都参加了三次独立战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来自波多黎各的里乌斯•里维拉（Rius Rivera）也有资

格，然而这一点仍然存在争议。无论怎么说，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华人在独立战争中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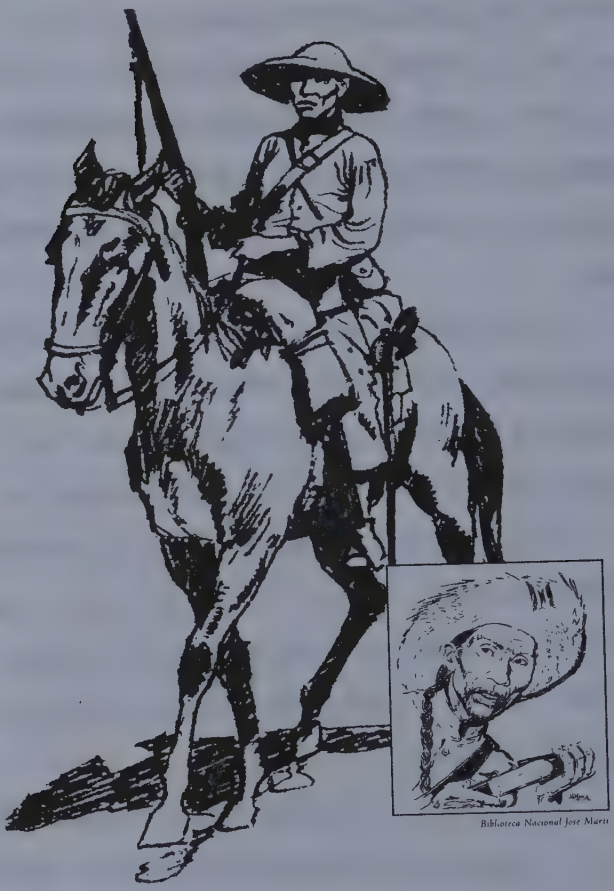
考贝尔：中国劳工制度是何时结束的？

邵黄："优待"华人"是宗教和人性本能的要求"，这是在1847年伊莎贝尔二世在皇家制度（Royal Order）中提及的。这一制度本身已表明华人和黑人已经受到了隔离。

1857年，西班牙皇家议会对允许进入古巴的华人数量进行了限制。1860年，迫于在中国的其他列强国所施加的压力，西班牙不得不同意禁止向美洲贩卖中国合同工。然而实际上直到1874年，中国合同工交易从未间断过。

在古巴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王室被华人在革命军中发挥的作用所警醒。因此在1871年，王室颁发了一项新的皇家法令。这项法令以中国劳工不遵守合同规定、危害国家公共秩序、在战争中帮助国家的敌人等名义，禁止了中国合同工交易。

1877年11月17日，在中国、西班牙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正式结束了向古巴贩卖中国合同工这一罪恶的交易。然而直到1879年6月29日《哈瓦那公报》（Gaceta de La Habana）报道时古巴才得知这一消息。



1868～1878年古巴独立战争时期间华人士兵。

华人社区的建立

霍金斯：华人社区是如何在哈瓦那和古巴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

邵黄：随着华工8年合同期的期满，他们成为了自由人，并大部分成为街头小商贩而在古巴生存下来。他们依靠卖水果、蔬菜、油炸食品等小买卖而谋生。第一个华人社区就是这些人建立的，在哈瓦那的战壕（Zanja）街和光线（Rayo）街的角落由几家小饭馆和摊位组成。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真正的华人区就逐渐形成了，在那里人们说中文和西班牙文两种语言。同时出现了很多中文报纸。1867年，由多个华人社团成立了古巴第一个华人社区——结义堂（Kit Yi Tong）。

后来哈瓦那的华人社区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唐人街。或许在整个美洲超过哈瓦那唐人街规模的只有旧金山的唐人街。

沃特斯：在古巴，华人的分布是怎样的？

邵黄：最初，华人都聚集在蔗糖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如哈瓦那、马坦萨斯、比亚克拉拉和古巴东部。后来华人分散到古巴的每一个省和城市。

大部分华人成为零售商和贸易商，他们分布在如饭馆、洗衣店等服务行业。如果在一处经营不善，华人往

往会换一个地方继续经营。就像崔的父亲一样。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华人逐渐分布到了古巴各地。

沃特斯：据我所知，几乎所有来到古巴的中国劳工都是男性。多年前我读过一些资料，上面说超过99%的华工都是男性。这对于古巴华人社区的发展一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邵黄：对，这显然是古巴存在大量国际婚姻的原因。很多中国男性都和古巴女子结婚。华人社区对于和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并不像好多其他社区那么抵触，比如像犹太社区[1]。但在我家事情就很有趣了，我家有14个孩子，6女、8男。我妈妈坚持所有的女儿必须嫁给双亲都是华人的男子，她们谁都不能嫁给华人和古巴人混血的男子。但是对于我们男孩儿就没有这些要求。结果我的姐妹们都嫁给了双亲是华人的男子，而我家的男孩儿都娶了古巴女子为妻。

沃特斯：当1874年合同工结束以后，华人移民活动的范围是怎样的？

邵黄：移民数量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状态，老百姓受到地主、军阀、外国帝国

[1] 犹太人的婚姻比较保守，很多家庭要求配偶必须同是犹太人才可成婚。——译者注

主义的残酷剥削，导致很多华人对中国绝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状态，他们依然选择移居国外，其中包括古巴在内。

19世纪末，哈瓦那华人居住区。

对华人的歧视

沃特斯：在古巴，华人遇到了怎样的种族歧视和差别待遇？

崔：很多方面。比如，我现在仍记得辱骂华人而编的顺口溜："从马尼拉来的华人，快滚回你的广东！"（Chino Manila pa'Canton）在大街上人们看到我们就会朝我们喊这句话。你还记得吧，邵黄？

邵黄：嗯，是的。

崔：这就是当时某些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考贝尔：为什么他们会喊："华人从马尼拉来？"这又有什么寓意？

邵黄：有些华工是从菲律宾转送到古巴的，在当时菲律宾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种说法是当时对所有华人的一种带有侮辱性的说法。

崔：我还记得他们已经习惯冲我们喊："narra，嗨，narra。"

邵黄：在古巴管一个华人叫"narra"，就相当于在美国冲黑人喊"黑鬼"（nigger）一样，是极具侮辱性的。在古巴对黑人的蔑称还有"niche"。当时在古巴黑人被叫做"niche"，华人则被叫做"narra"。"嗨，narra！"是相当恶劣的、带有挑衅性的侮辱语言，就如同"中国猪猡"一样恶劣。

当时对黑人和华人都有很强的歧视，甚至有很多地方是禁止我们进入的，种族歧视也体现在了经济形式上。

沃特斯：比如说呢？

邵黄：比如说教育，私立学校是禁止华人和黑人上的；也禁止我们进入私立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要比其他穷人能去的医院医疗条件好。

崔：还有精英俱乐部，比如露茜塔宾馆（Rosita Hotel）的老板，一个百万富翁，却因为他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而被俱乐部拒之门外。同样是这位老板，在巴蒂斯塔当政时，他设立了一家社交俱乐部——阿方索俱乐部（Club Alfonso），这家俱乐部是专为黑白种混血儿和黑人开放的。然而，不久后，这家俱乐部就禁止黑人进入了，原因是他们看上去不像黑白种混血人那么白。

邵黄：在一些精英俱乐部你是看不到黑人的，那里是严禁华人和黑人进入的。还有哈瓦那外的塔拉拉（Tarara）海滩，那里是不允许华人和黑人乃至于任何穷人进入的。还有哈瓦那东部的“海风”（Brisas del Mar）私人沙滩，也是一样的。

在哈瓦那的米拉马（Miramar）街区，有一支由富人雇养的私人武装警察部队，每天夜里他们都在街上巡逻，并质问行人：“你的身份证呢？”“你在这周围干什么？”

黑人是主要被歧视的对象，例如在圣克拉拉的公园，黑人散步道和白人散步道是分开的。虽然华人是被允许使用白人散步道的，但华人仍在很多其他方面受到歧视。蔡为大家讲了他朋友如何被禁止参加一场舞会的故事，原因就是这个舞会是只允许白人参加的。

在当时的古巴不但对黑人和华人存在歧视，甚至对性别和穷人的歧视也很严重。

华人内部的阶级划分

沃特斯：华人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是怎样的？

邵黄：华人基本上都是店主，然而在华人社区内部，阶级绝非是统一和谐的。他们也分为穷人和富人。有很富有的商人，他们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当时有一家华人银行和中华商会。一些华人甚至成为百万富翁。

有一个中国富豪在阿尔门达雷斯河畔建了一所豪宅，就是如今的孔雀饭店（Pavo Real Restaurant）。这座豪宅简直就是香港珍珠河畔一所豪宅的翻版，香港的这座房子属于古巴富豪的父亲。为了修建这座豪宅，他专门从香港请设计师来古巴仿造，这就使得今天我们在古巴也能看到这座豪宅。

当然还有很多穷苦的华人，像摆地摊的等。

有些人认为因为我们是华人而受到种族歧视，我觉得富人对穷人，由经济地位产生的歧视更严重。

沃特斯：20世纪的头60年，美西战争结束后，代表美国的华盛顿帝国主义政府开始统治古巴。这对华人社区有何影响？

邵黄：在这几十年中美国政府对古巴政治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而实际上由美国大使实行独裁政治。20世纪30年代苏木内尔•维耶斯（Sumner Welles）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任命的外交大使，他因将华盛顿意志强加给别国而臭名昭著。美军执行的任务对古巴部队影响也是相当大。

在中国的以美国为靠山的蒋介石独裁政府直接控制古巴的华人社区，因此华盛顿的政策在这里的华人社区也有所反映。1949年中国革命推翻了蒋介石统治，蒋介石逃往台湾。他所领导的政党——国民党，在古巴是由一些有钱的商人领导的，影响着这里的华人。例如，华人社区的保护伞——春华俱乐部，就是受国民党影响的。

1949年后，古巴政府与台湾政府而不是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古巴的国民党领事同时在古巴华人社区内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办公室就在春华俱乐部总裁办公室的旁边。

如我所说，古巴的华人被分成富人和穷人。对于富有的华人，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影响就如同对整个古巴寡头政治的影响一样。

随着1959年革命的胜利，在华人社区中也出现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富有的商人和大资本家以及部分小商贩离开了古巴，然而大部分华人都参加了革命战争，春华俱乐部的领导地位也被革命者取代。1960年古巴断绝了和台湾的政府关系，正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拉美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沃特斯：离开古巴的华人都去了哪里？

邵黄：一部分去了台湾，大部分都去了美国、加拿大、中美诸国和其他国家。

沃特斯：现在在纽约仍然有很多1959年后开张的古巴华人餐厅。

邵黄：对此还有一段儿趣事。1988年《安哥拉停战协议》和《纳米比亚独立协议》在美国纽约签署。一班在安哥拉战场上捍卫安哥拉免受南非入侵的古巴将军来到纽约参加协议的签署[1]。一天，他们想吃中餐。一个联合国古巴工作小组（Cuban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的同志带他们去了纽约的唐人街。他们进入

[1] 前往纽约参加协议签订的6位古巴将军是Abelardo Colome、Leopoldo Cintra Frias、Ramon Espinosa、Victor Schueg、Rafael Moracen、Pascual Martinez Gil。

餐馆后，用生涩的英文点菜，费了半天劲，餐馆的服务员还是听不懂他们要什么。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打断了他们，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对他们说道："别费劲了，伙计，我也是古巴人。"

1959年后

霍金斯：1959年后，政府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消除对黑人和华人的种族歧视？

邵黄：革命本身就是消除种族歧视的根本措施。尽管我们采取了很多重要手段，如禁止歧视雇工、将所有海滩归为国有、对所有人开放等[1]，然而并没有制定专门消除种族歧视的措施。

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为了消灭不平等、重树社会公正，结束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贫困歧视，真正消除贫富之间的隔阂。

考贝尔：我听说古巴华人民兵曾在1960年帮助实现大规模资本家资本国有化，并在革命早期在哈瓦那唐人街销毁毒品、禁除娼妓和赌场。这是真的吗？

邵黄：这是"何塞•黄"旅（Jose Wong Brigade）做的，其隶属于1960年早期成立的"革命国民军"（Revolu-

[1] 1959年3月22日，由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的《反种族主义宣言书》中，卡斯特罗表明了古巴革命政府在反对种族主义时最初采取的行动。这篇演讲的翻译稿于1999年4月19日刊登在《军事》报上。

tionary National Militia）。何塞•黄是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在广东地区的革命被国民党政府镇压，而不得不于1927年逃至古巴。到古巴后，他和胡里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拉斐尔•特雷赫（Rafael Trejo）一起成为反对马查多（Machado）独裁政府的革命战士。1930年他被捕入狱，并在哈瓦那太子监狱（Principe Prison）遇害。

民兵在革命的头几天由来自古巴各地的人民组成。学校中由大学生组成民兵，工厂中由工人组成民兵，在郊区由农民组成民兵。在我居住的圣拉萨罗（San Lazaro），我们组建了一个名为“佩佩•法拉德拉斯”（Pepe Valladares）的民兵组织。佩佩是一位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到1959年末，民兵组织的数量仍在增加，他们开始加入统一的单位即“革命国民军”（Revolutionary National Militia）。

您刚才列举的事迹都是“何塞•黄”旅作的，这支部队后来还参加了击退雇佣兵的吉隆滩（Playa Giron）战役[1]。

考贝尔：如今华人社区在古巴的情况如何？

邵黄：目前在古巴大概只有300名在中国出生的华

[1] 见汇编，吉隆滩（Playa Giron）。

人。1959年革命胜利以后，就没有明显的华人移民了，因此目前出生在中国的古巴华人年纪都很大了。

像春华俱乐部一样的华人社区都曾试图拯救华人的传统文化。然而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几乎所有在古巴出生的华人后裔都完全融入到古巴社会中。我们尝试将华人都凝聚起来，然而这和在其他国家是有所不同的。目前华人社区有大约40～50人，他们还向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甚至第六代华人后裔开放，使社区扩大一些。无论怎样，华人社区都存活了下来，你仍然可以在哈瓦那的唐人街看得到。

沃特斯：您是古中友好协会主席，该协会有一个恢复哈瓦那唐人街的项目，请问您这一项目是最近的事吗？

邵黄：1993年一些华人后裔加入到古中友好协会，请求支持恢复古巴唐人街的项目。因此诞生了“唐人街促进组”（Chinatown Promotional Group）。这一项目包括两个目标：一是保护古巴华人的传统、文化、艺术；二是从经济和商业地位上恢复古巴的华人区。

从文化方面来讲，我们已经取得了实质意义上的进展。“中华传统与艺术会”（Chinese House of Arts and Traditions）举办各种展览，同时还搞了书画、舞蹈、音

乐、表演等各方面的竞赛。我们甚至提供中文解说。

拯救唐人街这一项目同时得到了古巴各地华人社区的支持，包括华人社区的领头人——春华俱乐部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馆对此项目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唐人街入口的牌坊就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捐赠的。

目前促进组在“哈瓦那城历史学官方办公室”尤西比奥•莱亚尔（Eusebio Leal）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哈瓦那城历史学官方办公室”负责恢复旧哈瓦那城的庞大项目，它是最有能力推进唐人街恢复计划的。同时，中古友好协会依然给此项目以大力支持。

古巴的事例

沃特斯：在拉美各国甚至美国都有华人。然而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和在古巴完全不同。通过您的一生，您是怎样看待这些变化的。

邵黄：1999年，在古巴召开了一个关于散居华人问题的国际性会议。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散居华人协会。这一协会的主席居住在新加坡。在这里召开的会议是由哈瓦那大学举办的，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都派有代表出席这次会

议。其中，很多代表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

我记得协会主席和他夫人问我："您作为一个华人后裔怎么可能担任政府要员，在国民议会中担任议员，同时还是武装部队的将军？这简直难以置信！"

答案并不仅仅是因为独立战争时有成千上万的华人为古巴而战，这是值得研究的，有中国劳工工作的其他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事例出现的。在革命胜利前，古巴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华人是受歧视的。

古巴华人和在其他华人散居国中的华人有什么不同的经历呢？所不同的就在于在古巴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消灭了以肤色决定优劣的种族主义。从更高的角度讲，这一革命清除了经济上和社会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

这就为华人后代成为政府要员创造了可能。在这里，华人不但能担任政府官员，还可以成为一切他们想要成为的栋梁。在这里，对黑人、华人、妇女、贫困的歧视全部被终结了。有中国血统的古巴人和古巴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历史学家，乃至任何想要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来说，我认为你必须要认识到在古巴的华人社区和在秘

鲁、巴西、阿根廷、加拿大的华人社区是根本不同的。

不同之处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加强革命

1990年2月，古巴国际主义志愿军在安哥拉。军队正准备撤出，他们结束了长达16年的使命，成功地捍卫了安哥拉免遭来自南非的侵略并挫败了白人优越的种族隔离制度。

1975～1991年古巴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使命

1975年11月～1991年5月，应安哥拉政府的请求375000多名古巴志愿军战士参与了安哥拉反抗帝国主义鼓动下的扎伊尔夺取石油资源丰富的卡宾达省的阴谋，击败了南非武装部队的大规模侵略，挫败了在美国支持下的种族隔离政权反革命集团的军事行动。

1975年11月11日，安哥拉刚刚从葡萄牙统治下取得独立，首批古巴部队在此前几天抵达安哥拉。当时美国支持下的南非盟军，已经入侵安哥拉并逼近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当安哥拉人即将取得独立时，帝国主义计划镇压安哥拉的革命运动。”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75年12月22日首次就安哥拉军事行动公开声明说，“他们计划在11月11日前控制卡宾达省以及那里的石油；为推行这项阴谋，美国政府发动南非部队入侵安哥拉……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阴谋；然而，这个阴谋却以失败告终……他们忽略了国际力量，其中包括我们古巴人给安哥拉的支援。”

早在1975年春，卡斯特罗在同一篇讲话中提到，美帝国主义已斥资数千万美元“向安哥拉反革命集团和分裂主义分子供应武器和军事指挥官”。那年夏季，在华盛

顿的怂恿下，扎伊尔的军队入侵安哥拉领土，同年8月南非武装力量占领了南部库内内河附近的区。“当时，在安哥拉还没有一个古巴的指挥员，”卡斯特罗说，10月初在安哥拉政府的请求下，古巴送出首批援助物资和指挥员，正值“国外武力公然入侵之时。然而，古巴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直接参战，也未参与制定计划”。

到11月初，安哥拉人民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古巴决定就安哥拉对古巴直接参战的请求做出回应，正如哥伦比亚作家加比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在他采访古巴领导人时所纪录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只能在不到24小时内做出决定，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11月5日，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是古巴的一个独立主权行为，苏联只是在决定被采取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被告知此项决定的。”这项使命被命名为“卡洛塔运动”，这是以古巴马坦萨斯省特里温维拉托糖厂的一名女奴隶命名的，她于1843年，手持砍刀，率领奴隶起义，使起义扩大到该省数个种植园，她被称为“黑色卡洛塔”，她后来被殖民政府被捕，挖去内脏，被肢解成四份。

古巴国际主义者果断地把侵略势力击退至罗安达省几公里以外。1976年3月27日，“当最后一批南非军队被迫

越过纳米比亚边境，后撤700多公里时，解放黑非洲的最辉煌的一页就被书写下来。”菲德尔•卡斯特罗1976年4月19日说。

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自愿参与这项运动。“绝大多数前往安哥拉的人完全确信他们所做的是为了政治上的团结一致。15年前，以同样的觉悟与勇气，他们打败了吉隆滩的入侵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那就是为什么‘卡洛塔行动’不是一次简单的部队远征，而是一场人民战争的原因。”

1976年7月26年，在派遣古巴部队时，卡斯特罗指出，“我们不是在帮忙，而是在履行职责。一个民族，如果不肯为争取他人的自由而奋斗，也将永远不会准备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被赶回边界线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反革命战争，反对安哥拉新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安哥拉请求古巴继续履行其国际主义使命。结果，这场战争被演变成一场持续时间长达10年的战争，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民遇难。

1987年底，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安哥拉政府在苏联军事人员的协助下，不听从古巴领导人的意见，向占领该国东南部省份的联盟武装力量，发起了一次凌厉的进攻。由于安哥拉军队战线拉得过长，这次进攻使种族隔

离政权找到了消灭安哥拉精锐军事力量的机会，因而很快改变了战局。大批南非士兵、坦克、飞机迅速向安哥拉推进数百英里，形成了危机的局势。

对此，古巴革命领导人决定加强古巴的军事力量，并迅速行动起来。正如卡斯特罗后来于1988年12月5日所说："这次行动，革命以自己的生死存亡为赌注，这场大规模战争冒着与第三世界中最强大国家对抗的危险。像我们这样的小国，我们的资源以及武力与其相差甚远。我们冒着与一个工业技术极其发达、武装到牙齿、世界上最富有的强国对抗的危险，甚至冒着削弱我们自己国防能力的危险，可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南非军队在战争中实现最后突破的关键，是安哥拉南部的奎托夸纳瓦累镇，一部分安哥拉和古巴的军队被包围在那里。该镇的守卫者，在古巴军队的带领下，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屡次击退南非的进攻，古巴和安哥拉的增援部队也在向奎托夸纳瓦累等地移动，同时还在靠近纳米比亚边界安哥拉南部广大的弧形区域进行军事活动。1988年3月，南非的战局受到了威胁，而种族隔离势力意识到他们不能夺取奎托夸纳瓦累镇，他们开始撤退[1]。

南非请求和平解决，1988年12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1] 关于这一事件以及它在非洲解放斗争中的地位，可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纳尔逊·曼德拉的讲话中找到（见本书附录）。

在美国政府代表面前，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签署了一项协议，呼吁南非从安哥拉撤军，并承认纳米比亚独立。紧接着这一协议的签署，古巴和安哥拉一致同意撤出古巴部队。最后一批古巴部队于1991年5月撤离安哥拉，约有2000名古巴国际主义战士在将近16年的使命中丧生。

“在奎托夸纳瓦累击败种族主义军队是整个非洲的胜利！”曼德拉在1991年访问古巴时说，“奎托夸纳瓦累，已经成为把我国和整个非洲大陆从种族隔离灾难中解放出来的转折点。”[1]

■

沃特斯：您三位从1975年至1991年，曾多次前往安哥拉执行援助任务。您三位能否再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这一国际主义使命的事情？

崔：古巴革命其实是一场真正体现国际主义精神的革命，很多国际主义者从开始就一直帮助我们直到赢得这场独立战争和其他战争的胜利。马克西姆•戈麦斯将军（Máximo Gómez）是多米尼加人，卡洛斯•罗洛夫（Carlos Roloff）是波兰人，路易斯•马卡诺（Luis Marcano）是多

[1] 卡斯特罗在1975年和1976年发表的讲话讲述了国际主义者在安哥拉行使使命的故事，刊载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讲话集：《1975～1980古巴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探路者，1981年）。这本书还包括加比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古巴在安哥拉：卡洛塔行动》。卡斯特罗1988年12月关于奎托夸纳瓦累战役的讲话，选录于本书附录，这篇讲话印在《保卫社会主义：古巴革命胜利30周年的四篇讲话》一书之中（探路者，1989年）。曼德拉与卡斯特罗从1991年起的讲话也在本书附录中，摘录的自《当今世界的古巴与南非——我们已做了太久的奴隶！》（探路者，1991年）。

米尼加人，胡安•里维斯•里乌拉（Juan Rius Rivena）是波多黎各人——他们都为争取古巴的独立而战。

蔡：亨利•利夫，一个“英国人”。

崔：是的，“小英国人”其实是美国人。

蔡：还有汤玛斯•约旦，另一个美国人，他曾在美国内战期间，为联邦而战。

崔：在我们整个历史中，有许多国际主义者为我们的自由而战，这些都是真实的。

当我们在前往那些请求我们援助的国家那里履行使命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做那些国际主义者们曾为我们所做的。

例如，我们援助刚果，援助塞克杜尔任总统时的几内亚共和国。我们在不同时期，还资助几内亚比邵、佛得角、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也门、阿曼、塞拉利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贝宁、赤道几内亚以及其他非洲和中东国家[1]。

就美洲而言，我们援助的国家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圭亚那等，其中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

我们应该强调指出，我们的援助是各种类型的，包括

[1] 关于其中一些早期援助的故事记述在《巴萨耶德拉格拉革命：切•格瓦拉领导的刚果》（英文版为《非洲梦想》，纽约：格罗夫出版社，2000年版），维克托•德雷克的《从埃斯坎布拉伊到刚果》（探路者，2002年），皮埃罗•格莱节塞斯著《战争的使命：1959～1976哈瓦那、华盛顿和非洲》（祭坛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之中。

医疗、建筑、教育、文化以及军事行动。

邵黄：我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念，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如此。有哪一个国家，在别人寻求帮助时，能提供四五千名医生，自愿担当国际主义工作？当然并不仅仅是医生，还有战士。所有1975～1991年到安哥拉服务过的375000名战士都是志愿者。这未必是众所周知的，但这是事实。

每一个志愿者都被问道："你是否愿意参加?"

"不，我的母亲生病了。"或许有人这样回答。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他会被告知。

这是出于真正的自愿。这是党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确立的条件之一。除非出于自愿，你怎能为正义事业冒生命危险？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奎托夸纳瓦累战役

沃特斯：纳尔逊·曼德拉把1987～1988年的奎托夸纳瓦累战役称作是"非洲历史的转折点"。然而，除了古巴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这场战斗并不广为人知。

邵黄：1987年末，敌人差不多完全包围了古巴和安哥拉在奎托夸纳瓦累的军队，决战就在那里发生。战斗持

续了4个多月，直到1988年3月，南非军队被打败，这标志着战争接近尾声，那场战争的失败迫使南非坐下来谈判，他们接受了协议。

否则，战斗还会继续……

崔：……这场战役的失败可能已经威胁到他们国内政权的稳定。

邵黄：是的。他们的失败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包括纳米比亚的独立和曼德拉在27年监狱生涯后的获释。

崔：用菲德尔的话说，这“打垮了绝大部分南非军队”。

邵黄：否则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南非，怎么可能被迫坐到谈判桌旁呢？从战略的眼光来看，我们所进行的是有威慑力的行动。我们的策略是在安哥拉的南部集中一大批坦克。崔，那里有多少坦克来着？500，还是1000？你得去查一下准确的数据。这就是一支能够从纳米比亚进入并继续向南挺进的具有威慑力的武装。

南非指挥部估计我们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运送相当于一个师的人员、装备与战斗设备。南非的战略家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由于我们双倍增加兵力，在南方前线成倍地增兵，12年后，我们第一次取得了制空权。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付出一些真正的劳动，例如，在70天内建成了卡哈马机场，把敌军关键的目标控制在

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此外，在南部前线，我们部署了一支包括998辆坦克、6000多辆装甲车、1600门大炮、迫击炮以及防空防御设备的突击队……

奎托夸纳瓦累坚持住了。南非所有进攻的企图都被挫败了。他们的尖端远程大炮，虽然没白天没黑夜地射击，却并没有吓倒古巴和安哥拉的军队。同时，在西南部的侧翼，一支由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支持的武装力量，对敌人的一些重要战略点形成严重威胁。在东盖纳（Donguena）和特其帕（Tchipa）与敌军派遣的侦察部队的冲突和他们在卡卢埃凯（Calueque）阵地上遭到的空袭，使南非明白他们不可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

——劳尔·卡斯特罗

（1991年5月27日在欢迎从安哥拉归来的最后一批古巴国际主义者的典礼上讲话）

理论上总是想要用最少的伤亡来赢得战斗。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在安哥拉的军力一度达到50000人，并装备有大炮、坦克和飞机——其中80%部署在南部。我们为坦克和大炮修路。在两个月内，我们修建了简易机场，使我们的飞机能够掩护前方的军队，因为南非拥有大量的飞机，直

到那时，南非仍占有空中优势。

领袖们的榜样力量

沃特斯：崔，就安哥拉战役您的责任是什么？

崔：从1971年开始，我就担任“革命武装力量”第十行政处的第二指挥官，那是个负责国际主义援助的部门。我在劳尔•迪亚兹•阿格勒斯（Raul Diaz Arguelles）将军手下服役，他曾经参加过几内亚比绍的解放战争。1975年12月，距我们开始在安哥拉执行国际主义使命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安哥拉的指挥官阿格勒斯被地雷炸死，于是我被任命为那里的领袖。

正如邵黄早先提到的，我也曾有幸在3个领袖手下工作过，即：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阿尔梅达。在马埃斯特腊时，我曾在阿尔梅达手下工作。今天在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又是如此。

我从年轻时就在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工作，他一直在教导我、训练我。在军队里，我在许多部门担任过领导，比如军备处、第十行政处和干部处。我也曾作过副参谋长。

从1975年9月初，有两年时间我有幸与菲德尔和劳尔共同在特种指挥所工作。在那里他们领导我们的军队

首次对安哥拉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援助。在众所周知的卡洛塔行动指挥所，直接调遣和部署部队——首先是指挥员，然后是志愿军战士，还有所需的物资。

我获得了许多的经验，更不用说菲德尔不时教给我的那些道理了。这就是我是如何学习，领导干部是如何被训练的。

考贝尔：您是什么时侯到安哥拉工作的？

崔：大体说来是1976年，后来，1986～1988年，我又在那儿工作。正如玛丽一爱丽丝说的，邵黄、蔡还有我都在安哥拉。

不仅仅是那样，当时武装部队的绝大多数军官都在非洲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国际主义任务。我们在战斗、部队布署、运输和后勤工作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不时还同苏联人共同工作。

1977年我参与了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古巴军事机关的工作。1977年在莫桑比克，1979年在尼加拉瓜，我也参与了类似的工作。

1986年，我被任命为古巴在安哥拉军事机关的副总参谋长，一直工作到1987年12月。那时，在我的请求下，我被任命为“31周年军事行动”的领导人。该行动旨在增加11月开始的奎托夸纳瓦累战役中的古巴军队和军需品。这项军事行动是由总司令菲德尔组织和指挥的。

邵黄：我来告诉你一个关于菲德尔领导安哥拉行动的故事。那是在1984年或1985年，菲德尔前往苏联参加苏共总书记的葬礼，我不记得是安德罗波夫（Andropov）还是契尔年科（Chernenko）的了[1]。屋里坐满了苏联的元帅与将军，他们都不知道菲德尔从哪里学到的战略、战术、军事科学。他们看到菲德尔如何在安哥拉指挥作战，都对此感到惊奇不已。

在10000公里之外组织这样一项军事行动！而这并不是一场游击战争。我们指挥的是一场常规战。没有像苏联或美国那样拥有丰富资源，一个小国，怎么可能从这么遥远的地方支持一项军事行动？怎么能够打败像南非那样的军队，还有扎伊尔军队及其雇佣军？崔是个见证人，他在指挥中心看到菲德尔夜复一夜地指挥这场战争。

菲德尔比我们任何一个在安哥拉的人都更了解安哥拉的地形。“到某某条河，在某某座山。”他在电报中命令。他对马埃斯特腊真的是了如指掌。“上某某座山，”他会说。他会在给切（Che）、拉米罗•瓦尔德斯（Ramiro Valdes）的命令中说：“夺取某个某个阵地。”在安哥拉时，情况也一样。他给莱奥波尔多•辛特拉•弗里亚斯（Leopoldo Cintra Frias）将军的信中说：“保罗

[1] 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去世，接替他的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去世。

（Polo），在某某处道路上部署3辆坦克，别让你们自己被敌人从侧翼包抄。”他在最后的战役中曾领导军事行动。

沃特斯：许多古巴高级军官在安哥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崔提到的劳尔•迪亚兹•阿格勒斯（Raul Diaz Arguelles）是司令官和这项任务的首领。劳尔•卡斯特罗在对安哥拉战争中倒下的烈士们的赞词中指出，他们中1/4是军官。崔，你自己也受了重伤，那是怎么回事？

崔：这件事发生在我的战斗旅向安哥拉北部的马兰热省（Malanje）转移的时候。1988年3月5日，我的车在运送武器的第二护航车队前行驶，我的汽车引爆了一枚反坦克地雷，我被崩出近20米远。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因为伤势非常严重，我们的总司令派出一架飞机护送我回到古巴。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我才保住性命。但是，医生必须截掉我那条不成样子的右腿。特别是菲德尔，他每天都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并具体指示采取什么措施。我起初在阿米耶纳斯兄弟医院（Brothers Amijeirasd Hosptial）由精良的多学科医疗队（competent multidisciplinary team）为我进行治疗。后来，为了使我康复，我被送到外科医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Surgical Medicine Research），并在卡洛斯•杰•芬勒（Carlos J. Finlay）军事医院最终完成了康复治疗。

邵黄：在我们的军队中，领导人都身先士卒。我们相信这相当重要。对我们革命干部来说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干部道德准则的一部分，领导人必须树立榜样。

格瓦拉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他从不命令别人去做那些他自己不准备做的事情。劳尔和菲德尔也都是如此。

在革命战争中，正如我早先所提到的，同伴都要写信给菲德尔，请求他不要参加战斗。劳尔在东部第二阵线时，情况也一样。菲德尔和劳尔经常在战争中使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就是人们跟随他们的原因之一。劳尔谆谆教诲我们军队领袖要具有这样的品质。他们首先在战场上、然后在他们的生活中树立艰苦朴素的榜样。

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包括迈阿密（Miami）黑手党这一类人，都把劳尔描述成一个冷酷无情、嗜血成性的样子。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我认识劳尔有40多年了，其中有7年直接和他在一起工作。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一生都为了人民而战，他在解决国家的重大事项的同时，还能协调好家庭、私人琐事以及普通人所面临的问题。

在工作以外的私生活方面，我们是朋友。我与他的家人聚会，有时我姐姐安吉丽塔（Angelita）邀请他来吃饭。可工作时，他是部长，我是他的下属。他非常坦率，并且要求很严格。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建立起忠诚、有纪律、有献身精神、并准备做任何事情的军队。正如菲德尔公开指出的，劳尔是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军队的组织者。

崔：劳尔要求的纪律非常严格，同样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你可以从他的衣着上看得出来。有时他要求别人把帽子戴上或把衬衫的扣子扣上，他也严格地遵守军队着装的有关规定。他制服上的扣子总是扣得很好。

古巴的战略使命

沃特斯：在安哥拉期间，古巴志愿军必须同在南非和美国支持下的由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领导的武装力量——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进行斗争[1]。他们是如何对付安盟的？

邵黄：在安哥拉我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安哥拉政府与萨文比领导的安盟之间的斗争，虽然他们妨碍安哥拉的独立。我们只是向安哥拉的武装力量提出建议，但并没有参加反对安盟的战斗。

我们在那里与纳米比亚人民一道，只是为了帮助安哥拉人民反对南非的干涉，抵抗外来的侵略，而非支持他

[1] 见汇编，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

们国内任何一方。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地谨慎，我们的军队并不直接参加安哥拉内战。

对此，菲德尔曾多次解释过，我军的战略任务是驱逐南非的入侵并阻止扎伊尔的侵略。我们到纳米比亚的边境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安哥拉国内的问题必须由相关方和交战方自己解决，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蔡：我们只是在安盟攻击我们的时候才进行反击。我们的战略任务就是阻止南非或扎伊尔的入侵，以防止他们破坏安哥拉的革命、民族统一及独立进程。

崔：内战十分残酷，同一国家，甚至是家庭成员之间都在相互斗争。

邵黄：正如崔所说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安哥拉不仅拥有我们，还拥有苏联的顾问，情况很复杂。

对于组建安哥拉人民武装这一问题，我们同苏联的领导人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们和我们的想法背道而驰。苏联支持组建大规模的师、坦克旅、常规部队。可在我们的高层领导中，菲德尔坚持认为安哥拉需要小规模部队而非大部队。因为在森林地带无法容纳大规模的坦克部队。

如果遇到外国侵略，我们有小批部队在那里。由步兵

团、坦克团、大炮、防空防御系统组成，可以迅速地转移与调遣。

此外，通过情报机构我们得知南非拥有7个战略性核武器，我们得把这些考虑进去。美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可仍旧允许南非拥有核武器。一件核武器可以一次毁掉一大批军队。我们必须建立不易受攻击的小规模部队。

崔：我们也必须考虑补给线的长度，供应这样的小规模部队，工作量不会很大。

邵黄：于是，我们同苏联人展开长时间的讨论，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但是，时间最终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与南非的谈判

考贝尔：蔡，您是什么时候到安哥拉的？

蔡：我1980～1981年在安哥拉工作。那时我担任那里的空防部和空军的副首领。总司令员和革命军空军部（FAR）部长任命我与安哥拉方面一同组织建立安哥拉空防部和空军。

因为涉及要和苏联人紧密地合作，所以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苏方提供武器，我们提供人员。

考贝尔：从安哥拉回来后，您做什么工作？

蔡：1981年回到古巴后，我在空防部和革命空军防空防御部（DAAFAR）担任许多不同的领导工作。

1986年12月，国务委员会任命我为驻维德角大使，一直工作到1992年。期间，在萨尔岛（Sal Islands）——该岛是维德角群岛的一部分，与南非在奎托夸纳瓦累战役后在这里达成了停火协议。后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政府间协议，但南非、安哥拉、古巴代表团之间的基本协议是1988年7月27日在萨尔岛达成的。协议的主旨是：如果要古巴装甲部队在到达纳米比亚边境前停止推进，并撤退到安哥拉南部库内河（Cunne River）北线，南非将永远从安哥拉撤出。

在萨尔岛（Sal Islands）达成协议的那一天，当时恩里克•阿塞维多（Enrique Acevedo）将军的坦克旅前锋部队作为先遣队已经渡过库内河（Cunne River），随后还有许多旅跟随其后。事实上我们差不多已到了纳米比亚的边境。南非对此事件感到震惊，在萨尔岛（Sal Islands）谈判时，还有一件轶事。

正如我所讲到的，南非提出，如果古巴军队停止向纳米比亚边界进军，并返回到库内河以北，他们愿意永远撤出安哥拉。这条界线由南非划定。古巴军事代表团研究那条界线后，发现界线非常靠近库内河。如果下雨，

那个地区就会变成沼泽地，坦克将无法从那里通过，部队会陷入真正的危险。如果战争重新开始，成百上千的装甲车只能任人宰割。于是我们的代表提出了一条距离纳米比亚更远的界线。

建议提出后，南非的反应是："古巴人原来不坏呀！"

大约一年之后，在萨尔岛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以检查协议的实施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南非代表团由对外关系部第一副部长凡•赫登（Van Heerden）带领，他曾经处理了安哥拉问题，此外还有4个将军。而我们的代表团团员只有雷欧保杜•森塔•弗拉斯将军和我。

南非起初试图收买我们。凡•赫登（Van Heerden）开始解释说，南非每年支付5亿兰特（2亿美元）来维持纳米比亚的现状。他说，如果边界上和平，他们准备继续向纳米比亚支付这笔钱。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他们不会支持非洲国会（ANC）和其他运动。他们实际是要我们背叛，换而言之，是向纳米比亚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施加压力，出卖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我国政府的领导当然不会同意。

在会议上，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卡洛斯•阿尔达纳（Carlos Aldana）转身对辛特拉•弗里亚斯将军（Cintra

Frias）说：“将军，告诉凡•赫登先生，我们已经撤出多少武装力量了。”

普里托（Polito）说出士兵、大炮、坦克的数量后，凡•赫登（Van Heerden）张大了嘴巴。他知道，虽然撤出了那些兵力，我们在安哥拉南部还有上千门大炮、坦克以及其他的机动部队。

“在古巴，你们留着那么多坦克和大炮干什么用？”凡•赫登问道。

我们的回答是：“可能地方国民自卫军部队会用他们”[1]。

他的嘴巴仍旧张着，显然，南非人无法抵挡那些向纳米比亚边境推进的军队。

整个古巴都是安哥拉的后盾

沃特斯：邵黄将军，您的职责是什么？

邵黄：1976年我在安哥拉工作。在距离我们这个小国1万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我担任军事行动的后勤部长。

我记得，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报道说，美国政府对我们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感到震惊。文章谈到超常惊

[1] 见译编，地方国民自卫军（Territorial Troop Militia）。

人的后勤供应时说，“战壕里的古巴士兵甚至不缺少哈瓦那酒吧里的朗姆酒。”当然，那是无稽之谈。或许，他们正想着美国士兵如何获得节日火鸡和冰淇凌。

当然，我们有物资支持。作战至少需要一定量的后勤支持。我们可以办得到，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所有必需的资源都会被利用上。

这得归功于那些有勇气登上老式英国飞机的朋友们。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哥拉行动开始时，那些已经废弃的4马达动力螺旋桨飞机实际上已经不能用了。我们额外安装了一些燃料罐，让它们能够抵达远离西非海岸的萨尔岛。飞机起初得在圭亚那（Guyana）停一下，以补充燃料，然后才能到萨尔岛。乘坐这样的飞机飞行，必须要勇敢，敢于冒生命危险。这项行动的早期，我记得共有过10次这样的飞行，我还参加了其中的一次。后来，苏联给我们提供伊尔62（IL-62）飞机飞了几次，来运送我们的队伍。

我们运送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和大量的战略物资，那是一个使用几个港口的秘密行动。我们使用商船进行海上运输，这种事情只能由像古巴这样有团结精神的国家才能完成。

我再说一次：对于这些国际主义使命，我们是倾尽整个

国家的力量去做的。因为，我们感觉到那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并没有运送哈瓦那酒吧的酒，可我们确实保证了基本物资的输送。我们保持了一条1万公里的补给线。那是只能由像美国、俄罗斯那样拥有大量空军和海军舰队的强国才能做得到的。例如，美国的军队可以制定紧急计划，使其军队在两个战线同时发动战争。他们有这样的军事实力，他们有部队供应，也有后勤供应。

作为后勤管理人员，我个人对我刚才提到的《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很感兴趣。可是这种成果，是因为在保持军队的供给这一目标下，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方可达到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我所提到的这段没有被完全记录下来，但却是真正的丰功伟绩。

从人性的角度讲，我们的部队前往安哥拉是国际主义使命的一部分。那也是我们的人民默默无闻奉献的一部分。他们不问某人被送到哪里去，我们也不能告诉他们。一个团的人会从卡马圭（Camaguey）的努埃维塔斯（Nuevitas）港口登船。此事件会流传为哈瓦那军团要在革命军空军（FAR）国家实弹演习场进行实战演习，而实际上这个团可能会在夜里秘密登船，在没有一艘护航舰的情况下航行，船只很容易沉没，试想一艘载着1000名士兵的船很容易受到高速海盗船发射的火箭炮攻击。我

们在冒险，那就是我们不得不秘密进行的原因。

总有一天军事院校得好好研究一下。有人会问："这些事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显然是因为全民参与的原因。

崔：毋庸置疑，这项行动是基于古巴全体民众的支持。人民可以明白领导人的意图，他们对菲德尔作为领袖有信心。尽管战场在安哥拉，他们完全了解来自古巴的指示和命令，并遵从它们。

非洲历史的转折点

考贝尔：在美国，人们对古巴所做的，援助安哥拉和非洲其他地方所进行的抗击帝国主义的事件知之甚少。

但了解这些会有很大的益处。

崔：在20世纪70年代，在非洲大陆葡萄牙帝国有三个主要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在这些地区的独立问题上，我们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然而，这些事实并没有被怎么强调过。

以几内亚比绍为例，由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arl）领导的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GC）请求古巴的援助，为他们国家争取独立而战。1973年，在打败葡萄牙军队后几内亚比绍绝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的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个事件震惊了葡萄牙政府，也导致了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the Carnations）。由此更导致了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Sao Tome）和普林西比（Principe）独立的“多米诺效应”[1]。

蔡从担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起，就很了解那段历史。

安哥拉的例子尤其值得特别关注。我们的军队在那里同安哥拉人民一起战斗了15年之久。我们不仅帮助他们打败了南非军队，还帮他们铲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促成了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们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为古巴带回任何物质利益。只带回我们的伤亡和责任完成后的满足感。

邵黄：历史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不只是为安哥拉而战，从战略性的眼光来看，我们在同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确，自从我们在奎托夸纳瓦累打败种族隔离主义的军队后，他们才被迫坐到谈判桌前，承认纳米比亚独立，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灭亡的进程。

[1] 葡萄牙独裁统治于1974年垮台（见附录汇编：葡萄牙人民革命）。莫桑比克于1975年11月独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于1975年11月独立，安哥拉于1975年11月独立。

安哥拉巩固了古巴革命

沃特斯：这对古巴自身有什么影响？并非每个人都愿意花费这么多资源这么多时间在这一问题上。非洲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如何巩固古巴革命的？

崔：我们的思想意识得到了巩固。我们前往非洲的人都研究过南非的奴隶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压榨和剥削。我们研究了殖民主义者所带来的和仍然制造的恶果，过去我们只是从书本上有所了解。

就我个人为例，到了那里，亲眼看到了殖民体系是什么样子。白人——欧洲人——这里指的是葡萄牙人，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是如何受到剥削。我们看到在安哥拉这样一个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他的人民却生活在非人类的环境里。因为他们国家的财富被窃取了，因为殖民主义者没有保护那里的森林和土地。

有时，我们开车，路上的行人听到汽车的动静就会跑掉。一开始我不知道原因，后来才了解到，在葡萄牙统治时期，如果当地人民不给汽车让路，殖民主义者就会开车从他们的身上轧过去。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好几代人的身上了。于是，他们一听到有机动车来了，便会跑

得远远的。他们跑掉，是因为在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虐待后，他们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我从这次国际主义行动中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完全理解了殖民主义对当地资源进行的残酷掠夺和对当地人民进行的赤裸裸地剥削。看看像安哥拉这样一个拥有极大自然财富的国家，人民却面临着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了解真相加强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一阶层，他们也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例如，我第一次到马德里，那是12月，一年中的寒冷季节，在格兰维亚（Gran Via），在那个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上，我看到有些人睡在靠近暖气通风口的人行道上，身上盖着袋子和报纸。

你在书上会读到这些事情，你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但除非你亲眼看到，你才能完全理解卡尔•马克思作品的真实性。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些人从国际主义使命中学到的一课吧。我们的医生、运动员和其他一些到过许多国家的专家们都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包括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也很落后，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形成了巨大反差。资源并没有被用来帮助大多数人民群众。而如此的落后并不只是在非洲，在美洲也是如此。

例如，玻利维亚拥有许多的锡矿、石油和天然气。然

而，却十分落后。厄瓜多尔，情况也是一样，尽管它是最主要的石油输出国之一。很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非人类的环境之中所造成的。只有看到这些现实情况，你才能理解问题有多么严重。同这些现象的直接接触，加深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那些使命加固了我们的理解。

通过外交使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现实问题。我能看到华盛顿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带给这些国家的苦难。

有一次我和佛得角的国家书记，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谈合作的问题，他人挺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错。“美国大使就这个问题和我们谈过，”他告诉我说，“并威胁说如果我们的立场是如此如此，他们就会切断对我们的经济援助。”你会读到类似的东西，可当你亲自听到时，感觉就不一样了。当时我是外交官，我有机会体验到这一点。有时，你不能公开地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我认为，佛得角应该做出声明，可他们没有。这些都是友好的国家，他们避免公开讲些与美国利益有冲突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崔：正如蔡所说的，这种经历增强了我们所有人的政治觉悟和人生观。但受影响最大的是士兵们，在安哥拉

和非洲其他国家，他们完全了解到——无知、苦难、缺乏教育、缺乏卫生条件和健康保障——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的东西。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一次，我们杀了一头猪。我让一个古巴士兵把一条猪腿送给安哥拉人。安哥拉人拒绝了，说他们不想要。当我们问及原因时，他们说他们想要猪的内脏。那就是殖民者“主人”过去经常给他们的，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口味。他们真的不喜欢吃其他的东西，因为他们不习惯。

我们的国际主义战士注意到，有些东西那些国家的人民缺少，而我们古巴人民不缺少。总而言之，他们学到了一系列关于当今世界不公平、非正义的课程，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世界上有许多人，诋毁我们帮助其他国家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态度。但在古巴国内，这让我们那些去战斗并帮助他国人民的年轻人的政治觉悟和人生观得到了升华。他们知道自己所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随后对他们的使命感到自豪。你找不到一个比“五英雄”更好的事例了。他们因为所担负的国际主义使命——保卫古巴人民免受恐怖主义袭击，而受到帝国主义的监禁。他们属于这一代年轻人，其中三人曾经在安哥拉服役过[1]。

邵黄：在同伴们描述的事情中，还要加上我们的青年医生到别的国家后的一些经历。他们很难过，他们亲眼看到患者由于贫穷而死去。这种事情不会在古巴发生。这样的生活经历比上100堂马克思主义课更有意义，它大大地锻炼了我们的年轻人。

现在我们没有国际主义战斗任务，可我们却有其他使命，如向其他国家派遣医生、老师等。这些简单的事实对那些去过资本主义国家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居住过的同伴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那也是我们三个在成长中经历过的，而非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经历过的。

你可以对你的孩子们讲许多过去的故事。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哥哥姐姐会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马查多的独裁统治。他们告诉我那些年的经济大危机，但这种感受与你所看到、感觉到、亲自体验到的感受完全不同。如果有

---

❶ 1998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逮捕了10人，并大吹大擂说他们在佛罗里达发现了“古巴间谍网络”。2001年6月6日，5名被告——弗南德•冈察雷斯（Fernando Gonzalez）、雷内•冈萨雷斯（Rene Gonzalez）、安东尼•古利洛（Antonio Guerrero）、赫拉尔多•赫尔南德斯（Gerardo Hernandez）和罗蒙•拉巴尼诺（Romon Labanino）——每个人都被宣判“阴谋作为未登记的外国代理”罪。古利洛、赫尔南德斯和拉巴尼诺还被指控“阴谋进行谍报活动”，赫尔南德斯被指控“阴谋暗杀”罪，五人被判刑期从15年至最长可达两倍生命外加15年。这5个革命者——每个都被命名为“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不得不接受所定的罪名——“革命渗透美国的反革命团体并向古巴政府提供反对古巴人民的恐怖袭击活动的计划”。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对这5人的定罪、判刑以及被拘留时的严酷待遇表示谴责，并要求释放他们。

2005年8月，亚特兰大联邦上诉法庭推翻对“五英雄”原来的指控和宣判，下令在另一个地方进行新的审理，裁定在迈阿密塔德郡的宣判是“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政府及其代理的偏见，审理周围的群众和其他群体的事件造成了被告不能得到公正审理的状况”。

雷内•冈萨雷斯（Rene Gonzalez）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作为国际主义志愿者战士在安哥拉服役，弗南德•冈察雷斯（Fernando Gonzalez）和赫拉尔多•赫尔南德斯（Gerardo Hernandez）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那里服役。

人说，“资本主义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是那样的”，那不是一回事儿，要去体验。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去体验，那些出去的医生、教师、技术人员、专家们，会把他们的体会传达给他们的家人。

沃特斯：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使命，对古巴的防御准备有什么影响？

邵黄：我也想谈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场战争对我们很有用处。超过300000名古巴人在安哥拉经历了战争。五角大楼在作分析时，必须把这些也考虑进去。

现在有些事情已经不再是机密了，比如先前的一些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顶级机密的文件。这些文件十分具体地揭示了美国政府是如何权衡他们的决策。肯尼迪问五角大楼的长官，“如果入侵古巴他们会遭受多少伤亡。”他被告知，“预计头10天的伤亡是18000人，代价非常高，会遭受很大的损失”[1]。

在“导弹危机”中，正如总司令所说的，我们没有人害怕，也没有人畏缩。我们的人民万众一心，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就是五角大楼必须要考虑到的内容。

[1]《创造历史》一书对此情节有过描述。

全民战争

沃特斯：邵黄将军，您担任了近20年的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一职，能介绍一下物资储备是负责什么的吗？

邵黄：国家物资储备局成立于1981年。20世纪60～70年代，古巴政府储备物资，以备战时和紧急情况时使用。革命空军部有自己的物资储备。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成体系地增加物资储备，并建立了一个直接管理和监督这些物资储备的机构。

国家物资储备局的工作就是，积蓄物资以保证和平时期经济的正常发展和运行，并预防和减弱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而增强国家的综合防御能力。

沃特斯：您所说的国家物资储备局成立于1987年。当时由于古巴的工农联盟政府正在团结和联合格林纳达政府和厄瓜多尔政府，同时美国对古巴威胁不断升级。

邵黄：是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就是在美国打击革命活动的强硬政策面前建立的，当时里根刚就任总统，苏联也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并非在其核保护伞之下。关于这一点，劳尔已公开说明[1]。

我们就是在那时改变我们的军事原则的。我们采取了

[1] 1993年，接受《墨西哥太阳报》（El sol de Mexico）采访时，劳尔·卡斯特罗说，1981年会见苏联最高领导人时，包括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讨论如何回应美国日益升级的威胁。苏联领导人明确地告诉卡斯特罗，他们不愿意帮助保卫古巴抵抗来自美国的攻击。“我们无法在古巴作战，因为你们离我们有11000公里远。”卡斯特罗描述勃列日涅夫所告诉他的话，“你认为我们会一直不断地招惹麻烦吗？”采访也刊登在1993年的《格拉玛》（Granma）上。

全民参战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自己的军队和人民，让每一个男人，让每一个女人拥有一件武器、一支步枪、一枚地雷、一块石头，一切可以同敌人战斗的东西。

我们第一批后备军就是1980年建立的地方国民自卫军，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59年创建的国家革命自卫队。此外，大部分的人口由“生产和防卫旅”来组织。

许多朋友指出，我们并未在《反地雷条约》上签字。洛佩斯•古巴（Lopez Cuba）在《创造历史》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地雷是低等武器。我们虽然没有导弹也没有自动化武器，可我们必须自卫。再者，地雷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纯粹防御性的”[1]。

沃特斯：国家储备也是防御性的？

邵黄：我们建立储备的目的，准确地说，就是为了加强国家自身的防御能力。我们不希望在战时处于被动地位。赢得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战争发生之前就阻止它。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我们必须变得强大。

我们只有在2004年12月的“堡垒——2004”战略性演习[2]中展示了这些防御措施。整个国家都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演习，数万人参与了最后一天的演练。自1996年以来，古巴已经有10年没有组织这样的演习了。“堡

[1] 《创造历史》第42～44页。

[2] 2004年12月13～19日期间，古巴在全国举行代号为“堡垒——2004”的全国战略性军事演习，以防备美国可能发动的武力攻击。共有400万军民参加了演习，数百万古巴人重申了在遭到军事袭击时保卫国家的决心。——译者注

垒——2004”是由国防委员会主席领导的。它再次向人们证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侵略。

我们研究了美国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我们人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增强我们的整体防御。美国的战略是依靠高科技和军事力——空中力量和导弹，以最小的伤亡，迫使其他的对手屈服。他们在南斯拉夫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伊拉克也正试图这么做。他们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做得到这一点。

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美国凭借空中力量让南斯拉夫79天就屈服了。如果南斯拉夫可以再坚持几周，不断增加的反对轰炸的世界舆论就会改变战局。五角大楼正在分析陆路入侵会付出的代价，他们了解南斯拉夫的特性——在二战期间，铁托的党徒在山上修筑防御工事，后来不断改善其防御系统。我们也派军事代表团到那里研究南斯拉夫的防御系统。所有必需的储备都被贮藏在山上的隧道里。因此，美国79天的轰炸并未影响到南斯拉夫，甚至是1%的军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与五角大楼估算出他们在陆地战中可能伤亡的人数。那也是他们想尽力避免的。然而不论是什么战争，最后，你都得占领对手的领土。

有人冷漠地将美国的空中轰炸比作“电视战”。“今

天我们要轰炸电力设备，明天我们要轰炸这座或那座桥梁。”等等。然而他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打破了南斯拉夫政府继续作战的意愿。

但这在古巴不会发生。我们的人民和政府是一条心。我们这里的军官也不会像伊拉克的那些军官，会被收买。在瑞士银行开个账户，向军官们行贿，然后部队就不战斗了。

帝国主义者并非不能轰炸我们或侵占我们的领土。在越南，战争持续了10多年。美国部队死亡58000人。越南人民的抵抗，使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运动。最终，美国统治者们被迫从越南撤退。

假如古巴遭到进攻，仅需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越南战争大约1/10的时间。美军至少会死亡10000人。这是我们根据“堡垒——2004”中古巴军民所做的充分准备所估算出来的。在美国民众中，反战的人数会不断增加，正如过去在越南时一样。

为了坚持到战争结束，你必须得有储备。为了迫使帝国主义者决定是否在陆地上作战，让他们考虑到影响战争支持率的因素：伤亡人数，为了那样，你必须得有储备。

我们最重要的储备是我国人民的爱国心。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我们是个岛国。我们很容易被封锁。美国在1962年10月“导弹危机[1]”中就是这么

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多少石油，我们需要多少食品，来满足1100万居民的需求？我们不可能依靠国外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依靠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

所有的国家都有物资储备，而储备东西最多最杂的国家是古巴。不仅是燃料、润滑剂、药物、原材料，甚至还有纸张和铅笔——它们可以保证学校正常上课。

国务委员会有一项主席令，卡斯特罗主席在这项主席令中给储备政策作了定义。首先，他说："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状况，为了人民的温饱和健康，国家物资储备的增长、维护和监控是必不可少的。"

这就是储备所扮演的角色。2005年1月，菲德尔在国际经济会议上，当谈及古巴难以攻破的军事时，他说，古巴的经济也正朝着难以攻破的方向发展。

沃特斯：两个巨大的来自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应当引起领导阶层的注意，那就是电力系统和史无前例的干旱对数个古巴东部省份造成的影响。这些也是战略问题，也是与储备和古巴保护自己的能力有关的问题。您能不能讲一下您和您的战友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

❶ 1962年春夏，为应对华盛顿不断升温的准备侵略古巴的局面，古巴政府同苏联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1962年10月，紧接协议的签订，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要求苏联将其在古巴装备的导弹转移走。美国对古巴进行了海上封锁，同时加速了侵略古巴的战备，并对古巴发出核战警报。古巴的工农动员起来保卫革命。随着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相互交换意见，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0月28日，在没有同古巴政府商谈的情况下，宣布撤走在古巴的导弹。

邵黄：我们国家的电力网是在40多年前设计的。这个电网系统是那时我们同苏联友好关系的结晶。所有的石油、备品备件、电缆、技术，每样东西都是苏联提供的。可为了保证它在今天仍然能够持续运行，每一样由苏联生产的东西，像汽车、卡车、拖拉机、飞机等，都必须给它加一个相应的油箱，再加上备用的燃油。

整个电力发电系统由7个主要的热电厂构成，它们互相连接。这就意味着整个系统是脆弱的。如果一个电厂无法工作，就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严重的影响。去年马坦萨斯（Matanzas）的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电力设备涡轮机的转轴断了，那是我们利用法国技术建造的最现代化、最高效的设备。我们只好拆卸转轴，联系一架飞机，把它送到墨西哥进行维修。整个系统会因此变得不稳定。

因为电力危机，延长了设备的修理维护期。从特殊时期开始，我们在古巴大量使用原油萃取发电。尽管这种方法为我们节省了很多开支，可这种石油硫含量很高，燃烧不净，也就意味着需要更长的停机维修时间。

我们正在西恩富格斯（Cienfuegos）兴建的核动力发电站就打算用来完善这个电力系统，以减少它的不稳定性。第二座核电站计划在候桂（Holguin）修建。核电站能够增强并最终取代大部分现有的系统。计划是这样，

然而，胡拉瓜（Juragua）的综合系统是一个与苏联的共建项目，随着苏联政府在1991年的垮台[1]，这个计划也中断了。

这个项目已经投资超过10亿美元。为了完成它，还必须得再投入10亿美元。俄罗斯不会再投资了，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实力。

我们能靠谁来获得核燃料？叶利钦还是普京？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决定暂时停止这项工程。

菲德尔已勾勒出解决电力危机的一些措施[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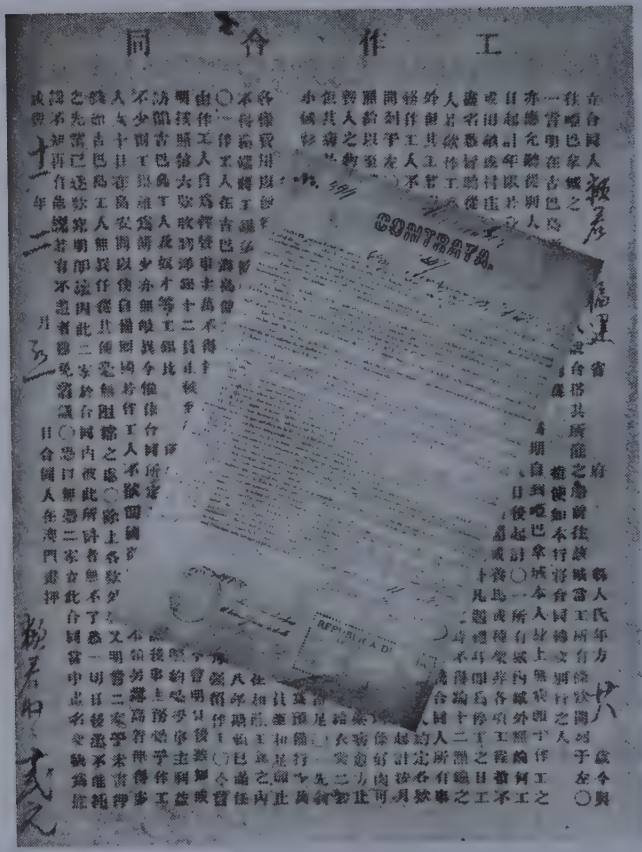
古巴于2005年已经把在这方面的硬通货储备翻了一翻。价值2.8亿美元的发电机及其他设备正在安装，这会在一年之内给我们增加100万千瓦的电量。我们计划使用更小更高效的发电机组，更加广泛地把它们分散于全国，从而可以减少长距离输送过程中电量的损失。这样做也会保护国家的电力系统，以可应对每年台风袭击给我们造成的电力中断。

最近在东部地区刚完成的新电厂，使发电量新增加了50万千瓦，新电厂利用石油的副产品天然气发电，同时增加在线发电设备的数量。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减少电

[1] 胡拉瓜（Juragua）的核电站的工作开始于1983年。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这个项目被封存。1997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对胡拉瓜（Juragua）的核反应堆重新继续修建。

[1] 卡斯特罗2005年6月26日的演讲，刊登在2005年7月31号的《格拉玛国际版》（Granma International），讲演中他指出了这些措施。

力消耗的措施。如供应新研发、更高效的压力橱具和电扇，修理电冰箱门的门封和恒温器，用节能灯取代白炽灯。截止到2006年下半年，这些措施有效地使供给生产、服务和国内消费的电量增加了一倍。



工作合同

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契约华工合同书，1861年。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19世纪大批华工来到美国修建铁路，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从美国移民到了古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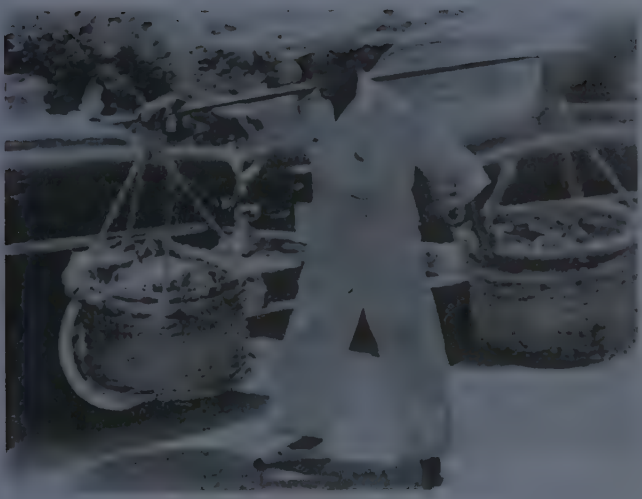
在古巴甘蔗园劳作的黑人奴隶。

1898年，古巴独立军士兵。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为纪念华人在古巴独立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古巴人民在哈瓦那市中心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座上铭刻着冈萨洛将军的名言：“没有一位古巴华人是叛徒，没有一位古巴华人是逃兵。”

“数以千计的华人投身于古巴独立战争中。根据记载，他们中没有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叛徒。”

19世纪40年代在位于哈瓦那的华人商会举行的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招待会。背景画中描绘的是1943年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和罗斯福、丘吉尔的合影。



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哈瓦那的华人小贩。

1952～1953年阿曼多·蔡（左）在父亲位于圣克拉的商店工作。

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期间，在古巴有4种中文日报。照片中，餐馆的一位老顾客正在阅读国民党在古巴办的报纸《民生日报》。

“我们很快意识到巴蒂塔政权的不公正性。因此当‘七·二六运动’刚一建立我们便加入了。”

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古巴民选政府，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建立了残暴的独裁政府。这是政变当天巴蒂斯塔和他的部队的照片。

为了推翻专制，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3年7月26日领导一批革命青年攻打古巴东部城市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照片中卡斯特罗和其他被捕的战士在事件发生一周后被带上法庭。

1957年3月20日，阿曼多·蔡（前排左一）在圣克拉拉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的学生游行队伍中。这次示威游行很快便被警察镇压。蔡和其他几名示威者在游行后被捕。

1956年11月，哈瓦那，遭受警察攻击的示威学生。

杰拉尔多·阿布鲁·冯堂

尼可·洛佩兹、冯唐和尼克都是“七·二六运动”青年旅的领袖，他们帮助邵黄走上革命道路。

1958年12月24日普拉西塔斯战役（battle of Plocetas）后的邵黄。

革命胜利后古斯塔沃·崔（左）和起义军坦克部队在哈瓦那城外。

“七·二六运动”哈瓦那地下党领袖塞尔吉奥·冈萨雷斯（右）。照片中，他正在印制地下革命报刊。1958年2月，卡斯特罗派邵黄前往哈瓦那劝说冈萨雷斯前往马埃斯特腊山区，然而冈萨雷斯坚持要留守哈瓦那，几天后他不幸被巴蒂斯塔独裁政府警察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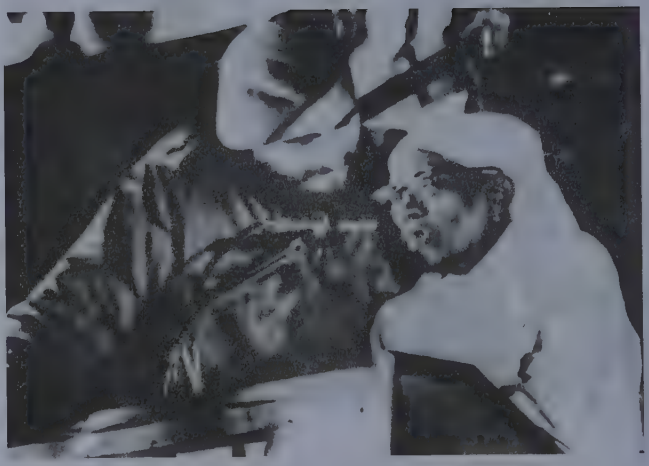
1958年末，阿曼多·蔡（后排，右二）和起义军战友在福门托附近。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率领得胜的起义军进入圣地亚哥市。当晚，在卡斯特罗对数万人发表演说的现场古斯塔沃·崔担任了护卫。

古巴华侨新民主同盟，古巴华人的一支革命组织，在1960年7月10日，支持将美国资本家资本国有化活动中的游行。

1960年10月2日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在哈瓦那华人街举行的盛大集会。一周后革命国民军的“何塞·黄旅”彻底清除了唐人街残留的毒贩、赌场和娼妓。

何塞·黄，是反抗马查多独裁政府的共产党一员，1930年被马查多独裁政府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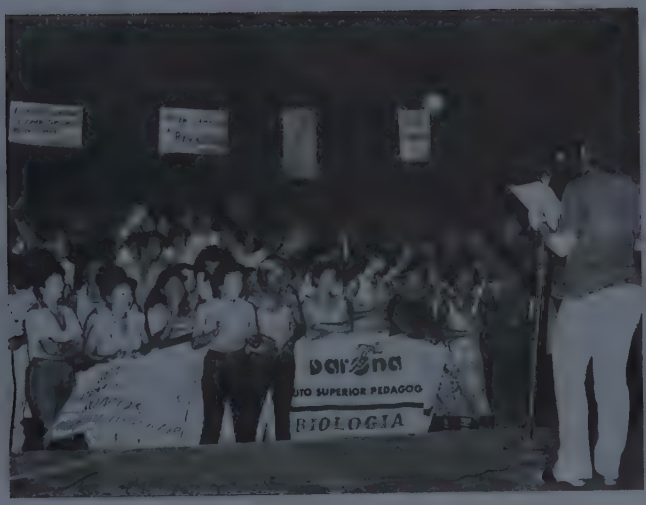
菲德尔和106岁老人玛丽亚，曾经是一名奴隶的玛丽亚在文化普及运动中学会了读书写字。

曾经是白人专用的、仅供富人享受的哈瓦那海滩。1959年革命胜利后，新政府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所有海滩对大众开放。

劳尔·迪亚斯·阿格勒斯，古巴援助安哥拉军队的首脑，在战役开始后不久不幸被地雷炸死。

1981年3月17日，阿曼多·蔡（中）在安哥拉。

1976年，邵黄（左二）在安哥拉北部布置任务。



1983年，欢送“切·格瓦拉国际主义教师支队”前往安哥拉。

古巴国际主义者（右）正在教安哥拉战士读书写字。

1988年，古巴部队在安哥拉修建公路。

1988年，安哥拉南部的古巴坦克纵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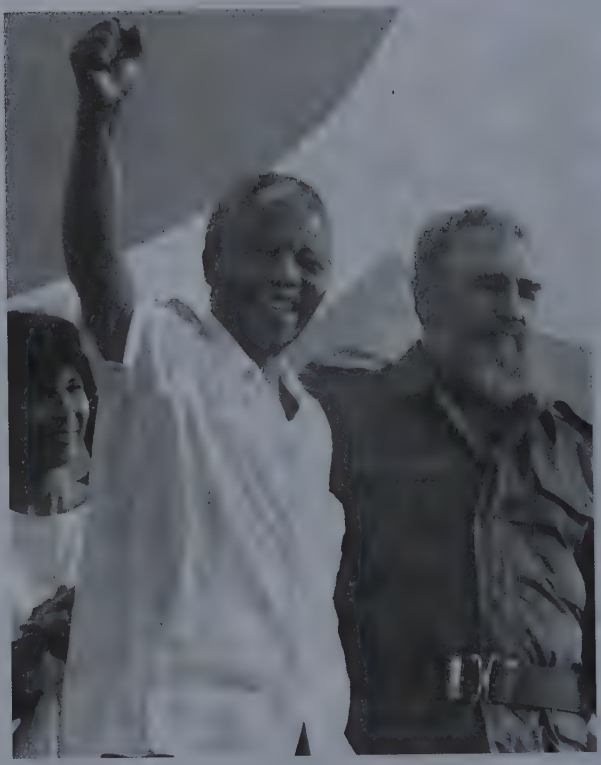
1987年，古斯塔沃·崔（前，中）在罗安达检阅古巴坦克旅。

1988年3月5日，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古斯塔沃·崔所乘吉普车，崔因此失去一条腿。

南非在奎托·夸纳瓦累的战败，使南非于1989年12月，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签署和平协议，照片中从左至右为南非国防部长马格纽斯·马拉恩（Magnus Malan）、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Pik Botha）、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安哥拉外交部长阿方索·范杜嫩（Alfonso Van Dunem）和安哥拉驻美大使安东尼奥·桑托斯·弗兰卡（Antonio dos santos Franca）、古巴外交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Isidoro Malmierca）和阿韦拉多·科洛梅·伊瓦拉（Gen Abelardo Colomé）将军。

1989年5月，哈瓦那，归国的古巴女子防空部队。

在约翰内斯堡欢迎曼德拉的人群。1990年2月曼德拉结束了他长达27年的牢狱生活。



1991年7月26日，古巴，曼德拉和卡斯特罗在马坦萨斯。“多少年来，我们非洲一直是那些想分割我们领土、破坏我们主权的国家的牺牲品”，曼德拉说，“其他民族为保卫我们而战是史无前例的。”

1991年末，城市农业项目开始实施，这一项目使古巴城镇、乡村的空地都变成了具有生产力的蔬菜农田。照片中是1987年12月27日，劳尔·卡斯特罗（中）在哈瓦那的有机农业测试基地，右侧是这项生产的先驱农业工程师阿诺鲁伊萨·佩雷斯（Ana Luisa Pérel），最左侧是卡洛斯·拉赫（Carlos Lage），穿格子花呢衬衫的是埃斯特班·拉索（Estéban Lazo），前排左侧是比尔马·埃斯平（Vilma Espín）。

在特殊时期，除了各方面资源的紧缺，古巴还承受了自然环境和社会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挑战，如哈瓦那港的维护。

1993年在候桂（Holguín）。为了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交通压力，古巴从中国进口了百万辆自行车。同时古巴开始大量生产自行车。

1994年圣克拉拉。自行车厂工人是由年轻人组成的。

1994年西恩富格斯（Gienfuegos）的农场。在原油供给紧缺的条件下，动物耕作代替了拖拉机耕作。

2003年1月，位于哈瓦那省的卡米洛·西恩富格斯糖厂，专门为工人开办的大学预科班。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青年在获得正常工资待遇的条件下进行学习。大学的拓展教育在古巴各地广泛开展。

为了确保边远地区的学校可以使用电视、录像机和电脑，上千台太阳能发电机被安装到最偏远的地方。

“青年共产党联盟”动员年轻人进行学校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兴建新学校，从而既减少了班级人数也提高了教学质量。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

古巴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时刻为古巴革命国防做好准备。2004年12月，400万名志愿者参加了名为“堡垒——2004”的全国范围的军事演习。

2001年12月，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工薪阶层走上街头反对政府为了偿还欠帝国主义的1320亿美元外债而采取的削减工资、社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开支。几天后，阿根廷政府没能偿还外债，导致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阿根廷再次陷入经济危机。

2004年4月，玻利维亚的游行工人穿过拉巴斯（La Paz），抗议油价上涨，呼吁将玻利维亚油气资源国有化。

2003年7月，古巴医生在委内瑞拉拉腊省（State of Lara）给一名儿童看病。1.5万多名古巴医生志愿者前往委内瑞拉行医，他们前往那些最偏远的地方，那些很少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医疗的地方。

在古巴志愿者的帮助下，以青年人为主要对象，委内瑞拉政府发起了大型文化普及项目。照片中是加拉加斯省偏远地区的一个文化普及班，拍摄时间是2003年7月。

2003年，加拉加斯的有机蔬菜农场。

2004年3月，在哈瓦那的一次游行。标语上写着“这将永远不会发生在古巴”。描述了现已公布的臭名昭著的美军伊拉克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虐待战俘事件。

沃特斯：旱灾呢？

邵黄：这是古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旱灾袭击了候桂、拉斯特纳斯（Las Taunas）和卡马圭省，超过250万人受到干旱的影响，我们必须用卡车给200万人民以及牲畜运水。卡马圭（Camaguey）省拥有大规模的养牛牧场。

虽然物资紧缺，我们还是做出修建两个大型水库系统的决定，同时修建大型管道通向受灾地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其中一项在岛中部地区的项目于“特殊时期”之前开工，可由于缺少资源、燃料、机械等一系列物资，项目被迫中断。现在该项目又再次启动。它能从国家中部向卡马圭运水。另一项工程在降水最多的东部山区毛阿（Moa）地区开工。我们要在那里修建几座大坝。管道、运河、沟渠系统将水输送向候桂（Holguin）和拉斯特纳斯（Las Tunas），并一直运流向卡马圭。

这都是大工程，会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沃特斯：在过去的15年，储备在对抗美国政府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十分重要，是吗？

邵黄：许多同伴并未意识到美国的经济封锁对古巴所造成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1]。

[1] 华盛顿1962年2月起，一直对古巴实行贸易禁令。随着1992年《古巴民主条例》（Torricelli法）和1996年《古巴自由民主团结条例》（Helms-Burton法）的颁布，贸易禁令更加严厉，试图加重古巴由于同前苏联和东欧贸易关系的破裂造成的经济危机。

我小的时候住在哈瓦那靠近滨海区的大道麦岭（Maleion）上。我每天看到来来往往的美国渡轮运送商品。那时，我们同美国的贸易非常频繁。

近年来，我们同美国南部地区和农业区的议员谈话。在国民大会我们接待了美国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国会议员。在革命胜利之前，新奥尔良36%的贸易是同哈瓦那达成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过去从那里进口大米、谷物、小麦和油。现在我们从越南、中国、马来西亚进口这些东西。我们甚至不得不从新西兰进口奶粉、从法国进口小麦，而美国仅在90英里之外。仅计算一下运输、差价和相应的成本，经济封锁已使我国损失了800亿美元。

“没有储备的领导就不是好领导”

考贝尔：您是什么时候成为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的？

邵黄：从1986年开始。这不是我第一次担任类似的工作了。早在革命战争中，菲德尔就让我担任过一段时间起义军物资储备主管。就是那时，他也称此为“战略性物资储备”。

“你是物资储备的主管，”他说，“好好干！”

我们把战略物资储备存放在拉普拉塔指挥岗的一个小山洞里。这些物资包括10袋325磅重的粗糖、5盒浓缩牛奶和5箱罐装香肠。

过了一段时间后，卡斯特罗到前线视察，经过这里。

“这里进行得怎么样？”他问道，“物资储备得怎么样了？”

“将军，只剩下6袋糖了。”

“6袋，怎么会是这样？过去有10袋呀。”

“呃，有人过来说，他没有吃的东西，后来又有人和他的士兵路过这里，他们也没有吃的，于是就给了他们一些糖。”

“该死！”他大叫，“我只是让你负责管理战略储备物资，你并没有分发一件东西的权利，甚至是一勺糖。”

他再也没有同我说糖的事。可是几天后，桑切斯（Celia Sanchez）给我带来一张菲德尔写的便条。上面写道：“把物资储备交给奥图（Otero）。从现在开始，你专门负责分发肉食。——菲德尔”

我被撤职了，然后被任命了个虚职。那些日子，我们根本没有肉食。

记得是在1986年，我被召集到中央委员会，并被通知政治局通过决议，任命我为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

“部长，”我对劳尔说，“我可是马埃斯特腊（Sierra Maestra）的第一位战略储备主席，”我向他讲述我是如何管理马埃斯特腊的储备物资，如何被菲德尔撤职。接着，我说：“请转告总司令，如果我工作不力，有什么遗漏，他还可以把我撤掉。而我不会再因为未经批准而擅自使用储备物资而被撤职了。”总司令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储备物资如何使用的人。

当我回到“国家物资储备局”的办公室时，我开始意识到那10袋325磅重的粗糖意味着什么。一克糖有4卡路里能量，一杯糖水提供1200卡路里的能量。拥有它，你的体重可能会减少，可你却不会死掉。拥有那些储备物资，在马埃斯特腊的那200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差不多2个月时间，那时我懂得了拥有物资储备的重要性。

有一个谚语，深刻说明了真理：“没有物资储备的领导就不是好领导！”

沃特斯：“特殊时期”对物资储备的影响如何[1]？

邵黄：“特殊时期”之前，我们绝大多数的物资供应都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来自苏联，因此并未感到

[1] 20世纪90年代前期，古巴在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后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造成古巴损失了85%对外贸易。为应对这次危机，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一时期被称为“特殊时期”。更多关于“特殊时期”的内容见本书第三部分。

需要进行物资储备。

我们于1981年建立国家物资储备局。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这个部门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的所属问题，我们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起初，它从属于国家技术物资供应委员会（CEATM）。到1985年年末，考虑到未给予物资储备的发展充分重视，决定将国家物资储备局从国家技术物资供应委员会中分离出来，直接由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指挥。

我把起初那段时间称为“迷失的十年”。就所有机构和官员而言，都缺少应对不测事件时对物资储备重要性的意识。尽管有总司令的指示和“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的号令，然而我们还是必须要针对这项工作展开广泛的讨论。在“特殊时期”，有许多官员争论说：“如果连足够吃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还怎样储备备用物资？”

“特殊时期”显示出我们曾经浪费了资源，我们原本可以积累更多的储备物资。这也显示出了物资储备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国家物资储备使我们拥有燃料，以防止基本经济功能的瘫痪，保证农业和蔗糖的收割以及工厂的运转，食品保证基本的定量供给、药品拯救人的生命以及防止医院倒闭；甚至还有铅笔和笔记本，以保证学校正常开放。

在“特殊时期”，我们取得了进步，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政府使用了来自各国的捐赠物资，而我们并不把这些捐赠物品用于物资储备。“古巴人民友好协会”和“对外投资与协作部”负责记录捐赠物的收入和分配情况。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物资储备，就是2001年11月袭击古巴的密歇尔飓风。靠着储备物资，我们在一年之内，就修复了飓风造成的所有损坏。我们可以依靠所储备的燃料、食品、建筑材料、房顶材料、电线杆和电缆等一系列物资。我们有能力处理7个省160000户人家遭到的毁坏，其中有13000户的房屋被彻底毁掉。

2005年7月丹尼斯飓风连续袭击了10个省，毁坏了175000多户人家，其中有28000户完全被毁掉，总计损失达14亿美元。这是自1959年以来，我国所遭受的破坏性最强的飓风。这次飓风的强度达到了“萨菲尔—辛普森”[1]的5级，它的风力强度每小时超过300公里（185英里）。古巴东部的一些山区生态遭受巨大破坏，至少需要50年才能恢复。

[1] “萨菲尔—辛普森”，飓风等级。用于分类飓风（位于大西洋或东北太平洋，大于热带风暴强度的热带气旋）。它根据飓风的强度把飓风分为1～5级。级数越高代表飓风的最高持续风速越高。——译者注

同古巴的做法相比，我们看到自然灾害在那些远比我们富有的国家所造成的后果。他们远比我们富有，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前一阵子，我读到了一篇关于佛罗里达州人民的救济要求，他们之前遭受到安德鲁飓风的袭击。安德鲁飓风1992年袭击了那里，他们称之为“世纪风暴”，人们仍在等待政府解决飓风袭击后遗留的问题。他们还未收到美国政府10多年前所承诺的援助物资，已经等了整整10多年了！

可我们在密歇尔飓风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修复好了一切。由于农业也遭受到了影响，我们额外提供了大量大米、谷物和油给那些受到影响的省份。这就是我们处理自然灾害的方式，我们现在正在以这种方式处理丹尼斯飓风所造成的破坏。

特殊时期和以后的日子

由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造成的食品短缺，小型城区菜园——有机菜园——在古巴城市和城镇的空地上建立起来。此图是访谈中提到的建在哈瓦那米拉玛区的有机菜园，它成为第一个生产和商业成功的样板。标牌上写着："在这里购买。"

面临食品危机

沃特斯：发展小型农业，特别是在城镇，一直是古巴在“特殊时期”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每个市区创建的有机农业（organoponic），是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古巴所面临的食物短缺。这一举措显而易见使大多数古巴人获得了更多好质量的新鲜蔬菜。现在，从事有机农业的劳动力与传统的大型农业一样多。

邵黄将军，您是实施这一项目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您所处的位置为我们谈一谈这件事情吧。

邵黄：那我就从一开始说起吧。

1959年革命胜利时，80%的可耕地都在古巴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家族如洛克非勒、杜邦和摩根手中，他们控制了如联合水果公司和古巴电力公司等大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例如，美国控制的古巴-大西洋糖业公司，拥有近60万英亩土地；联合水果公司拥有近30万英亩；在卡马圭还有上万英亩的牧场。

革命前期，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在1959年，第二阶段在1963年——土地所有者所占有土地面积不得超过5卡巴耶利亚（caballerias）[1]。凡超过5卡巴

[1] 卡巴耶利亚是在古巴采用的度量衡单位。1卡巴耶利亚相当于13.4公顷，5卡巴耶利亚约合67公顷或165英亩。

耶利亚的土地都要国有化，美国寡头公司及古巴资本家拥有的大型种植园的土地都要划归国有。事实上，尽管政府给予他们一定补偿，但那些土地所有者还是离开了古巴[1]。

按照土地改革法，将剩余土地分给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干活的收益分成的农民、佃农、合法占有者或甘蔗种植者。在革命前，这些农民大多数是在一小块土地上耕作，通常以出产的一半来交付租金。然而，这些土地却不属于他们。因此这场革命也是农民自己的革命。使他们拥有5卡巴耶利亚土地，签订了成千上万份拥有土地的契约。

通过土地改革，约20%的可耕地为小户农民所有，80%的属于国有。与其他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一样，我们革命中的一项政策就是不重新分配大片土地。那是菲德尔和其他领导人非常明智的决策，我们在这80%的土地上建立了国有糖业生产企业和大型养牛企业。

起初，苏联与我们建立了互惠贸易关系。当苏联出售给我们的石油涨价时，我们也会提高卖给苏联的蔗糖价格。即使国际市场价格已经下降到每磅10～15美分，苏联也会以每磅不低于40美分的价格支付给我们。我们的大部分蔗糖都是以这种形式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同时苏联也获益于这一贸易，因

[1] 以公债补偿土地所有者，20年到期，每年以4.5%的利息分期偿还。土地的价值按照土地所有者自己在1958年为税收目的所申报的价值而估定。

为苏联在国内加工糖菜，每出产1磅糖都需要80美分的加工费。

我们围绕着那些关系来组织整个古巴的农业生产，我们也经常因以这种方法来发展农业而受到指责。但我们却因此而有能力建大坝、水库，为农村地区供电，建成我们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

事实上，到1989年，古巴每公顷可耕地拥有的拖拉机的数量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都多。古巴有750万公顷的可耕地，相当于1200万英亩，1989年，我们拥有11万辆拖拉机。拖拉机那么多，而燃料又很便宜，因此，人们不仅仅把拖拉机用于农耕，甚至用于运输，他们开拖拉机去兜风、去见女朋友。

从这一点来说，与苏联建立经济关系对像我们这样的小国是有利的。而苏联通过我们长期稳定向其供应食用糖和其他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

沃特斯：正如菲德尔在1960年所指出的，从起初革命的日子里，粮食自给自足和农业多样化就成为革命的目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几年前古巴蔗糖部部长乌利塞斯•罗塞雷斯•托罗（Ulises Rosales del Toro）就此问题提醒国民议会，因为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稳定的贸易，致使农业多样化的战略推迟了。蔗糖的生产和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对粮食种植意味着什么呢？

邵黄：古巴曾经是一个蔬菜出口国，这里曾有一个从哈瓦那到美国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市港口，从哈瓦那到美国全程只需7小时。我家曾在马雷贡附近（Malecon）住过，我仍旧记得蒸汽船佛罗里达号驶入港口；我曾经看见满载西红柿、豆角、生菜的卡车将这些蔬菜送到这艘船上。

但现在我们成了蔬菜进口国，用蔗糖交换来自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罐装、瓶装蔬菜。

“特殊时期”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一夜之间古巴进入了“特殊时期”。整个国家几乎瘫痪，我们不得不采取我们在战争年代所采取的措施。由于军事封锁或外国侵略，供应链受到影响时采取的措施。在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口燃料并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资源，我们把这种措施总称为“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

按照长期贸易协议，我们每年曾以特殊的价格从苏联得到1300万吨原油，像我所说的，用我们的蔗糖换来的。突然，我们不得不开始以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600万吨原油。我们85%的贸易是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进行的。以前我们用20亿美元就可以进口价值80亿美元的货物，现在我们仅能用20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少量原油以及基本的食品和药品。我们从国外购买商品的能力几乎下降了80%。

那些大量消耗汽油的拖拉机停了下来，公共汽车停用了，中国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上百万辆自行车，你们还能否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百万辆自行车，哈瓦那开始看起来像中国的北京了。百万辆啊！

1993年面对经济危机，为了拯救革命，政府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是我们不喜欢的，因为这些措施增加了不平等。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保证全民在诸如健康、教育、食品、住房及其他必需品方面基本需求的社会。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一个措施就是使美元自由流通，而这种流通先前是为法律所禁止的[1]。建立了农业市场，农民在那里可以自由定价直接向人民销售其产品，开放了自主经营权，那时著名的“私房菜”餐厅（Paladares）出现了，就是那种12座位的家庭餐馆，它的名字取自当时巴西流行的肥皂剧，我们开始扩大国际

[1]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的崩溃，比索价值猛跌。官方公布的汇率是1古巴比索=1美元，到1993年夏，美元交易在黑市上，为150比索=1美元。1993年7月，美元的流通合法化，商店可以收美元并出售进口产品。当“特殊时期”的经济衰退达到顶点，生产开始恢复，兑换率稳定在大约25:1。

旅游业，而且我们开始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并创办合资企业[1]。

我们只得停止提供很多免费的东西，比如，我们开始对棒球之类的体育活动收费，尽管收费不高。现在的收费是多少？1比索？2比索？比美国低多了，在那儿一场棒球赛的门票是50或100美元。

我们不喜欢因美元产生的不平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办了美元商店。美元商店的建立是为了通过硬通货来使大家受益，有些美元商店甚至被称为硬通货商店（Tiendas Recaudadoras de Divisas）。

有机菜园的建立

沃特斯：城镇小规模菜园的根源是什么？

邵黄：我曾提到，在“特殊时期”初期，我们采取的一项措施是扩大旅游业以带来硬通货。但是旅游饭店的增加，使得对新鲜蔬菜的需求量也增加了。我们不得不从墨西哥、牙买加等其他国家空运蔬菜，我们的飞行员称运输蔬菜的飞行为“耻辱的飞行”。旅游部门得花费3.5万美元支付那些运载西红柿和生菜的飞机的单程运

[1] 为了加大对古巴经济的压力，华盛顿加大封锁古巴，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作为回应，2004年11月，古巴政府宣布不再允许美元在古巴自由流通。当古巴人收到美元时，他们以及旅游者必须把美元换成所谓的比索兑换券（CUC），并支付10%的附加税。旅游饭店、餐馆、出租车和美元店现在只能接受比索兑换券。

费，因为那些蔬菜不是在古巴种植的。

有一张拍于1987年12月27日的照片，拍摄时间是“特殊时期”开始的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劳尔•卡斯特罗、比尔马•埃斯平（Vilma Espin）和卡洛斯•拉赫（Carlos Lage）在视察部队。

在这次视察中，劳尔遇到了名叫阿诺鲁伊萨•佩雷斯（Analuisa Perez）的工程师，他利用大焦前期培芽技术（plantain pre-germinators）种植蔬菜并获得很好的收成。劳尔便下令发展并推广这种种植方法。这一指令到达了军队，从此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有机农场”，这个名称源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投入的大部分生产原料都是有机物。

奈斯特•洛佩兹•古巴将军是第一位开展有机种植的。他的部队所占的面积仅有1公顷大，也就是2.3英亩。当时，他领导着古巴东部第50师，那里的有机农场就建立在部队总指挥部的旁边，由军人家属和士兵共同种植。洛佩兹将军曾经是一个农户，他很喜欢种地。

在哈瓦那建立了一支称为“奥德法”（Hortifar）的武装部队中心，主要生产蔬菜。有机种植园最早是在部队里发展起来的。但在民事部门蔬菜仍然依靠进口。

当第四届党代会于1991年10月在古巴圣地亚哥举行时，“特殊时期”刚刚开始。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当前

的工作重点是食品项目，要生产足够的食品以供应国内需要。

12月初，我们在国家储备学院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建立有机菜园。54天之后，收获了第一批生菜。我们清理了大街旁边的一块空地，建立苗床开始种植。我们从1991年12月5日播种，1992年1月28日收获了第一批生菜，这一天也是何塞•马蒂的诞辰纪念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1991年12月31日，在“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军事委员会上，我向部长（劳尔•卡斯特罗）汇报我们已经开始建立菜园了，当时有许多人批评我们说：“你们怎么在特殊时期用混凝土砖和水泥，浪费这么多极其缺乏的材料来建造一个菜园呢？”

劳尔回答他们说：“我知道一些领导批评邵黄，”他说：“但是他们必须以他为榜样来生产食品。再说，我还是有机农场的教父呢。”

然后，劳尔问我：“那么，你打算生产多少呢？”

我听说在中国，每年每平方米的土地能生产25千克的蔬菜（55磅），所以我告诉劳尔，“我想我们每平方米能生产25千克。”

一个同志拿出一个计算器：每平方米25千克，那就是

每卡巴耶利亚7.5万英担（每33英亩生产750万磅）。

“7.5万英担每卡巴耶利亚，你疯了吗？”每年能在每卡巴耶利亚生产任何1万英担东西，都决非是小数目！7.5万英担可是非同寻常啊！

我说：“是啊！就让我们试一试吧！”

我们是怎么样开始的呢？首先，我们指定两位同志。一位是项目负责人，一位是植物学家，然后从学院招来志愿者工作组。在1992年、1993年和1994年这三年里，我们每平方米的产量都超不过10千克。

1995年初，我们请求允许建立新的补偿体制，取代古巴原有的补偿体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古巴，农耕是最辛苦的工作之一，尽管在传统农业中使用了拖拉机、收割机以及其他机器。然而，每个农民月平均工资仅有148比索，而古巴平均工资是250比索[1]。因此，我们请求提供新的激励体制。它更像一个合作社，土地是国有的，像1993年在国有农场基础上建立的合作生产基本单位（UBPC，类似中国联产承包性质的生产基层单位），让我解释一下这个体制是如何运行的。

在有机农场工作的工人可拿到225比索的工资，包括

[1] 这组数据与2005年前的工资相等，比2005年4月公布的古巴最低工资每月提高了100～225比索，约有160万工人，包括大部分的农民受益于该措施，使古巴每月的平均工资涨到了312比索。

费用在内，工人们对所有的投入都得付费，如电费、水费、种子费等等。50%的合作生产单位的净收入分给工人，这是第一项原则。

第二项原则：股份不同，利润分配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

第三项原则：负责人的收入比收入最高的工人多10%，作为承担管理责任的奖励，这种做法的主要优点之一是，那些管理的人，即承担最辛苦工作的人，应该得到与产出相应的报酬。

在其他国家，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委内瑞拉，中间人获利最多。生产者，即农民生产者得到的最少。在所有不发达的国家都是这样，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尽管我们是国有分配和市场经济。

1995年底，我向军事委员会汇报，我们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0公斤的产量了，“那么是什么创造了奇迹呢？”他们问。

没有任何“奇迹”，我说，我们所取得的成果要归功于系统的管理和持续地精耕细作，每天工作8小时、9小时、10个小时，直到日落，每天必须给植物浇水、照料。你应该在12月31日、1月1日和圣诞节来看看，没有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休息，移苗要在每天下午4点以后，否

则太阳会伤害农作物。你必须除草、施肥、间苗、制造有机原料以及其他所有的事情。

结果是，在如此小的一块土地上，每年能生产出60吨蔬菜。就是每平方米可耕地出产30千克，每公顷达到300吨，真正精耕细作的农业。

这真是一场利用城市周边所有空地使经济腾飞的运动。

我们把它称为有机农业而不称为有机耕作，因为有机耕作及有机产品需要得到国际的认证，是由国际代理机构来制定标准的，他们来检测污染程度等；但实际上，我们几乎不使用任何化学产品，我们使用有机原料和生物控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我们的农场为有机农业生态型农场。我们的科学家努力找出用生物控制来消灭虫害，首先，因为化学杀虫剂很昂贵；其次，化学杀虫剂会污染环境，这也是我们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利用有机原料和生物控制技术，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生产。

我们采用由以色列发明的本土化的灌溉系统，使用最少量的水达到非常有效的效果。这种方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无论是在因为干旱还是受到敌人的攻击而导致供水被阻断的情况下，我们都能种庄稼并能为整个国家培育种子。

运动的发展阶段

1995年，全国仅有257公顷的有机农业基地。那时很忌讳说一个工人每月能挣上千比索。1997年劳尔•卡斯特罗来到我这儿，那时我们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在我四楼的办公室看到外面的有机菜园，他的结论是，一个人通过艰辛劳动，每月挣1000比索并不是犯罪，这是他公开说的。

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转机。到2003年，我们已拥有4.5万公顷的有机和精耕细作菜园。1994～2004年，蔬菜的产量从4200吨增加到近400万吨。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传统农业生产的总产量。至2004年底，有38万多人在从事小型城区农业生产，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数是42万。其中从事城区农业的工人中8.2万人是妇女，还有年轻人、中等技术人员、将近4万退休人员和1万专业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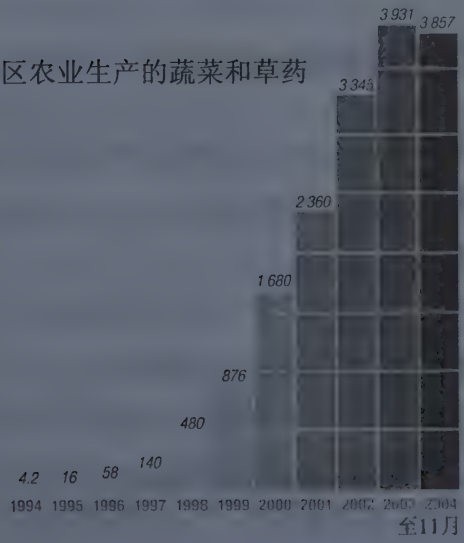
如果计算一下，你就会发现每公顷地有20人耕作就可以进行有效生产了。关塔那摩的失业率从2001年的7.1%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降到5.1%，而圣地亚哥从9.1%降到2.9%，格拉玛则从10.7%降到3.4%。近年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的是农业，其创造了将近8万个工作岗位。到

单位：公顷（≈英亩）

城区农业：已开垦的

单位：千吨

通过城区农业生产的蔬菜和草药



2003年底，全国总失业率为2.3%，国际上认为小于3%的失业率是非常好的。

“特殊时期”强迫我们来发展这样的农业，尽管这就像一场巨大的战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现在认识到古巴是一个可以大规模地发展小型农业的国家，这也是世界人民所需要的，即发展生态型和持续型农业向世界人民提供所需的食品，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我们之所以能在古巴发展这种农业，是因为古巴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古巴的农业生产不是受到资本主义企业的驱使，为了寻求垄断市场和增加利润，而是受到为生命和健康提供丰富食品的驱使。

城镇农业体制的组成部分

在古巴从事城区农业的体制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农业生产也不同，但都属于城区农业。

有国有企业。

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它由那些把土地集合在一起的农民组成，他们共同拥有土地并集体耕种。

有信贷服务合作社。这里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工地，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但相互合作，共享服务和设备，接受政府贷款，他们选举出一个合作社的董事会。

有先前提到过的合作生产基本单位。这种单位始建于1993年，是由先前的国有农场重组转型为合作社。他们的土地属于国家，但其生产出的产品属于在那里的合作社成员。

还有自家后院。人们也在自家的后院种地。

最后，有自留地，任何想要一块土地自己耕种的人都可得到。

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城区农业，简单的小型农业，没什么特别的。它举世闻名。

起先我们不能那样称呼它，因为当时我们总的政策是要发展大型农业、大企业。小型农业是被禁止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新名词——城区农业。

但什么是城区农业呢？所有那些在哈瓦那及周边地区的农田都属于城区农业。凡在首都半径10公里内的都被定义为城区农业，城中心半径5公里以内的，每个拥有1000人社区半径1公里以内的，都被划为城区农业，没有什么不是小型农业。在其他市和周边地区以及小村庄也是如此。

这就是小型农业如何在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城市的也是农村的。

这种农业没有增加潜在的食品消费量，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FAO）建议成人每天摄入300～400克的蔬菜，不能少于300克，以获得人体需要的维他命和矿物质。

这很重要，因为传统的古巴饮食包括大米、豆类、块茎类和肉类，古巴人吃蔬菜很少，也许只在圣诞节时我们才吃西红柿、生菜、水萝卜。不像中国和其他国家，古巴人没有吃蔬菜的习惯。

所以2001年，这也成为思想和教育改进的一部分，菲德尔指示，儿童看护中心和学校应该从城区农业系统中获取食品，这是从哈瓦那开始实行的。每一个有机菜园、集约型果园或合作社都与某个学校建立联系，并且向儿童看护中心、养老院、医院等单位提供食品。

例如，我们国家物资储备局一号有机菜园，早在1992年就开始这样做了，那时给第五大街对面几个街区外的日托中心供应蔬菜。现在这家企业把产品供给三家儿童护理中心加上卡萨罗费尔南德兹（Cesareo Fernandez）小学，我们是这些孩子的教父与教母，今天也将会去那里参观。大约400名儿童每天在那里吃午餐，每人每天蔬菜摄入量为125克。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饮食习惯开始转变。

拿菠菜为例，我们开始种植菠菜，过去人们不习惯吃菠菜，人们称之为“瞪眼食物”！菠菜富含铁，医生把

它作为处方药开给体重不够的儿童。因此菠菜的消费量增加了。人们开始习惯食用菠菜，现在人们开始购买菠菜。冬天，菠菜生长较缓慢，因此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就像牛皮菜一样，人民需要，大家开始吃了。

沃特斯：你们是怎样组织分配有机菜园生产的食品？

邵黄：直接销售给大众。首要原则是：就在生产的地区销售。

沃特斯：没有其他的分配方式吗？

邵黄：有，比如都市园艺公司拥有一间仓库，他们买进产品，然后通过国营市场，卖给宾馆与旅游部门。这样的大企业与农民有合同，也有自己的有机菜园。

我们有建立在需求与供给关系上的自由农贸市场。还有其他的价格固定的市场，就像我们这儿一样，销售价格不能超过已定的销售最高价格，这种市场被称为“多巴多”（topados），意思是价格有封顶。

沃特斯：“多巴多”是国营的吗？

邵黄：是的，市委每月开一次会来确定价格，例如，在冬天，随着生菜产量的增加，其价格就会下降，但在夏天价格就会上涨。每月都有价格表。哈瓦那有大约70家市场，大部分的产品都来自城区有机农场，劳动青年军也为这类市场供应产品，尽管他们的农场在乡村而不

是城镇。

我前面所提到过的，农民市场的价格完全不受控制，这又属于另外一种市场。

沃特斯：农民为什么在定价市场上卖东西呢？他们不能在没价格规定的市场上赚更多的钱吗？有什么奖励吗？

邵黄：许多农民把产品卖给定价市场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产品运到自由市场去卖，他们还得付费给中间商。因此他们与“多巴多”签定合同，这样价格便宜，消费者也可以受益。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环境

沃特斯：蔡将军，您现在是国家“清理哈瓦那湾工作组”主席。古巴政府决定在“特殊时期”对环境问题作出巨大挑战。就像邵黄将军所述的对粮食危机采取的政策一样，环境问题也同样是需要政府加强的吧！就像菲尔德指出的：“总有一天，我们要为‘特殊时期’立一座不朽的丰碑！”

哈瓦那湾是怎么变得如此不堪入目的呢？清理的项目是如何产生的？

蔡：哈瓦那湾及其港口承担了古巴进出口的重任，尤其在殖民时期，70%的进口都通过哈瓦那港，但不包括

90%的蔗糖和镍的出口。蔗糖工业部拥有自己的港口，而镍由船只直接从毛阿（Moa）运走。

革命以前，你也可以料到，该港的临海生态系统没有受到不同区别的防污染保护，在革命胜利后的前几年中，人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清理保护该港的策略没有坚持到底。

不光是这个港，海道、支流和流域，大约覆盖了70平方公里的海域都存在重大的污染问题。现在哈瓦那湾有104家企业污染着那里的海域。

更不用提那些排水系统了。从1913年开始建设排水系统到1915年结束，当时哈瓦那有30万名居民，所建的排水系统多于当时人口的一倍，即供60万人使用。可现在这个系统供80多万居民使用，多余的水没有足够的排水系统，导致街道上产生积水。

随着1959年革命的胜利，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但对于污染的防治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前，哈瓦那省级和市级都设有环境委员会，也有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某些地区也有环境委员会，但没有专职的机构负责清理哈瓦那湾。

1996年、1997年和1998年初，我们刚从“特殊时期”中最糟糕的时期走出来，古巴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联合国金融组织共同研究了这一污染问题，找到了该港环境的致

命污染源。1998年6月15日，部长议会执行委员会投票通过建立一个国家工作组来清理、维护和发展哈瓦那湾及其支流地区。这个机构被称为国家保障工作小组（Grupo de Trabajo Estatal para el Saneamineto, Consenacion y Desarrollo de la Bahia de La Habana，简称为GTE-BH）。

国家工作组的领导一致通过采取研究后的方案和清理海湾的21条建议，这些建议也成为国家工作组工作规划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期清理项目的实施期为10年，第一个10年期分为两个5年计划。2004年标志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成绩是鼓舞人心的，实验室采样和水质检测结果表明污染程度有所降低，与此同时，空气质量也有所提高。鱼类又可以重归故乡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以鱼类为生的塘鹅和海鸥。

虽然取得了这些小小的成绩，水质状况仍然很糟糕。

对集约型环境和公共卫生的努力仍需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机构和一些国外政府的共同协作，其中包括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与日本的协助。

与此同时，省农业代表团也开始对海湾的支流盆地地区开始进行绿化，随着2007年计划的完成，我们将种植100万颗小树苗来绿化和净化首都的空气，保持水土不至

被大雨冲刷流失。

在省社区服务理事会的协助下，我们首先在港口区域建立分类垃圾回收体系，然后扩展到整个海湾地区。

我们与公共健康部一起在海湾出口处建立了一个有7台大气监控站的系统——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类似系统。这个系统将会自动发现任何空气的负面变化及这些变化的原因，还能使卫生检查员确切地知道大气污染源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我们正在鲁亚诺（Luyano）河畔建立一个大型的水处理厂，这条河是海港严重的污染源之一。这项工程将在2006年中旬完成。这一设备能在1秒钟内处理和净化1000升的污水。2005年初，我们在布亚（Buya）河畔开始建设另一项工程，以解决污染最严重的鲁亚诺（Luyano）河流域，因为鲁亚诺的河水流经圣米盖尔•德帕德兰（San Miguel del Padrdn），那里有古巴最多的工厂，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工厂的数量，工厂废水都流入鲁亚诺河，而且，生活在河岸两旁的居民废水也都流入该河。

政府的政策是加强对鲁亚诺河沿岸的监控，改变生产和迁移那些污染海湾地区的企业。例如，那里有4个屠宰场，其中3个杀牛场、1个杀猪场，对其进行迁移，从而结束对河流的有机污染源。

关于污水管，我们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援助，他们准备建设流入哈瓦那湾及其支流流域的雨水排水系统，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在2008年前为该项目筹集资金，计划于2020年实施完成。

考贝尔：工作组有权强迫实施他们的决定吗？

蔡：是的，我们被赋予管理哈瓦那湾和海湾流域地区的权利，而且我们为每个人包括政府部门制定了海湾治理标准。

例如，上星期，我给基础工业部部长写了一封信，反映尼科•罗伯（Nico Lope）石油提炼厂有大量溢出的石油污染海湾并对水源状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基础工业部部长也是政治局委员。我们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执行任务的，没有任何省级或市级委员会有我们这样的权力。

除此之外，任何人打算更改位于海湾或海湾流域地区工厂的位置，或建立一个新的工厂，都必须向我们提交申请。我们分析这些项目，然后通知科学技术环境部（CITMA）我们的决定。如果我们同意，科学技术环境部就会同意，如果我们不点头，科学技术环境部是不会通过的。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些污染实体归11个不同的部门负责。它们分布在首都15个市政局的10个之中。每个市政局都有一个副主席和市环境委员会负责环境，除

此之外，还有省级环境委员会。在围绕海湾和海湾流域地区有42个人民议会，这些都是基层管理的领导主体[1]。

因此，我们在工作中涉及了许多组织和个人，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我们敢于面对它并战胜了这次挑战。

别人开始仿照我们，西恩富戈斯省政府最近也计划了同样的项目来清理西恩富戈斯海湾，古巴圣地亚哥也有同样的打算。

哈瓦那港

沃特斯：另外一项和您有密切关系的责任就是对哈瓦那港口的管理吧！

蔡：我是哈瓦那港口交运部的代理人，我掌管港口的行政管理事务，这在古巴是一件新鲜事。

对于港口的管理曾有一项法规，许多变动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2002年制定了一项新的法规，建立了港口管理系统，并在哈瓦那开始执行这项法规。那时我成了管理哈瓦那港口的主席，就像国家工作组一样。这在古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经验。

[1] 1992年，人民议会在古巴附近的城镇、乡村和农村地区形成。这是当地的“人民权力”机构，以召集选举政府成员。大部分人民议会是由选举团加上群众组织（工会、妇联等）选出的代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当地主要的社会机构和企业组成。人民议会负责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和该地区的服务，最大地增加群众参与和解决发生的问题，他们为当地现存的实体提供便利设施，监控项目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是港内海事管理，组织并安排到港船只到指定停泊点，监督卸货及货船的分流和出港。

沃特斯：历史上，港口工人是古巴工人阶级中阶级意识和战斗力最强的阶层之一。

蔡：是的，非常有战斗力，非常革命。

沃特斯：……港口工人大部分是黑人。

蔡：是的，事实上，在港口，古巴的码头装卸工就是“最下等黑人”的代名词。而如今码头装卸工不仅有很高的工资，还可以从自由兑换货币中得到红利。根据停泊船只的数量，他们每个月可挣50或60美元，甚至到100美元。这比他们每月的基本工资220～350比索要高出许多，行政管理人员和办公室人员挣得少些。那些最下等的码头装卸工，搬运麻袋、卸船、装车的挣钱最多。

港口工作是24小时，7小时20分钟换一次班，特殊情况下码头装卸工可以同意工作一班12小时，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除此之外，对上班工人的需求还给予特殊的照顾，尤其是那些困难和繁重的工作。例如，码头装卸工在极其酷热的仓底工作时，有人会常常给他们送些冰水。

考贝尔：您所描述的内容反映出一个不同的社会现状，古巴的工人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是不同的。

蔡：这也是我想讲的一点。

沃特斯：让我们再回到哈瓦那海湾的清理工作上来，

在“特殊时期”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很引人注目。

蔡：20世纪90年代初，当菲德尔公开解释为了革命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同时他也指出：“我们并不仅仅要战胜‘特殊时期’，还要继续发展。”为清理、维护和发展哈瓦那海港而成立的国家工作组是一个鲜活的例证，我们已经战胜了困难，而且在不断地发展。

沃特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强权政治统治下的国家，环境破坏的速度是惊人的。无论什么时候清理或保护环境，资本家都报怨花费太大。为什么在古巴有所不同呢？

蔡：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我们的总司令菲德尔强调，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恢复与保护环境，这样，才能拯救人类[1]。

不久以后，古巴国家议会修改和扩大了宪法第27号文件的内容，明确地规定了古巴政府和人民在恢复、维持、保护环境和人类文明中所承担的责任。峰会过后，我们是第一个积极响应的国家[2]。

---

[1] 在1992年6月12日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卡斯特罗向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主要是他们导致了环境极度的破坏，他们应该负责……报怨前殖民地和现在受到国际不平等经济秩序剥削与掠夺的第三世界国家，要他们对环境污染负责是不对的；解决的方法不能是阻止那些最需要发展的国家发展……不平等贸易、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外债务构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增加了环境破坏的程度。要想把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更好地分配地球的财富和技术。”

[2] 古巴宪法第27条中指出：“国家有义务保护环境和国内自然资源，应该认识到这与维持经济和发展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确保人类的生活更理性、当代和后代人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健康幸福。主管机构将执行这一政策，协助保护水、空气、保护土壤、植物以及一切丰富的自然潜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修定前的宪法规定：“确保公民的幸福，国家和社会要保护自然。这是权力机构和每个公民的义务，要保证水、空气的清洁，同时要保护土壤、植物和动物。”

在我国这一切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具有社会主义特性与责任；因为革命的最高领袖代表着大部分居住在地球上人类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或古巴民族的利益。

古巴、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

沃特斯：邵黄将军，您一直呆在委内瑞拉，是应那里政府的请求去帮助城乡农业项目的吧。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被派往委内瑞拉提供服务，如医生、护士、技术员、老师、体育教练等。这项活动进展如何呢？

邵黄：我认为在委内瑞拉发生的一切就是一场革命——玻利维亚革命。由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iuar）展开的自由和拉美团结的旗帜，被那些有能力对抗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及民族寡头政治的人民再次举了起来。乌戈•查维兹主席是一个有魅力、诚实、爱国的玻利维亚领袖。

委内瑞拉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国家，那里不仅有石油，还有许多没有开发出来的财富。是一个有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水和矿产资源的国家。渔业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在内的矿藏资源（包括铁、铝土矿、金子和钻石）都极其丰富。

然而委内瑞拉有80%的人处于贫困状态，还有很多人处在赤贫的状态。你只要去加拉加斯（Caracas）的塞罗斯（Cerros）看看，就可以看到这里80%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是发生在世界五强石油输出国之一的情况。委内瑞拉是世界第三大向美国供油的国家，每天能生产300万桶原油。

据说，1958～1998年，由石油工人创造的利润达到7000亿美元，可是却有200多万人是文盲，许多人不能享受医疗保健和教育。从1959年推翻皮埃尔·利门内（Perez Limenei）的独裁统治以来，所谓的民主政府在这40年中都做了什么呢？从委内瑞拉劳动人民手中窃取了7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那就是他们管理的结果。

所以现政府执政以来推行的是查维兹（chávez）提倡的社会革命，他们强调的是社会项目。大约在头三年的时间里，查维兹政府无法推行他的观点，因为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de Venezuda, S.A.）手中。表面上看它是国有公司，然而政府并没有可用的资源来推动社会项目的进程[1]。

这不像古巴革命那样，因为查维兹的当选并没有造成寡头政治家们和富人们离开委内瑞拉。1959年古巴革

[1] 1975年委内瑞拉政府实行石油国有化。外国公司和委内瑞拉资本家拥有的公司成为国有财产时，新成立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仍在先前的私人管理者手中。

命胜利的头两年，工人和农民进行了土改、工业国有化，并制定了其他社会措施。当这一切发生后，所有的富人、庄园主、公司老板和房产主纷纷离开古巴迁移到迈阿密。委瑞内拉却没有发生此类事情，这些人仍然在国内，绝大部分的经济支柱，如公司、工厂、市场、商店、运输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富人手中同样控制着媒体，基于这些因素，委内瑞拉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首先帝国主义支持武装力量发动了军事政变，但被镇压了下去。接着出现了石油政变，最近又撤销了公民复决投票权[1]。在粉碎军事政变企图；以压倒性优势重新恢复公民复决投票权的事件中，波利瓦尔革命者和人民武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地位也越来越强。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现在成为金融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来源，推动社会和经济计划向前发展。例如，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巩固扩大。这就使委内瑞拉在国际舞台上成为重要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一个石油输出国。更重要的是，其在实现拉美一体化的艰难道路上起到了表率作用，实现了波利瓦尔和马蒂的梦想。由查维兹和菲德尔2004年在哈瓦那发起的

[1] 在2002年4月的一次军事政变中，查维兹和他的一些部长和政府官员们被逮捕。成百上千的工人纷纷从卡拉卡斯附近贫民区冲出来以示抗议，由于群众对查维兹政府的支持，军队分裂，两天之后军事政变失败。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迈出了反对美国通过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建立霸主的重要一步[1]。

古巴的合作

考贝尔：古巴国际援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邵黄：1998年大选胜利后，查维兹接受了我们的支持与协助。在1999年11月瓦格斯（Vargas）灾难之前[2]，古巴为了回应其提出帮助的请求，派谴了由上百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这个医疗队团结一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为受害者和整个委内瑞拉提供了帮助。他们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从那以后，通过两国签订的协议，我们继续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

“进入郊区”（Barrto Adentro）是首批项目中的一个，最初始于2003年，项目是从加拉加斯（Caracas）山区开始，然后扩展到整个国家，这是一项医疗合作项目，古巴的医生在最穷苦的地区工作。

---

[1] 2002年12月，以美国为靠山的资主义势力举行“大罢工”反对查维兹，企图击跨政府。事实上，这是个老板不准工人进厂以胁迫工人接受条件的运动。它由国有石油公司带头，使委内瑞拉的经济几乎瘫痪。后来工人动员起来恢复生产。在这两个月期间，由于民众反对，罢工失败。因为组织这次行动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大多数当政者被解雇。2004年8月15日，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对派通过撤销公民复决投票权的方式再一次企图取代查维兹。全国的工人、农民组织起来以超过59%的反对票击败了这次企图。

[2] 1999年12月泥石流和洪水持续袭击了委内瑞拉加勒比海岸，造成5万多人死亡，瓦格斯州受灾最严重。

同时，查维兹主席请求在发展文化项目中合作，在古巴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1961年我们调动了10万年轻人去教100多万人读书、写字，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扫除文盲，后来，我们发展了文化项目的设施，增加了葡萄牙语、英语、法语甚至克里奥耳语种的学习。我们在海地、非洲和许多其他地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向我们提出帮助的原因。

我们的教师带来了录像机，使所有年龄段的学生加快了学习的速度。在古巴，教师要在不会读写的家庭住上一年的时间，甚至最偏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以传统的学习方法，教他们怎样使用铅笔、练习册和入门课本。在委内瑞拉，通过64个半小时的录像课程，一个成年人能在7周内学会了读、写。这项实验首次在400人中进行，看看是否会有问题，结果表明，87%的学生在7周内学会了读书和写字。

这一项目扩大到很大的范围，被称为“鲁宾逊任务”❶（Mission Robinson），有上万名委内瑞拉年轻人参与，军人也参加了，在全国配备了5万间教室，每个教室里都配置录像机、电视机、教学材料和其他设施。

这些都是委内瑞拉人自己完成的，据说我们派了上万

❶ 鲁宾逊任务是以西蒙·罗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而命名的，他是西蒙·波利瓦尔的老师。罗德里格斯的笔名是鲁宾逊·克鲁索这是因为他热衷于丹尼尔·迪福的小说。

名古巴老师，但这样说是不准确的。我们所提供的只是经验和计划，由委内瑞拉教师自愿自行组织和领导班级。150多万名委内瑞拉人已学会了怎样读书和写字。不久以后，这个国家就宣告成为“没有文盲的国度”。

但教育计划不会在这里停止不前，因为“鲁宾逊任务II”在继续，这也就是在我们古巴称之为“六年级之战”的项目。这一项目在古巴持续了近10年，使国内每个人在10年内达到6年级水平。在委内瑞拉，人们非常自信，使用视听教材可以使人们在近2年内就可以达到6年级水平。为实施“鲁宾逊任务II”的配套教室也已经建好。

然后，出现了“里巴斯任务”（Mission Ribas），这个任务是有关继续教育的，使人们达到中学毕业。还有“苏克雷任务”（Mission Sucre），其涉及近40万高中毕业生，以前他们不能进入大学[1]。这些毕业生边学习边工作，每月可以得到100美元的奖学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进入大学　政府把一些原先属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管理大楼改成了加拉加斯波利瓦尔大学。

那就是教育计划。

医疗援助是继“进入郊区”　计划开始后实施的，查维兹说，任何人想请附近的古巴医生看病，只要说一声

[1] 这一项目是以何塞·费利克斯·里巴斯（Jose Felix Ribas）（1775～1815）和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Antonio Jose de Sucre）命名的，两个人都是委内瑞拉独立战争和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导者。

就行，因为反对派试图在他们控制下的省和市区阻挡实施“进入郊区”计划。

在4～5个月内，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了1万名医生。这些医生在最贫困的地区工作，通过“家庭医生”体系，约有1700万委内瑞拉人有了就医的渠道[1]。

委内瑞拉正在重新设计他们的医疗体系，从最基本保健所到综合诊所到医院，还有一些私人诊所和私立医院，当然这些医院大多数劳动人民很少去或去不起。重新设计的公共卫生体系基于防疫、医疗，由附近的医生来处理，每个医生负责120户人家。

委内瑞拉还成立了600个诊断中心，包括35个高技术中心，有重病治疗室、牙科、眼科、康复治疗室和配有最新型设备的临床实验室。

除了普通医生，还有几千名牙医。其他一些服务设施仍然在建设当中，如眼睛保健站。“鲁宾逊任务”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许多人因为视力不好、看不清而导致无法学习。所以发出了30万副眼镜，包括一些渐进镜片和视力检测仪器。为成千上万的各种疾病的患者看病，对于白内障和患有其他眼病的人还有一个特别计划，叫做“手术奇迹”。

[1] 2005年中期，有15000名医生、3000名牙医、1500名眼科医生、1500名护士、技师、其他古巴医务人员以及6000名委内瑞拉医务人员参加了“进入郊区”项目。

派谴上千名体育教练也是“进入郊区”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组织体育课和娱乐项目。他们已经组织了普及运动、儿童运动和老年健身运动。

我参加的古巴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就是发展集约蔬菜种植，即小型城区农业，其范围不仅在加拉加斯（Caracas），而是遍布了整个委内瑞拉。

城乡农业项目

考贝尔：那是怎样开始的？

邵黄：2000年，担任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部部长的雅克•迪奥夫（Jacques Diouf）先生是塞内加尔人，他访问哈瓦那时，参观了我们的中心，我向他解释了我们发展有机农业的项目。

2003年2月，迪奥夫先生去了委内瑞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委内瑞拉制定了食品安全措施计划●。当时石油公司发动的反对查维兹的政变刚刚被击败，委内瑞拉发生了食品危机，因为大的食品仓库所有者都参加了这次经济破坏阴谋。

迪奥夫告诉委内瑞拉政府说，生产食品最快的方法就

● 联合国食品农业组织有一个食品安全措施特别计划，主要目标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通过迅速扩大食品生产和生产力来改善他们的食品安全措施。”

是城区农业，古巴就是这方面最有经验的国家。因为查维兹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朋友，迪奥夫建议他给菲德尔打电话，让邵黄将军来帮助他。

在48小时内，我便坐在飞往委内瑞拉的飞机上，同行的有阿道夫•罗德里格斯•诺达尔（Adolfo Rodriguez Nodal），国家热带农业基本调查研究所所长兼国家城市农业集团总裁；还有米利亚姆•卡里昂•拉米雷斯（Miriam Carrion Ramirez）和米盖尔•萨尔辛内斯工程师（Miguel Salcines）。

通过联合国食品及农业组织项目，他们已经开始在委内瑞拉发展有机农业。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在委内瑞拉呆10或12天来指导他们的专家，然后每隔两三个月去委内瑞拉查看其工作进展如何。与预期相反，我们在那呆了2～3月，然后回古巴工作15～20天。

2003年2月20日，我们到达委内瑞拉，2月25日，我们向查维兹总统展示了我们的经验。3月15日，查维兹总统举行了Fuerte Tiuna有机农场的典礼，3月28日在加拉加斯市（Caracas）中心的“波利瓦尔1号”农场（Bolivar 1 Farm）举行了另外一场典礼。

“波利瓦尔1号”正好位于市中心，在双塔和加拉加斯希尔顿大酒店（Caracas Hilton）附近。委内瑞拉人民提供了一块空地，像个公园，这里曾经布满垃圾。当我们

设计的时候，我们试图使之与周围环境相和谐。“我们不能砍掉这些棕榈树，”我说。然后，我们想到应该把它设计成像委内瑞拉圆形广场那样。所以我们在中间建了一个水箱，上面设有喷泉，苗床是圆形的，非常有艺术感。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我们面对着与古巴相同的困难，大众缺乏对有机农业种植的理解。

但城区农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此外，还为委内瑞拉提供了食物的来源，这些项目对社会形成了真正的影响。

保卫委内瑞拉，保卫古巴

沃特斯：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古巴提供援助的运动。

邵黄：反对派对查维兹政府大肆诽谤，特别瞄准古巴的医生。他们断言：“古巴的医生都是不合格的内科医生，他们抢了委内瑞拉医生的工作。”反对派还试图指责查维兹政府利用这些医生使委内瑞拉社会“古巴化”[1]，不过最终还是失败了。当然，同样的运动也在美国发生。

加拉加斯的4家商业电视台都属于反对派，政府只有

[1] 2003年6月，委内瑞拉医疗联盟（FMV）向法庭起诉，要求禁止古巴医生在委内瑞拉行医。法院裁准了他们的请求，但被高院否决。2005年7月，一些委内瑞拉医疗联盟成员在加拉加斯市市中心抗议并指责古巴志愿医生抢夺了委内瑞拉医生的工作。

一个电视台，其设备又老又过时。实际上，委内瑞拉几乎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属于反对派，不过他们一切的反对宣传都失败了。

反对派曾攻击古巴医生提供的医护质量，他们甚至散布有一个孩子因治疗不当而死亡的谣言。但是人民大众这个坚实的阶层支持并接受古巴提供的援助项目，因为“进入郊区”项目不仅提供每天24小时的医疗护理，并且免费发放105种不同的药物，包括给每个糖尿病患者一支胰岛素。

据近期研究，这些志愿医生每月要看150万病人，估计已拯救了7000人的生命。怎样认定救活了一个生命呢？若不是及时给予治疗，病人就会死去，也就是说病人因为没有及时看医生或没钱去治病就有可能死去。

2003年CNN为古巴医生逃往美国事件而争吵不休，当时有1万名古巴医生在委内瑞拉，只有3～4人离开了，这占多大的比例？假如美国的大门突然向任何人敞开，每一个想要去美国的委内瑞拉人、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都能得到允许进入美国的签证，你认为有多少人会去美国？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许多拉丁美洲人都会去美国，因为他们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医疗和文化项目、“进入郊区”项目和“鲁宾逊任务”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我在委内瑞拉生活了近一年，能切身地体会到其巨大的变化。当我们在市中心公园建立第一个有机农场时，我问一些工人："如果你们没有查维兹的话会怎样？既然前政府在40年内没为你们做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查维兹呢？"

那时的回答是："我不支持他的原因是3年内他什么也没有给我，我仍处于贫困当中。"

但是现在大众的观念改变了，所有这些社会和经济项目带来了种种变化，这就是事实。

当我到了委内瑞拉时，我是第一个到加拉加斯的塞罗斯（Cerros）的古巴人，或者说，我是第一个菲德尔·卡斯特罗主义的古巴人，因为那里有其他的古巴人。我在那里转了好几天，来决定在哪儿建一个有机农场。就像许多拉丁美洲的城市一样，塞罗斯是个贫民窟，没有人会去那里冒险。例如，不住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贫民窟的人从来不会踏进这个地区，甚至连警察也是如此。若不得不来，也要鸣枪而来，就像墨西哥城的德比多地区一样。

但在委内瑞拉，我们和这些社区的人们协调，他们自发组织保护古巴医生的安全，古巴医生甚至比任何人都安全，因为当地的居民在看护着这些医生。

我记得委内瑞拉中央台近期的一个节目，当时他们

正采访那里的社区的居民。“看，我不是查维兹的支持者，”当他从委内瑞拉电视台看到一帮犯罪团伙时，那人说，“但是任何人敢动古巴医生一根指头，我就决不让他们，因为她救了我儿子的命。”这是典型的公众反映[1]。

这就是我们对波利瓦尔革命最朴实的贡献，它显示了我们所受的教育。起先我说过我们是在这样的精神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欠下了历史的债，欠下非洲人民、中国人民、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委内瑞拉人民、美国人民、波兰人民，所有那些为古巴独立而战的人民的债。因此我们有那样的责任，我们去委内瑞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的医生和其他志愿者都具有这样的精神。

有一天，当查维兹谈到他遇见一些古巴医生时，他说他打算送给他们一些床垫和床。因为，人们告诉他这些医生是睡在地上的。

但一个古巴人走到他的面前说：“不，总统先生，我们要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这个医生没有接受这些床垫。

“那个医生给我上了一课，”查维兹说。

沃特斯：古巴医生和其他志愿者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情况的课程。

[1] 曾经有一些对古巴国际主义医生进行人身攻击的事件，2003年，一个古巴医生在阿拉瓜德州（Aragud）被杀，第二年一个古巴医务志愿者的委内瑞拉助手在加拉加斯被杀。

邵黄：是的，崔、蔡我们三个人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活过，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1959年后出生在这里的年轻人是不知道的。现在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正在目睹人们没钱看病、上学、买食物。他们看到人们失业，这一切都是他们看到的现实，他们会自问，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在一个每天能生产300万桶石油的国家啊！

帝国主义者说，我们颠覆了拉丁美洲国家，他们称我们为“颠覆分子”。但拉美的客观情况没有别的出路。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巴西都是典型的例子。帝国主义能给予人们什么？资本主义、新自由典型或其他资本主义的变体能给予人们什么？这些都在整个拉丁美洲彻底失败了。

生活在加拉加斯塞罗斯的上百万贫民出来保卫查维兹政府，反对政变，帝国主义者害怕这些塞罗斯贫民。

当我在赛罗斯爬山时人们走过来对我说，“我们都是查维兹主义者。”

“我也是，”我回答说，“菲德尔、劳尔和切使我翻越了许多山，现在我已近70岁了，我仍然在爬山，为委内瑞拉而爬。”

他们看到我拿着相机，也许会认为我是个日本记者。

“不，”我说，“我是古巴人，是菲德尔领导的古巴人。”

意识形态斗争

考贝尔：您提到了当今古巴的“意识形态斗争”，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意识形态斗争”吗？

邵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想让世界各国人民都接受他们的文化和观念。他们在试图剥夺世界各地人民自己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工业和科技上的确有很高的成就，一些是他们自己研发的，一些是他们窃取的。现在他们控制着全世界的媒体和信息系统，试图利用这些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这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如此重要和复杂的原因所在。我们展开这次斗争主要是通过教育、教学和文化，以及我们为儿童和青年树立的榜样。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一项关于儿童教育的革命，就是马蒂曾提出的“教育人们得到自由”。如果我们不教育我们的儿童、青年，让这些未来的成年人自己去思考，他们如何能真正实现自由？他们又如何对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如今有计划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不再有蓝图可循，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当今国际现状调整国策。

在古巴革命以前，我们这里95%甚至更多人自认为是

反对共产主义的，尽管我们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知道。我们受《超人》、《泰山》和《黑鹰》这类连环画的熏陶。《黑鹰》是我很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描述了一些空军战士，角色包括一个瑞典人、一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波兰人。这本书把共产主义者描写成嗜血成性者。书中的中国人是一个厨子，名叫“切呀切”[1]，一个滑稽的带有种族偏见的角色。这就是资本主义者教导我们的，甚至在学校也是如此，我们每天都在接受这样的教育。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发生在革命早期一次菲德尔为农民和工人召开的会议上。

“你们同意城市改革吗？”菲德尔问。

“同意。”

“你们同意土地改革吗？”

“同意。”

“你们同意工业国有化吗？”

“同意。”

“你们同意社会主义吗？”

“不，我们不同意。”

这就是当年的情况。

那么，菲德尔选择什么时间来正式宣布我们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呢？他首次公开宣布是在1961年4月帝国主义对古巴“猪湾”发动侵略的时候。4月15日，在敌人空袭中牺牲的同胞葬礼上[2]，菲德尔第一次解释了

[1] 比喻中国人是除了切菜、切肉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人。——译者注

[2] 1961年4月15日，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并授意的古巴反革命空军对古巴的三个机场进行了轰炸，导致数人死亡，多人受伤。

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次空袭是两天后雇佣兵入侵的前奏。

正如你所知的那样，在古巴上映的大部分电视节目是美国出品的。我们没有对其实行禁播，没有自我封闭。人们可以上网，我们很多的人民在美国都有亲戚。每年来古巴的游客也在不断增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教育人民自己去思考。

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大公无私，甚至可以不惜为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这是人类无私的最高境界。

你认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安哥拉，是因为那里有物质利益吗？根本没有！同样的原因驱使成千上万的教师、医生、专家奔赴安哥拉。他们在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要克服重重困难，若没有觉悟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古巴大约有7.6万名青年未曾接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正如菲德尔所说，这是我们的疏忽职守造成的。这些青年人多数生活在父母离异或其他问题家庭中。我们将他们归为“前少年犯”（predelinquents），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术语啊！这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在革命时代出生，他们是革命的产物，他们是我们的子孙。他们的父母是前往安哥拉、尼加拉瓜，为革命献身的一代人。

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的教育工作、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存在着缺陷。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相信这就是菲德尔天才的表现。当他认识到所存在的缺陷，便立即采取措施改正，绝不耽误一分钟。

在“意识形态斗争”的一开始，鼓励所有这些年轻人接受教育，使他们带薪上学。现在这些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都相信他们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相信这是一次教育革命。那正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真谛：是革命中的革命，这场革命使我们的人民得到了整体和系统的文化教育。

早先，我曾说过这里有很多不平等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例如，这里60%以上的人能获得硬通货币，这意味着有近40%的人不能，我也不能。但是在古巴有很多人能。他们从国外的亲戚那儿收到美元或其他的硬通货币，或者他们在诸如旅游、烟草、电力等行业工作，他们的部分工资是以硬通货币支付的。

人们通常不明白为什么美元店的物价高。我不得不向很多人解释这点，包括来这里的商人。这些价格由政府设定，并通过此手段带来硬通货币，如此我们才能有计划地补偿那些无法获得美元的人，这就是美元店物价高的原因。

我们对每一个古巴人都能享受到的项目给予补贴。

比如，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每一个古巴人都可以接受心脏外科手术，而不必担心自己账户上有多少钱；每一个人都可获得免费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保障不仅仅为每一个公民提供退休金，还为残疾人和孕妇提供帮助。有些友人批评我们仍然保持这些项目，但是我们要证明如何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去做更多的事，其实关键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

我们所从事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无疑是复杂的，但它至关重要。你要看到我们的儿童、青年是如何表达自我以及他们的政治水准。我们想要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将文化和教育活动变成群众运动，保卫我们的民族特性、我们社会主义的特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会年轻人如何思考。

崔：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ombatant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扮演着先锋队的角色。这个组织是由那些参加过推进古巴革命以及古巴援外国际任务的人们组成，他们是那些在起义军中、在地下斗争中、在吉隆滩抗击反革命势力中、在国际行动中的战士、医生或教师。

所有的战士都被分派到学校或是工厂，在那里演讲并领导学生、工人和其他团体一起讨论，我们将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以及在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中的经历讲述给他

们，并与他们讨论。我们传播革命历史，讲述革命在其他地方的贡献。

但是过去的历史并不是主要的，因为我们仍然在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每一天都在无条件地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这正是为什么“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会站在为争取“五英雄”的自由而战的最前线。“五英雄”是反恐怖主义的战士，然而却被不公正地关进了美国的监狱。我们也是如此，站在揭露美国政府对我国的侵略政策的最前线。

蔡：您已经听过我们的故事了，您可以写一部有关崔的书，有关他的生活、工作地点和有关他的父亲如何支撑他的家庭。同样也可以写有关莫伊塞斯如何被他的姐夫所剥削的事情。我们了解过、经历过、遭遇过这些事。

之前我告诉过您一个来我父亲商店的人，因为连7分钱都没有而无法养活他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因为他是华人后裔而不能下舞池去跳舞。

现如今，年轻一辈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了。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因为肤色、经济情况或其他事情受到种族歧视的社会，或许我们没有丰富的食物，但每一个古巴人都能吃到一日三餐；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直到九年级，都由学校保证提供午饭。而在革命之前并不能保证

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更别说医疗保障了。

我们必须教育青少年了解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古巴的历史，了解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了解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斗争，了解在吉隆滩的凯旋，了解抵抗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了解国际主义使命。让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些为国际主义使命而出国的年轻医生、教师、体育教练以及其他人，他们了解到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他们看到我们的体制与其他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处。他们总会明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会有更美好的世界。

附　录

奎托夸纳瓦累：

为了全非洲的胜利

附录一

尽我们所有资助安哥拉

菲德尔·卡斯特罗

本篇是1988年12月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纪念建军节上发表的关于奎托夸纳瓦累战役的演讲。这次大会是为了纪念1956年12月2日“格拉玛号”登陆古巴及由此展开的抵抗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革命战争。这里引用的这篇演讲是节录，其全篇收录在卡斯特罗的《保卫社会主义：纪念古巴革命胜利30周年的四篇讲话》中。

我相信在过去的12个月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国家谱写了一段国际主义史上最勇敢最辉煌的篇章！这一切都开始于13个月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危机的恶化。那的确是一段困难时期。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姊妹国履行国际主义使命大约12年了，在那12年中，我们虽然在安哥拉驻军，然而我们坚持履行了不干预他国内部纠纷的承诺，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每个国家都必须靠自己来解决本国的内部问题。我们的驻军是为防御安哥拉免受南非军队的威胁，这也是我们应其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于1975年在安哥拉驻军的原因。

这场危机（1987年年末）起源于安哥拉人民解放军（People's Armed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简称FAPLA）反对东南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发动的一次进攻，事发地点距我驻军东线很远，古巴军队从未参与这次战斗。这并非第一次，早在1985年就在奎托夸纳瓦累发生过武装冲突。

奎托夸纳瓦累在古巴驻防线200公里以东，距梅农盖（Menongue）200公里远。那里是1985年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向东南方前进攻击安盟的地方。当他们在这偏远地区前行约150公里时，那里距离我军最近的驻防线还很远，大概350公里，南非武装部队前来干涉，迫使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向后撤退。

老实说，我们对这些军事行动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之一是，不应该不顾及南非的干涉进行这类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持有清晰、明确和肯定的观点。

1986年就没有发生过这类攻击事件。

我们认为如果这次行动是在安哥拉境内的攻击，这不可否认是安哥拉政府的权利。最适当的措施是要阻止南非的干预，阻止南非的干预！我们告诉他们，只要不是为了阻止南非进行干预，就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我们这一观点在1986年得到了重视，然而不幸的是在1987年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我们预测的一样，情况恶化了。在那一刻，在安哥拉东部偏远的地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对安盟的进攻正顺利进行着。南非再次派遣大炮、坦克、飞机和装甲部队进行了武装干预。

1987年，南非并没有像1985年那样限制自己来阻止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1987年马汶加（Mavinga）北部发生了军事干涉。马汶加如此之远，乃至我们驻扎在梅农盖的战斗机都不能到达。正如我所说，这段时间南非没有限制自己阻止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进攻，反之南非部队向奎托夸纳瓦累推进，追赶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试图消灭最庞大、最精良的安哥拉军队。正如我所说，奎托夸纳瓦累在梅农盖东部200公里外，是我们界限的最东边。为了南非和安盟的利益，南非试图在这里展开一场对安哥拉的战争。

当然，远离老窝的地方不是大规模战争的理想场所，战线拉得太长，后勤和组织供给是非常艰难的。从梅农盖到奎托夸纳瓦累必须经过200公里热带丛林区，因此敌人选择了在对他们最有利的地形进行作战。

由于他们忽略了我军的立场，因此造成了这样一种决

定性的局面。每个人都要求我们采取行动，以避免在安哥拉发生一场灾难，大家都期盼着古巴能够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所知的，实际情况是，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从数量上和装备上都不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装备去捍卫700多公里的边境线，更别说穿越热带雨林向东200公里去解决什么问题。一处军队太集中会使我们其他地方的防守露出破绽，这对我军来说是巨大的风险。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看清了形势。如果要解决眼前这一困难，我们就必须向奎托夸纳瓦累增派援军并重新部署部队。原则是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选择的地形发起决定性战斗，我们必须在我们选择的地势对敌人从心理上和战略上发起致命的攻击。

危机在11月中旬继续恶化。那时我刚从苏联返回，在那里参加了“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就在我回来几天后，安哥拉的消息便不断传来。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南非的军队就在奎托夸纳瓦累郊区，严重地威胁了安哥拉的主权，情况变得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行动。

1987年11月15日，我们会见了革命军参谋部的全体人员，并且对面临的形势作出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决议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安哥拉政府最好的军队就有可能被歼灭，这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存亡有着不可预见的影响，同样我们驻安哥拉的军队也会面临难以应付的情况。因此，在仔细考虑之后，我们党

的领导决定派遣增援部队到奎托夸纳瓦累解决这一严峻的形势。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一点儿都不简单。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戈尔巴乔夫同志打算12月7号去华盛顿同里根总统讨论关于世界和平的重要议题。我们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这是我们采取军事行动最糟糕的时间。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我们就作出军事行动的决定，要么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安哥拉部队被消灭而坐以待毙。

事实上，我党的领导层和革命武装部队的领导层从未犹豫过。具体地说，正确的决定是在1987年11月15日制定的。首先我们做的就是派出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从空中支援安哥拉，我们从梅农盖基地出发空袭包围奎托夸纳瓦累的南非军队。同时，我们通过从古巴选派部队和增援武器装备给安哥拉来挫败敌人的计划。

空袭很有效，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不得不派一队军事顾问、军官和部队骨干一起飞去奎托夸纳瓦累。加上炮兵、坦克兵、军械兵，共有约200人被派往支援安哥拉部队，这些人主要提供技术支持和战术支持。但这也不够，我们还从200公里外陆路运送坦克、炮兵、装甲部队，我们必须保护奎托夸纳瓦累免遭敌人占领，同时阻止敌人歼灭安哥拉部队，夺回奎托夸纳瓦累，因为这标志着对南非的抵抗是否成功。

战争就是这样展开的——我只提到部分内容而已。我们并不想让其成为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奎托夸纳瓦累旁

边是市区，奎托河从这里流过。河上有一座桥，桥上敌人采用高科技——无人驾驶飞机，使这里无法通过。因此一部分安哥拉军被桥隔在河的东岸，而另一部分安哥拉军在河西岸，奎托夸纳瓦累城的那边。

当时形势很复杂，然而并不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必须在这里阻断敌人的推进，绝不能给敌人在这里开战的时机。敌人必须被阻止，不能让敌人消灭安哥拉军并占领奎托夸纳瓦累。我们必须要等待对我们有利的天时、地利以制定进一步行动的方案。或许这应该是作家和历史学者的责任，即准确地记录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以及事件是怎样展开的。

安哥拉政府委托我们保卫奎托夸纳瓦累，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这不仅仅是为了阻止南非军队，而且是要将奎托夸纳瓦累变成一个陷阱，一个让南非军队深陷其中的陷阱。

在奎托夸纳瓦累我们用极少的代价让南非人“磕掉了门牙”，我们只丧失了极少的人员与军辆，其中包括安哥拉和古巴的部队。

是他们发起这次战争，但是他们彻底失败了。古巴和安哥拉的战略并不是在奎托夸纳瓦累阻止敌人那么简单，我们在西线聚集了足够的兵力与装备，以向南推进来威胁南非军队的要害。

战略主导思想是在奎托夸纳瓦累阻止南非军队，并从西南方位攻击敌军。聚集足够的军队威胁南非战略要地，并在我们选择的地势上对南非军队予以沉重打击。

我们派遣足够的军队并配置足量的装备从西向南推进完成任务。我们在卡卢埃凯（Calueque）地区与南非侦察巡逻部队和他们强大的空军发生过一些冲突后，南非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军事实力上的转变最终为谈判铺平了道路。没有人会认为南非是自愿谈判的。

美国以调停者身份寻求安哥拉与南非两国之间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因此已经同安哥拉进行了多次会晤。然而当美国马上就要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时候，南非却打断了谈判并试图用武力去解决安哥拉问题，若没有我国的努力，南非或许已经实现其企图了。

军事力量发生的彻底改变，使南非部队在奎托夸纳瓦累受到了沉重打击，而且以后还会有更糟糕的事等着他们，事实证明他们是“引火烧身”。

或许在过去的12年中，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大的威胁。1976年当我们到达纳米比亚边界时，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士兵、坦克、大炮，但我们却没有空军以及防空导弹，当时我们的装备远不如现在。

我们的飞行员在奎托夸纳瓦累的战争中赢得了荣誉，并在历史上书写了不同寻常的篇章。很多飞行员在几周之内完成了成千上万次任务；他们用“米格23”完全控制了空中优势，我们必须说他们取得了伟大的功绩，这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不仅将最好的飞行员、防空武器、大量便携式防空武器、防空导弹送到了安哥拉，我们还投入了大量坦克、装备精良的部队以及军需品，需要多少就派送多少。

我刚刚提到了飞行员，但是这里我还要赞扬我们的坦克手、炮兵、空防部门职员、步兵、侦察兵以及工兵。他们在奎托夸纳瓦累设立无法通过的雷区，炸飞无数南非坦克。多国军队协作最终促成了我们的胜利，英勇无畏的安哥拉军队给予的配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安哥拉的第二十五步兵旅在河东开展战役时表现得格外英勇，这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身负了共同的责任和荣辱。

在奎托夸纳瓦累大部分的士兵是安哥拉人；而向南推进的部队大部分是古巴人。

真正强大的军队聚集起来了，空中、空防和陆地的优势都属于我们。我们谨慎地用空军来掩护陆军；甚至在南非飞机吃过我们空防苦头而从天空消失后，我们的部队总是在最大限度的空防掩护下推进，同时我们的防空武器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奇袭。我们对近期的战事进行分析，我们没有给敌人任何时机，哪怕是一次。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不仅在陆地上采取了措施——加强陆地防御工事、增添防空武器、增加飞机数量。同时我们还上演了建筑上的伟绩，在短短的几周内我们就为战斗机建造了一个飞机场。一个能够支持我们的飞机前往200公里外严重威胁南非部队要害的空军基地。我们有充分细心的准备，没有冒险。敌人意识到他们的对手不仅具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非常富有战斗经验。

这为谈判创造了条件，谈判得以继续，甚至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还取得了进展；并使得政治、外交和军事形势

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在这些谈判中，美国充当调停者，我们应该给“调停者”这一称号加上引号，这并不能剥夺美国在这些谈判中所做的外交行为的正面意义。之所以我要给“调停者”加上引号，是因为美国是安盟的同盟国，并向安盟提供武器，因此他们也是南非的盟友。但是，美国也在努力寻找一个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也为这一地区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使古巴从安哥拉撤军。

我们知道美国因为我们的胆量而彻夜难眠，像古巴这样被封锁、被威胁的小国竟凭借它的本色来执行国际主义任务，这是美国所无法理解的。他们是全世界仅有的号称在世界各地部署军队、武器、基地的国家。所以，一个小小的加勒比海岛国能为一个非洲姐妹国家提供援助是有悖他们的准则和理念的。

很明显古巴履行的国际主义任务对非洲影响很大。非洲人民，甚至不是革命者而是属于右翼的政府都赞扬了古巴在非洲执行的国际任务。非洲人民知道我们是盟军；他们清楚唯一一个帮助非洲国家抵抗南非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非非洲国家就是古巴。

这些年中从革命武装部队到我个人在这一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已经说过仅仅是作出这个决定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更别说是执行了。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会晤的前夕。当时某些人认为我们在密谋反对和平、反对和解条约。鉴于当时局势的恶化、南非军队的所作所为，我们迫不得已才增派部队。在这样紧迫

的局势下，我们不能浪费一天、甚至一分钟，失去任何一分钟，都可能导致奎托夸纳瓦累的陷落。

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然而我们一旦作出决定，我们的党、我们的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我相信对非洲，对所有进步力量，这可以帮助阻止即将发生在安哥拉的一场政治灾难、一次军事灾难。我坚信我们的决定同时推进了这一地区对和平的渴望。

我相信终有一天会像今天一样，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将得到世人的称赞。这次国际主义任务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到自豪的。继1868年10月10日和1956年12月2日以来，这是我们的战士与我们的武装力量更加光辉的又一页。

某些人质疑我们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也有人对此进行了批判。这是美国人所希望的：反国际主义趋势将在我们中间出现，并削弱我们。就像我们从前说过的，国际主义者就是向人类还债。不为别人战斗的人也就无法为自己战斗。我们的军队、人民，在其他地方、在遥远的国度所体现的英雄主义，正是要让帝国主义者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迫使我们在我们的国土开战，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附录二

对非洲人民自由运动史无前例的贡献

纳尔逊·曼德拉

这篇演讲发表于1991年7月，在纳尔逊·曼德拉出狱那年，当最后一批古巴国际主义志愿者从安哥拉返回仅两个月后，曼德拉特地前往古巴以表达对古巴长期支持南非人民斗争的谢意。本篇文章节选自曼德拉于7月26日在古巴坦萨斯举行的“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38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这篇演讲是在数以万计的古巴人民和国际友人面前发表的。这篇演讲的全篇出版于曼德拉和卡斯特罗《当今世界的古巴与南非—— 我们已做了太久的奴隶！》（How Far We Slave Come! South Africa and Cuba in Today's World）一书，此书由“探路者”（Pathfinder）于1991年出版。

在非洲人民的心中，古巴人民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古巴的国际主义者以他们的原则和无私的品格为非洲人民的独立、自由和正义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很早以前，古巴革命就一直鼓舞着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

我们钦佩那些在面对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捣毁古巴革命的活动中仍坚持独立、坚持主权、不怕牺牲的古巴人民。

我们也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已下定决心，南非人民一定要创造他们的未来。从种族隔离制度解放出来的南非人民将继续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不愿意只停留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时，我们想通过南非的解放开辟一条全新的民主之路。

我们羡慕古巴革命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意识到一个国家从被迫落后到教育普及过程中的转变。我们承认你们在健康、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发展。

从你们的经历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你们肯定了与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在历史上的联系，你们坚持全面根绝种族主义的作为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你们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无论优劣之差有多大，无论处在怎样的困境中，你们都必须去斗争，绝不投降！不是自由便是死亡！

我知道你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们相信坚强的古巴人民必将克服这些困难，就像你们帮助其他国家克服困难一样。

我们知道古巴在很久以前就具备了今天这样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受无数为古巴自由而战和所有反对帝国

主义的先烈们所激发的。

我们也受何塞·马蒂这位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英雄一生的事迹所鼓舞，同时他也受到全世界所有争取自由的人们的尊敬。

我们也崇敬伟大的切·格瓦拉，他革命的不朽功绩，包括在我们非洲大陆；太强有力了，以至任何监狱的看守都无法向我们隐瞒他。切的一生是对所有珍爱自由的人民的鼓舞，我们将永远记念他。

我们带着谦卑来到这里，我们带着感动来到这里，我们带着欠古巴人民一份深情的心来到这里。有哪个国家能比古巴在与非洲的关系中表现得更无私？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受益于古巴的医务人员和教育人员？在非洲有多少这样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寻求古巴的帮助而被拒绝？有多少受到帝国主义威胁或为国家解放而斗争的国家曾经依靠古巴的支持？

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在1975年安哥拉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IA）[1]、安盟和扎伊尔的联合部队的攻击时所给予的援助，这种援助规模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多少年来，我们非洲一直是那些想分割我们领土、破坏我们主权的国家的牺牲品，在非洲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其他的民族为保卫我们而战。

我们也知道这种行动对古巴来说是很平常的，我们清楚地了解在安哥拉战争中牺牲的不过是帮助非洲人民革命事业的古巴志愿者中的一少部分。因为古巴人民的国际主义不是一句空话，他们所做的令很多的人受益，这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我们知道古巴军队在1975年击退敌军后不久就打算撤离安哥拉，但是敌人对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持续入侵使这一切变为不可能。

在奎托夸纳瓦累的战场上，你们的出现和你们对武装力量投入的增加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种族主义军队在奎托夸纳瓦累的全面失败是整个非洲的一次胜利。

种族主义在奎托夸纳瓦累的毁灭性失败为安哥拉人民赢得真正享受和平和巩固主权的可能！

种族主义在奎托夸纳瓦累的失败使得纳米比亚奋斗中的人民最终赢得他们的独立！

种族主义在奎托夸纳瓦累的失败打破了白人暴政不可战胜的神话！

种族主义在奎托夸纳瓦累的失败是对在南非挣扎着的人民的一种鼓舞！

如果没有奎托夸纳瓦累的胜利，我们的组织就不可能合法化！

正因为在奎托夸纳瓦累击败了种族主义军，才使得我今天能够来到这儿！

奎托夸纳瓦累战役是南非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里程碑！

奎托夸纳瓦累战役已经成为将非洲大陆和我们国家从种族隔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转折点！

---

❶ 由霍顿·罗伯托（Holden Roberto）领导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Angol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前身是争取国家独立的组织，后成为以帝国主义为后盾的推翻安哥拉政府的盟军。

附录三

给我们国际主义战士的最高赞赏

菲德尔·卡斯特罗

此文节选自1991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马坦萨斯发表的演讲，这篇演讲是紧随着纳尔逊·曼德拉的评论后（即前篇所摘述的文章）所作的。此演讲全文选自《当今世界的古巴与南非——我们已做了太久的奴隶！》（How Far We Slave Come! South Africa and Cuba in Today's World）一书。

我们自己没有权利强调古巴在现代为南非人民所作的贡献，当听到曼德拉的演讲时，同志们，我相信他对我们的国际主义战士给予了有史以来最高的赞赏。我相信这份对我们战士的敬意，就如同金子铸成的文字一般会流传下来。他是慷慨的，非常慷慨；他评价我国人民在非洲的作为是丰功伟绩，在那里我们证明了我们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以及我们对誓言的持之以恒。

在安哥拉我们付出了15年！成千上万的古巴人民去了那里，更多人去了其他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新纪元里，帝国主义不择手段想要使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以结束古巴与非洲人民的团结一致。虽然背叛非洲就会得到利益，但是我们的坚定更胜于压力，更胜于我们向帝国主义者妥协所得到的一切利益。

我们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感到骄傲，我们的军队从安哥拉胜利归来。但是谁说过这是他们的作风？谁用坦诚、雄辩抒发了它？这些我们都没说，因为基本的谦虚阻止着我们，他慷慨激昂地在此肯定了我们的战士使安哥拉共和国维持主权并使和平变为可能，以及我们的战士对纳米比亚独立所作出的贡献。他还补充了我们的战士对南非人民和非洲国民大会（Africa National Congress）与帝国主义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他说奎托夸纳瓦累战役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平衡，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我们并不知从1975年到上次接受奎托夸纳瓦累挑战这

些努力的重要性。这是一段比哈瓦那和莫斯科之间还长的距离，飞机需要不间断飞行13个小时。从哈瓦那到罗安达（Luanda）需要大约飞行13～14个小时，奎托夸纳瓦累在安哥拉的东南角，距罗安达1000多公里。我国不得不在这里接受挑战。

就像曼德拉告诉你们的，这次行动赌上了革命所有的一切，甚至赌上了革命本身。对第三世界中最强大、最富有的力量发起大规模的战争是承担着巨大风险的。他们有先进的工业和发达的技术，武装到牙齿，距我们这个小国万里之遥，用我们有限的资源和军事与之抗衡甚至会削弱我国自己的国防，然而我们依然这样做了。我们仅用我们自己的船只，用我们自己的装备改变了敌我军队实力的差距，使那次战争的胜利具备了可能。我不清楚是否还有一次战争是发生在如我们一样的小国家和南非种族主义强大的力量之间的。

那次行动中我们将所有的筹码都压上了，而那并不是唯一的一次。我认为我们在1975年同样这么做了。那次我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将我们的军队派去抵抗入侵安哥拉的南非军。

我再说一遍，我们在那儿呆了15年。或许本不该用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们看到必须阻止南非侵略安哥拉，这一问题必须简洁地处理。我们的战略信念是：如果我们想让安哥拉实现和平，获得安全，我们就必须去阻止南

非侵略安哥拉，我们就必须聚集必要的军队和武器去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装备，但那是我们的信念。

我们在奎托夸纳瓦累遇到了真正严峻的局势，当时在那里没有古巴人，因为最近的古巴军也在向西距奎托夸纳瓦累约200公里处。这迫使我们决心使用必要的军队和武器，主动地承担一切风险，派送所需的物品，甚至是从古巴本国运送。

奎托夸纳瓦累成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然而这次战役的作用却沿着数百公里长的界线延伸着，它引发了安哥拉西南部的一次重要战略行动。奎托夸纳瓦累的名字代表了所有发生的一切，这就是灾难发生的地点；在空军和几周前建成的简易机场的掩护下，大约4万名古巴和安哥拉战士以及500多辆坦克、数百门大炮、1000余部防空武器，向纳米比亚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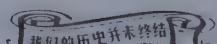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将不阐述那些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细节，那些就留给历史学家们吧！但是我们同安哥拉人民下定决心，永远结束安哥拉所遭受的侵略。事情就像我们预料的一样，我们不想去冒犯或使任何人没面子。新的军事平衡（到那时我们的部队已经锐不可当）的出现最终为谈判创造了条件，并使我们参加了这持续数月的谈判。

当时，我们完全有能力在那儿向敌人展开一场大战，但鉴于新局面的出现，我们认为在谈判桌上将更有利于

解决安哥拉的完整及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怎能不知道！这些事件将对南非有多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原因之一、目的之一，这是使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之一。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安哥拉的问题解决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武装力量也将从我们的斗争中受益。

我以前说过这些吗？没有，绝对没有，或许我们将永远不提这些。因为，我们认为，不论是非洲国民大会与国际主义者间的团结，还是海外的巨大援助，某些方面包括世界公众舆论及我们的军事援助，非洲国民大会成功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及在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人民自己所进行的斗争。

这个人，在经历了被欺压和如此多的事件后，在今天下午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是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同时，这一切揭示了纳尔逊•曼德拉的人性、品格和他的革命觉悟。



附录四

个人、组织、事件汇编

赫拉尔多•阿布鲁•冯堂（Abreu, Gerardo Fontán）

（1931～1958）工人，后来成为人民党青年团（Orthodox Youth）领袖，1956年哈瓦那“七•二六运动”青年旅首领，革命战争时期城市地下工作领袖，后被捕，1958年2月被独裁政府杀害。

恩里克•阿塞维多（Acevedo, Enrique）

（1942～）于1957年7月参加起义军，当时年仅14岁。后在切•格瓦拉第八纵队服役，1977～1988年在安哥拉指挥坦克旅，任古巴“武装力量”陆军准将。

伊格纳西奥•阿格拉蒙特（Agramonte, Ignacio）

（1841～1873）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时在卡马圭省任解放军陆军少将，战死。

卡洛斯•阿尔达纳（Aldana, Carlos）

（1942～）1957年7月，14岁时参加”七•二六运动”，在起义军服役。1980～1992年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政治局秘书处工作。1988年率领古巴谈判团与比勒陀利亚和美国政府协商结束安哥拉战争的条款。1992年离开所有职务。

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Almeida Bosque, Juan）

（1927～）在巴蒂斯塔独裁时期是哈瓦那一名泥瓦匠，人民党党员，1952年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运动，1953年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被判处10年监禁。1955年在全国大赦中与其他蒙卡达被监禁者一同被释放。1956年11～12月参加了“格拉玛号远征”。1958年2月被提升为司令员，指挥东部第三阵线。1959年起，担任一系列包括空军首领、“革命武装力量”副部长、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在内的职务。是持有“革命司令”头衔的马埃斯特腊三斗士之一。自从1965年建党以来，一直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古巴共和国英雄，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主席。

四月九日总罢工（April 9th General Strike Attempt）

1958年4月9日，“七•二六运动”号召在古巴全国发动总罢工，以推翻巴蒂斯塔当局的独裁统治。由于罢工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宣布的，导致行动失败。巴蒂斯塔军队对学生、工人大举镇压，并进攻起义军在马

埃斯特腊山的阵地。

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ambatant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简称ACRC）

1993年成立，是由当年起义军的老战士，参加过城市地下斗争、吉隆滩战役、抵抗反革命团伙斗争和执行过古巴国际主义任务的军人和民间人士组成。现有30万成员，他的任务是向新一代青年传递革命历史和经验教训。

真理党（古巴革命党）（Authentic Party，Cuban Revolutionary Party）

1934年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般被称为“信党”。宣称是何塞•马蒂古巴革命党的真正追随者。1944～1952年，拉蒙•格拉乌和卡洛斯•普莱欧任主席执掌政权。1952～1958年，成为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反对党的主要组成部分。组织了知名的“真党组织”的武装联队。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1959～1960年，“信党”的主要领导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加入反革命军队。

拉萨罗•巴雷多（Barredo，Lázaro）

（1948～）古巴著名记者和作家。曾任古巴记者联盟副主席，拉丁美洲记者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现任古巴国务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Batista, Fulgencio）

（1901～1973）前军队中士，协助发动1933年9月的军事政变，这是一场由下级军官发动的、仿效几星期前推翻赫拉尔多•马查多独裁政权的起义。之后被提升为上校。1934年1月他组织发动另一次政变，镇压工人、农民和革命力量。1940年当选为总统，作为军队首领，操纵几届政府。1944年未参加竞选，然而却持有军权。1952年9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蛮横的军事独裁政权。独裁政府被起义军和不断扩大的人民起义推翻。1959年1月1日，逃往多米尼加共和国。

西蒙•玻利瓦尔（Bolívar, Símón）

（1783～1830）以“解放者”著称。拉丁美洲爱国主义者，出生于加拉加斯。1810～1824年领导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帮助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从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中取得独立。

维克托•博尔东（Bordón, Víctor）

（1930～）“人民党青年团”成员，后来的拉斯比亚斯“七•二六运动”成员。1956年末建立“七•二六运动”游击队，并于1958年10月并入切•格瓦拉领导的纵队，获得上校军衔。后来在马坦萨斯国家建设部担任负责人。任考迈托（Cometal）集团公司董事长。

何塞•卜（Bu, José）

古巴独立战争时期革命军军官，出生于中国，在马克西姆•戈麦兹（Máximo Gómez）将军身边工作。参加了

1868～1898年期间的古巴独立战争，后升任中校。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Cabral，Amilcar）

（1924～1973）1956年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独立时非洲独立党（PAIGC）的建立者和核心领导人。1963年非洲独立党武装反抗葡萄牙统治，1974年帮助几内亚比绍取得独立，1975年帮助佛得角独立。1973年1月被暗杀。

寅苏斯•卡雷拉斯（Carreras，Jesús）

（1961年去世）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民族阵线领导人。革命胜利后参加了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的武装反革命活动。后被捕，判刑。

米利亚姆•卡里昂•拉米雷斯（Carrión Ramírez，Miriam）

（1945～）古巴农业科学家和热带农业基础研究所（INIFAT）研究员。协助委内瑞拉建立小型农业项目。

芭芭拉•卡斯蒂略（Castillo，Bárbara）

（1946～）古巴国家贸易部部长。1991年起一直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菲德尔•卡斯特罗（Castro，Fidel）

（1926～）1945年哈瓦那大学学生运动领袖。1947年人民党建党后，组织了人民党青年团中心。1952年人民党议会代表竞选候选人，3月10日政变后巴蒂斯塔取消了此次选举。1953年7月26日组织和领导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以及对蒙卡达兵营的进攻。后被捕入

狱，被判处15年监禁。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讲演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在古巴全国上下引起轰动，成为革命运动的纲领。1955年，全国大赦时得到释放，他领导发动了“七•二六运动”。1956年末，从墨西哥乘“格拉玛号”返回古巴，开始了对独裁政府的远征，革命战争期间指挥领导起义军。革命胜利后，从1959年2月到1976年，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从那时起一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以及“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自从1965年古巴共产党建立以来，一直担任第一书记。

劳尔•卡斯特罗（Castro，Raúl）

（1931～）哈瓦那大学生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活动的组织者。参与1953年攻打蒙卡达兵营，被捕后判处13年监禁，1955年，全国大赦时获释。“七•二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参加1956年的格拉玛远征。1958年2月升任起义军中校，领导东部第二阵线。从1959年起，任“革命武装力量”部长。他是军队将军，是“革命武装力量”中地位仅次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的第二领袖。1959～1976年任副总理、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从1965年起，任古巴共产党第二书记。

乌戈•查维兹（Chávez，Hugo）

（1954～）委内瑞拉陆军中校。1992年他领导的军事政变失败后，被监禁两年。获释后他重新建立了新政党——“第五共和运动”。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2002年再次当选总统。他将销售石油的税收用于大量的社会福利项目，赢得工人、农民和青年人的支持。这些民众力量多次遏制了美国支持下的委内瑞拉资产阶级意欲颠覆查维兹政府的企图。

蒋介石（Chiang Kai-shek）

（1887～1975）1925年起任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领袖。曾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1925～1927年期间平定了中国其他军阀割据势力，1927年建立了独裁政权。1949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后，逃往台湾。

埃都阿尔多·奇瓦斯（Chibás, Eduardo）

（1907～1951）20世纪20～30年代，抵抗马查多独裁统治斗争的学生会领袖，“真理党”党员。1947年建立反对真理党党派“人民党”（Orthodox Party，亦称“正统党”），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1950年当选为参议员，1951年8月5日，在广播中发表抗议政府腐败的讲话，在广播将要结束时开枪自杀，几天后去世。

法乌莱·乔蒙（Chomón, Faure）

（1929～）“革命指导党”领导。1957年3月13日攻打总统官邸的幸存者。组织了1958年2月的远征，这次远征为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建立了游击战线。1958年8月后，成为切·格瓦拉领导的拉斯比亚斯战线中的一部分。1965年起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古巴驻苏联、越南、厄瓜多尔大使。从1976年起，任人民武装议会议员。

卡米洛•西恩富格斯（Cienfuegos，Camilo）

（1932～1959）1956年加入“格拉玛号”远征军，在由切•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第四纵队中任上尉，1958年升任中校。1958年8～10月，领导“安东尼奥•马塞奥”第二纵队从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stra）西进比那尔德里奥，指挥拉斯比亚斯北部斗争，直到战争结束。1959年1月成为起义军参谋长，1959年8月28日，乘飞机返回哈瓦那时，飞机失事不幸坠海身亡。

莱奥波尔多•辛特拉•弗里亚斯（Cintra Frías，Leopoldo）

（1941～）生于亚纳附近的农民家庭，1957年11月参加起义军，战争结束后任中尉。20世纪70年代作为志愿军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执行国际主义任务。1989年任古巴驻安哥拉军事代表团领导。古巴共和国英雄，目前为军团将军，领导西部军，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阿贝拉多•科洛梅（Colomé，Abelardo）

（1939～）1975年3月加入起义军，任中校。1962～1964年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作为国际主义志愿者，支持阿根廷由乔治•里卡多•马塞蒂（Jorge Ricardo Masetti）领导的游击阵线。1975～1976年指挥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动。古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任内政部部长，军团将军军衔。

古巴独立战争（Cuban Independence Wars）

1868～1898年，古巴人民进行了三次反对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战争。包括1868～1878的十年战争，1879～1880年的“小战争”、和1895～1898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战争结束了西班牙的统治，然而西班牙被打败后美国却趁机占领了古巴。

安德烈斯•格瓦斯（Cuevas，Andrés）

（1915～1958）拉斯比亚斯卡马华尼村的工人。1957年初加入起义军，任上尉。1958年7月19日，在厄尔基巨战役中牺牲，死后被追认为中校。

小牧师（Curita，El.）

见塞尔吉奥•冈萨雷斯（Sergio Gonzalez）部分的注释。

劳尔•迪亚兹•阿格勒斯（Díaz Argüelles，Raúl）

（1936～1975）哈瓦那“革命指导党”成员，1958年加入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的“革命指导党”游击队，成为起义军中校。20世纪70年代早期，领导“革命武装力量”第十处，监督管理古巴国际主义军事任务。1975年任古巴在安哥拉的军事任务第一领导人。1975年11月在安哥拉触雷牺牲，死后追认为陆军准将。

维克托•德雷克（Dreke，Víctor）

（1937～）拉斯比亚斯省大萨瓜“七•二六运动”成员，1958年10月起参加“革命指导党”游击队，与切•

格瓦拉的起义军纵队合作。1960～1965年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指挥军队，负责歼灭那里的反革命势力。1965年在格瓦拉手下工作，任刚果古巴志愿纵队第二负责人。1966～1968年在几内亚比绍领导古巴国际主义援助民族解放力量。后成为“革命武装力量”政治理事会领导，1990年辞去现役上校军官职务。从2003年起，主要负责古巴与非洲的关系，并任古巴驻赤道几内亚大使。

比尔马•埃斯平（Espín, Vilma）

（1930～2007）古巴圣地亚哥“七•二六运动”发起人。同弗兰克•派斯（Frank País）密切合作，协助组织1956年11月30日的圣地亚哥起义，后来在奥兰特省（Oriente）担任“七•二六运动”的协调人。1958年7月加入起义军，在东部第二阵线工作。1960年任古巴妇女联盟主席，1965年起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80～1991年任政治局委员，1976年起任国务委员会议员。

拉蒙•埃斯皮诺萨（Espinosa, Ramón）

（1938～）“七•二六运动”成员，1958年在埃斯坎布拉伊参加革命指导党游击队。战后任第一中尉。1975～1976年在安哥拉服役，在安哥拉触反坦克地雷受重伤。1980～1982年在埃塞俄比亚领导古巴军事使团，1983年为奥兰特部队首领，1980年起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任政治局委员，军衔为陆军军团将军。

冯堂（Fontán）

见格拉多•阿伯鲁（Gerardo Abreu）部分的注释。

吉尔耶莫•加西亚（García, Guillermo）

（1928～）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的农民。“七•二六运动”成员。1956年12月协助起义军重建，1957年早期开始，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第一纵队战士。1958年末提升为胡安阿尔梅达（Juan Almeida）领导下的东部第三阵线指挥员，1965年起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5～1986年政治局委员，1974～1985年任交通运输部部长，国民议会成员，持有“革命司令”头衔的马埃斯特腊三斗士之一。

马克西莫•戈麦斯（Gómez, Máximo）

（1836～1905）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1868～1878年参加古巴独立战争，战争结束时成为解放军大将军，1895年战争再次爆发时，他返回古巴，担任古巴独立军的主要将领。

塞尔吉奥•冈萨雷斯（Sergio Gonzalez）

（1922～1958）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瓦那街车车夫与公交车司机工会”的领袖，后加入人民党。1955年成为“七•二六运动”发起人，在革命战争中，协助领导哈瓦那城市的地下活动，管理运动使用的印刷厂。前神学院学生，绰号“小牧师”，1958年被巴蒂斯塔独裁政府杀害。

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Guevara，Ernesto Che）

（1928～1967）阿根廷出生的古巴革命领导人，“格拉玛号”远征时的医生，在革命战争中第一个被提升为领导人的战士。1958年领导起义军纵队，从奥连特省至埃斯坎布拉伊山区，联合当时在拉斯比亚斯省的革命力量，并最终带领他们夺取了拉斯比亚斯省首府圣克拉拉。1959年革命胜利后，除继续从事军事工作外，还担任包括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部长等一系列职务，经常作为革命领袖代表出席国际会议。1965年4月领导古巴游击队在刚果与刚果人民并肩反抗帝国主义。1966年末，带领国际主义志愿军小分队前往玻利维亚。1967年10月8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军事行动中受伤后被玻利维亚军方抓获，第二天被杀害。

奥斯瓦尔多•埃雷拉（Herrera，Osvaldo）

（1933～1958）在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府时期，任圣克拉拉的学生领袖，后活跃于哈瓦那大学。曾任起义军上尉，卡米洛•西恩富格斯（Camilo Cienfuegas）指挥官的副官。1958年6月被派往奥尔金重组“七•二六运动”城市地下活动领导层时被捕入狱，他不肯泄密，自杀身亡。

托马斯•乔丹（Jordan，Thomas）

（1819～1895）美国内战时南部联邦军将军，1869年作为古巴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带领300名远征军登陆古巴。成为解放军将军和总参谋长，后返回美国。

“七•二六运动”（July 26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55年6月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与者发起，包括人民党左翼青年及其他一些武装力量，其中包括由弗兰克•派斯在圣地亚哥领导的国家革命军事行动和哈瓦那国家革命运动的骨干人员阿曼多•哈特（Aronando Hart）和福斯蒂诺•佩雷斯（Faustino Pérez）。战争期间，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织起义军和城市、乡村地下活动网络。1958年5月，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直接领导下，将领导层从哈瓦那和圣地亚哥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

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

见蒋介石（Chiang Kai-shek）部分的注释。

卡洛斯•拉赫（Lage, Carlos）

（1951～）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起任国务委员会部长会议秘书。1980年起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他是内科医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率领古巴医疗团前往埃塞俄比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协调小组工作过。

埃斯特班•拉索（Lazo, Esteban）

（1944～）马坦萨斯农场工人，1959年革命胜利后，参加了“反叛青年协会”，1963年加入古巴共产党，

1994～2003年，任哈瓦那市共产党第一书记。1992年起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从2003年起，负责思想政治工作。

埃尼奥•莱瓦（Leyva，Enio）

（1936～）20世纪50年代中期，领导“七•二六运动”青年团，在中学负责组织工作。1956年成为哈瓦那地下活动负责人。1956年赴墨西哥从事地下活动并成为“格拉玛号”远征军的一员。但被警方抓捕，后继续在墨西哥支持革命活动。1959年返回古巴，参加“革命武装力量”并任准将。

安东尼奥•尼科•洛佩兹（López，Antonio“Nico”）

（1934～1956）“正统党”青年运动领导人，后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蒙卡达革命筹备活动的领导。1953年7月26日，参与对巴亚莫驻兵的攻击，为逃脱警方逮捕，在危地马拉过着流亡生活。1954年他在那里遇到了厄内斯托•圭瓦拉，协助他在“七•二六运动”中取胜。1955～1956年成为全国运动理事会成员，领导旗下的青年旅。1956年11月参加“格拉玛号”远征，登陆后不久被捕，后被杀害。

奈斯特•洛佩兹•古巴（López Cuba，Nestor）

（1939～1999）出身于奥尔金附近的农民家庭，1957年参与“七•二六运动”，1958年参加起义军。在吉隆滩带领坦克队时负伤，1973年在叙利亚执行国际主义任务，

1975～1976年在安哥拉工作。1979年之后，他率领古巴军事代表团在尼加拉瓜同美国支持的反革命武装展开斗争。临终前，任“革命武装力量”部门将军，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总执行官。

安东尼奥•马塞奥（Maceo，Antonio）

（1845～1896）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的军事领袖和战略家。在古巴，人称“青铜巨人”，领导了1895～1896年从奥连特省出发到比那尔德里奥省西进的长征。在被称为“巴拉瓜抗议”的军事行动中，因拒绝放下武器投降，而成为革命的象征。后在战斗中阵亡。

赫拉尔多•马查多（Machado，Gerardo）

（1871～1939）1927～1933年在美国支持下由在野党成为统治古巴的独裁政府。1924年当选为古巴主席。1927年强制延长在任期限，引起古巴举国抗议，抗议被残酷镇压。1933年8月由于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其独裁统治被推翻，后被流放。

曼比（Mambí）

指1868～1898年期间抗击西班牙统治、争取古巴独立的三次独立战争的战士，其中大多数人是被解放的奴隶和其他有担保的劳动者。“曼比”一词源于19世纪40年代在圣多明各附近抵抗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自从一个叫胡安•埃斯尼纽斯•曼比（Juan Ethninius Mamby）的西班牙黑人军官加入那里的自由战士行列后，殖民势

力开始用贬意的名字“曼比”称呼游击队员。后来“曼比”一词被用来称呼古巴革命战士，是荣誉的象征。

纳尔逊•曼德拉（Mandela，Nelson）

（1918～）南非非洲国民议会反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领袖，1944年创建非洲国会（ANC）青年团，1961年创建非洲国会（ANC）军事联队。1962年被捕，直到1990年才获释。1988年，由于革命斗争得到发展，加速了种族隔离军队在安哥拉的失败，曼德拉被释放。1994年在南非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后第一次选举中当选为总统，一直工作到1999年退休。

路易斯•马卡诺（Marcano，Luis）

（1831～1870）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革命军将军，在战争中牺牲。

阿莱达•玛琪

（1934～）（March，Aleida）“七•二六运动”拉斯比亚斯省城市地下工作者，1958年末前往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参加起义军第八纵队。她是切•格瓦拉的遗孀。

胡安•曼努埃尔•马尔克斯（Márquez，Juan Manuel）

（1915～1956）20世纪30年代因反对马查多的独裁统治而入狱，1947年人民党及其左翼的创建者，1955年参加“七•二六运动”，“格拉玛号”远征中的第二负责人，在登陆后几天被捕、牺牲。

何塞•马蒂（Martí, José）

（1853～1895）古巴国家英雄，著名的革命家、诗人、作家、演讲家和记者。1892年建立古巴革命党，抗击西班牙殖民者统治，反对美国对古巴的操控。组织并计划了1895年的独立战争。在奥连特省的多斯里奥斯战役中牺牲。他的反帝纲领和作品是古巴国际主义传统和革命政治遗产的核心。

帕斯奎尔•马丁内斯•吉尔（Martínez Gil, Pascual）

（1943～）“七•二六运动”成员，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斗争。1975年在安哥拉领导内政部特种部队，1980～1989年，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副部长，师部将军。1989年被捕，被指控滥用权力及政府的基金和资源，被判处12年监禁。

米盖尔•马利亚诺•马丁内斯•叶雷苏埃罗

（Martínez Hierrezuelo, Miguel Mariano）

古巴圣地亚哥“七•二六运动”地下斗争的杰出战士。1956年11月30日支持“格拉玛号”远征起义。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第一纵队战士，后来在胡安•阿尔梅达指挥的第三战线服役。

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Masetti, Jorge Ricardo）

（1929～1964）阿根廷记者，曾于1958年1月前往马埃斯特腊采访。1959年后建立了拉美通讯社，在阿根廷

北部领导游击队时逝世。

胡里奥•安东尼奥•梅利亚（Mella，Julio Antonio）（1903～1929）大学生联合会（FEU）成立时任主席，1923年古巴大学改革运动的领导人。1925年古巴共产党的创始人。1926年被马查多政府抓捕。后逃往墨西哥，继续组织抵抗独裁统治。参加了保卫萨科、万泽提、奥古斯多•凯撒•散蒂诺和其他国家的国际主义战争，后被马查多的特工人员追踪，于1929年1月在墨西哥市被暗杀。

攻打蒙卡达兵营（Moncada attack）

1953年7月26日，大约160名革命军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挥下，对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驻军和巴亚莫驻军同时发起进攻。掀开了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进攻失败后，50多名被捕的革命者被巴蒂斯塔杀害。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27人，包括劳尔•卡斯特罗和胡安•阿尔梅达（Juan Almeida）被判处最高15年监禁。1955年5月15日在国人强烈要求下获得特赦。

拉斐尔•莫拉森（Moracén，Rafael）

（1939～）1958年参加起义军。分别参加了1965～1967年在刚果-布拉柴维尔、1973年在叙利亚和1975～1982年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任务，任陆军准将。“古巴共和国英雄”，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国际主义关系部领导。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弗兰克•派斯（País，Frank）

（1934～1957）奥连特大学学生联盟副主席。“民族革命行动”（后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55年9月他所在组织参加了“七•二六运动”，他成为奥连特省的主要领导人。“七•二六运动”民族行动协调人，城市自卫队领导。1957年7月30日被独裁政府谋杀。

拉蒙•帕尔多•格拉（Pardo Guerra，Ramón）

（1939～）1957年参加起义军。1958年在切•格瓦拉领导的第八纵队服役，1965～1997年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80年参加安哥拉国际主义任务，为古巴武装部队将军。从2002年起担任国防参谋部领导。

拉蒙•帕兹（Paz，Ramón）

（1924～1958）“七•二六运动”成员，起义军第一纵队指挥官。1958年7月28日在普罗维登西亚战役中牺牲。

克雷森西奥•佩雷斯（Pérez，Crescencio）

（1895～1986）在“格拉玛号”登陆前是马埃斯特腊山区“七•二六运动”基层组织成员。他是第一批加入起义军的农民，战后成为第七纵队指挥官。革命胜利后，他在“革命武装力量”中担任多种职务。

马科斯•佩雷斯•希梅内斯（Pérez Jiménez，Marcos）

（1914～2001）从1952年起他成为委内瑞拉的军队独

裁者，1958年1月被推翻下台。

昆汀•皮诺•马查多（Pino Machado，Quintín）

（1931～1986）革命斗争时拉斯比亚斯“七•二六运动”的成员。1959～1960年担任古巴驻尼加拉瓜的大使，美洲组织代表，文化部副部长。

普拉西多（Plácido）

诗人加布里埃尔•德拉•康塞普西•瓦尔德斯（Gabriel de la Concepción Valdés）（1809～1844）的笔名。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逮捕，诬陷他是奴隶起义的主要头目，被执行死刑。

吉隆滩（Playa Girón）

1961年4月17日，华盛顿组织并提供资金调动古巴流亡政府雇佣军入侵古巴南部海岸的“猪湾”。在不到72小时的战斗中，雇佣军被古巴游击队、武装力量和警察击败。4月19日，残余的侵略者在吉隆滩被捕，古巴人用这个地名代指侵略和战争。

人民社会党（Popular Socialist Party）

1944年古巴共产党采用这个名字，人民社会党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也反对攻击蒙卡达的政治路线、“七•二六运动”和1956～1957年起义军发动的革命战争。在推翻独裁统治斗争最后几个月中，人民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同“七•二六运动”合作。1959年革命胜利后，

“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联合，1961年成立革命指导党，1965年建立了古巴共产党。

葡萄牙人民革命（Portuguese Revolution）

1974年4月，对政府不满的高级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自1926年一直掌权的、腐朽的葡萄牙军事独裁统治。其主要原因是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上的解放运动力量不断增长，加重了葡萄牙政权和军队的紧张局面。独裁统治的倒台致使大批革命工人阶级从支持资产阶级军队转向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这巩固了1976年新建的政权。因为军队士兵拒绝向反对独裁统治的人民力量开枪，故1974年的政变以“康乃馨革命”著称。

贡扎罗·盖萨达（Quesada, Gonzalo de）

（1868～1915）1892年建立的古巴革命党党书记，1895～1898年独立战争期间，古巴共和国军方驻华盛顿代表。后来协助收集出版何塞•马蒂的作品。

雷内•拉蒙斯•拉图尔（Ramos Latour, René）

（1932～1958）弗兰克•派斯死后，任“七•二六运动”全国行动协调人，并领导“七•二六运动”的城市武装。1958年5月加入起义军，担任指挥员。1958年7月30日，在巴蒂斯塔军队进攻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的最后阶段被杀。

利弗•亨利（Reeve Henry）

（1850～1876）美国内战期间联合军队的鼓手，受到古巴反抗奴隶制度斗争的鼓舞，1869年前往古巴参加古巴独立武装，后任上校，并被任命为独立军西恩富格斯支队的领导人，后在战争中牺牲。

共和军（Republic in Arms）

1869年4月由古巴独立军在瓜伊马罗（Guaimaro）会议创建，领导抗击西班牙殖民统治。第一任主席是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皮德斯（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1869年共和军宣布废除奴隶制和契约劳工制。

1933年革命（Revolution of 1933）

1933年8月12日推翻赫拉尔多•马查多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大罢工，在美国大使苏木内尔•维耶斯（Sumner Welles）的努力下，卡洛斯•曼努埃尔•塞斯皮德斯（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领导的前帝国主义政府取代了马查多的统治，卡洛斯是1868年古巴独立战争发起人的儿子。9月4日，塞斯皮德斯（Cespedes）领导的政府被未授衔的军官、学生和平民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此次政变也被称为“军人起义”。包括反帝国主义领袖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在内的联盟政府成立，人称“百日政府”。新政府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制和一系列与美帝国主义利益相违背的措施，包括废除美国强加的“普拉特修正案”。1934年1月14日，在美国大使馆的支持下，巴蒂斯塔总参谋长发动了军事政变。在以后的几年里，他

收买反帝运动的领袖，并对那些拒绝屈服的领袖施行暗杀和镇压。

3月13日革命指导党（Revolutionary Directorate, March 13）

1955年由何塞•安东尼奥•埃克维里亚和大学生联合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共同建立。1957年3月13日，其主要领导人组织发动了对总统官邸和维路易（Reloj）电台的进攻。在这次进攻中，包括埃克维利亚（Echeverria）在内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被杀。1958年2月法乌莱•乔蒙（Faure Chomón）在拉斯比亚斯省埃斯坎布拉伊山区领导建立游击队，起名为“3月13日”。游击队随后成为切•格瓦拉指挥阵线的一部分。1961年同“七•二六运动”和人民社会党合并。

胡安•里乌斯•里维拉（Rius Rivera, Juan）

（1848～1924）波多黎各人，参加古巴1870年独立战争，建立战功。1895年随着战争的恢复，他组织远征军为波多黎各独立而战，成为少将。

雷内•罗德里格斯（Rodríguez, René）

（1931～1990）菲德尔•卡斯特罗1952～1953年领导的革命运动成员，参加1956年“格拉玛号”远征军，服役于切•格瓦拉第八纵队。1959年后担任一系列职务，领导古巴与各民族友好协会（ICAP）多年。从1980年到去世前一直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阿道夫•罗德里格斯•诺达尔（Rodríguez Nodals, Adolfo）

（1945～）古巴科学家，热带农业基础研究所（INIFA)所长，古巴国家城市农业集团领导人。

卡洛斯•罗洛夫（Roloff, Carlos）

（1842～1907）生于波兰，后到美国，在美国国内战争期间参加盟军。1865年移居古巴，于1868年成为古巴独立军战士。19世纪90年代，成为佛罗里达州坦帕古巴革命党主席。随着1895年战争的再次进行，返回古巴，成为革命军主要将领。

乌利塞斯•罗塞雷斯•托罗（Rosales del Toro, Ulises）

（1942～）1957年参加起义军，在胡安•阿尔梅达手下工作。分别于1963～1968年在阿尔及利亚和委内瑞拉、1976年在安哥拉执行国际主义使命。1975年起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现任“革命武装力量”（FAR）总参谋长，第一任“革命武装力量”（FAR）代理部长，上将军衔。从1997年10月起，任蔗糖工业部部长。

米盖尔•萨尔辛内斯（Salcines, Miguel）

（1950～）农业部灌溉专家，作为合作生产基本单

位（UBPC）的带头人，在古巴发展了一系列城市农业项目，并在委内瑞拉合作建设小型农业项目。

若纳斯•萨文比（Savimbi, Jonas）

（1934～2002）1960年参加主张安哥拉从葡萄牙统治下独立出来的组织。1966年创立并领导“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后死于一场伏击战。

维克托•斯丘埃戈（Schueg, Victor）

（1936～1998）1958年参加起义军，在劳尔•卡斯特罗手下工作。1965年在刚果执行国际主义任务。1975～1976年任古巴军事代表团在安哥拉的总参谋长。1980～1986年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6～1991年任委员。

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民族阵线

（Second National Front of the Escambray）

拉斯比亚斯武装集团，领导人是埃洛伊•古铁雷兹•梅诺（Eloy Gutiérrez Menoyo）。1975年成立，他倡议“革命指导党”建立后应在埃斯坎布拉伊掠夺、恐吓农民，1958年中期被理事会开除。拒绝与切•格瓦拉的军队和其他革命组织合作。该集团大多数领导人在1959年以后加入反革命阵营。

艾哈迈德·塞科·图尔（Sékou Touré，Ahmed）

（1922～1984）在科纳克里抗击法国殖民者，独立战争的领导人。1958年独立时当选为国家主席直至去世。

古巴的奴隶制度（Slavery in Cuba）

1517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古巴，当时，奴隶是制糖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到19世纪40年代，奴隶占岛上人口的1/3多，从1817年起国际条约禁止奴隶交易。由于古巴蔗糖生产不断扩大，劳动力的恶性短缺，于是西班牙寻求中国的契约劳动力来缓解这一状况。1868年古巴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开始，共和军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和其他契约劳役，以吸收那些愿意加入独立军的人。1870年西班牙宣布逐渐废除奴隶制，1880年，西班牙国王宣布所有现存奴隶成为庇护人保护下的契约劳役。1886年10月7日，剩余两万五千名庇护人保护下的契约劳役获得解放。

西南非人民组织（South-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

1960年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使纳米比亚从南非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与安哥拉南部的古巴-安哥拉军队共同作战，从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以后，一直领导纳米比亚政府。

地方国民自卫军（Territorial Troop Militia）

1980年为抵制帝国主义威胁而建立的全国性志愿者自卫军，由150万工人、农民、学生、家庭主妇组成。他们在空闲时间训练并协助筹措军事资金。

约瑟普•布洛兹•铁托（Tito，Josip Broz）

（1902～1980）从1939年起任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在194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敌后游击队运动，抵抗纳粹。1945～1980年先任南斯拉夫总理，后任南斯拉夫总统。

何塞•托隆（Tolón，Jose）

古巴独立军中在中国出生的军官，参加了三次古巴抗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战争，上尉军衔。

费利克斯•托罗雷斯（Torres，Félix）

（1917～）在拉斯比亚斯北部的亚瓜哈伊指挥人民社会党游击队，于1958年末同卡米洛•西恩富格斯起义军纵队合作。

拉斐尔•特雷赫（Trejo，Rafael）

（1910～1930）哈瓦那法学院学生机构主席，1930年9月30日在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游行活动中，被警方杀害。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National Ul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

1996年成立，抗击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组织，由乔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领导。1975年，随着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垮台，其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美帝国主义结盟，企图推翻由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新建立的南非政府。在其后25年间，安盟发动反安哥拉政府恐怖主义战争，杀害成千上万安哥拉人民。1992年签署和平协议后，安盟参加选举，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继续进行内战。2002年2月，安盟领导人乔纳斯•萨文比死于一场伏击战。一个月后，安盟与安哥拉政府签定停战协定。

紧急法庭（Urgency Courts）

1934年6月，巴蒂斯塔政权建立的法庭。目的是为了审判政治犯以及与巴蒂斯塔政权持不同政见者。革命胜利后，紧急法庭被废除。

拉米罗•瓦尔德斯（Valdés，Ramiro）

（1932～）卡车司机，木匠。1953年参与了攻打蒙卡达兵营，被判入狱10年。1955年5月在特赦中被释放，参加“格拉玛号”远征。马埃斯特腊山起义军第四纵队的第二指挥，后来任指挥官。在拉斯比亚斯省格瓦

拉指挥的第八纵队任第二指挥。分别于1961～1968年、1979～1985年期间任内务部部长，从1965年开始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5～1986年任政治局委员。他是拥有“革命司令”头衔的马埃斯特腊三斗士之一。

内尔•凡•埃尔登（Van Heerden, Neil）

（1939～）20世纪80年代任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外交部主任，在安哥拉战争结束时，参与同古巴和安哥拉的谈判。1996～2005年，任南非基金会执行董事，此基金会代表国家的60家最大的资本家企业。

哈里•比耶加斯（Villegas, Harry）

（1940～）1957年参加起义军，成为切•格瓦拉第四、第八纵队护卫队成员。1965年与格瓦拉在刚果，后来在玻利维亚一同工作，是游击运动参谋部成员。1967年10月格瓦拉遇害后，他指挥在玻利维亚军队围攻中逃脱的幸存战士，于1968年3月返回古巴。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三次返回安哥拉。“革命武装力量”准将（退休），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家议会代表，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执行副主席。领导爱国军秘书处和国际主义工作。1995年被授予“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

本杰明•苏木内尔•维耶斯（Welles, Benjamin Sumner）

（1892～1962）美国副国务卿，1933年被罗斯福总统

指派为驻古巴大使，从独裁者赫拉尔多•马查多那里组织调动力量，企图扼杀革命的成长。他的努力导致建立了前帝国主义塞斯派蒂斯政府，该政府成立几周后倒台。

何塞•黄（Wong，José）

（1898～1930）中国广州革命者，1927年左右抵达古巴，华人区工农保护联盟的领导人。后加入古巴共产党，创办中文报纸《工农之声》（Worker-Peasant Call），担任编辑。1930年5月被捕，与其他共产党领袖一起被关押在哈瓦那普林斯普堡。3个月后，在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暗杀中，被马查多特工在牢房中勒死。

劳动青年军（Youth Army of Labor）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由那些在参加军事训练的同时还从事农业、建筑和其他工作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按照各自的工作类别取得报酬。

译者后记

古巴，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对于它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我们知之甚少，或许我们对古巴的唯一印象，便是时尚文化衫上印着的头戴红色五角星贝雷帽的切·格瓦拉像。对于我们，古巴到底意味着什么？

儿时常听爸爸讲起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龄一边游行一边高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以此支持古巴的革命，反对美国的封锁。当年一首《美丽的哈瓦那》唱遍全中国，有多少年轻人为格瓦拉、卡斯特罗等领袖的魅力倾倒。古巴以其独有的魅力感染了中国的一代人。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新的一代似乎完全忘记了古巴这个远在加勒比海的国度，完全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给我们民族精神上带来的伟大震撼。但是古巴的历史仍然在被古巴人民一代代书写，这些被中国新一代忽视的历史并没有被世界所遗忘，来自世界各地的追求自由、追求公正的人，依然在关注着古巴这片热土。美国记者沃特斯便是其中一人，她带着对古巴的深厚感情写下了这本书，我希望通过我的译文能将这种感情传达给所有同样关注古巴、想要了解古巴的中国人。

虽然我没有从南走到北，踏遍世界上每一寸土地，更说不上见多识广，然而从北半球的荷兰到南半球的新西兰，这五年异域生活使我对西方文明也略有所知，对在异域生活的华人更有所了解。

在国外生活的五年中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第一件是在新西兰参观的华人文物资料展，其间展示了很多20世纪西方人画的讽刺画。画中华人几乎都被描绘成留着一条小辫子、爆牙、两撇小胡子、眯缝眼、留着长指甲的形象，让人一看便会联想到奸邪小人。漫画内容也大都是反映华人来到新西兰后开洗衣店、开餐馆、当苦力从而造成新西兰本国公民失业的内容。事到如今，虽然华人在西方的地位已大有提高，然而西方人仍普遍认为中国人只能从事两个职业：开餐馆和算术（因为我国文革后，基础教育抓得好；从小学起，每一位中国学生都被要求笔算而坚决不允许使用计算器，因此造成中国人数学成绩普遍要超过外国人数倍）。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荷兰念书时，一位来自喀麦隆的黑人同学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便告诉我他们国家也有很多中国人，并且说我一定是很会做菜的。我当时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这么肯定我会做菜？他说：因为在他们国家的中国人都是开餐馆的，所以他觉得中国人都很会做饭。谢天谢地他没有觉得中国人都“只”会做饭。从最发达的美国到并不发达的非洲，中国人似乎都在从事着做饭这一相同的职业，难道中国人真的只会做饭吗？

近些年美国出了不少杰出华人，然而对于整个华人社会来说这是微乎其微的。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我也在餐馆工作过，几乎我周围的每一位中国同胞都有在餐馆工作的经验（包括在荷兰乃至新西兰土生土长的华人后

裔），这么看来中国人似乎真的只是会做饭了。不，现在除了做饭还多了另一个职业，就是IT工作的基础程序员，因为计算机程序也是有关算术方面的应用学科。

当我们同期毕业的十几名中国学生欣喜地拿着工商管理学学士文凭时，大家都踌躇满志地想要在阿姆斯特丹的各大、中、小企业中一展鸿图。然而，国外法律中对于雇用非本国人员的种种限制，使我们在各大、中、小企业参观了一圈后不得不再次回到唐人街的后厨打黑工。

国外有很多制度对中国人有限制，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签证问题。美国人去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可以免签证的，而中国人不但要办理签证还要冒着莫名其妙被拒签的风险。当然这其中也有中国人自身的问题，比如某些中国人酷爱偷渡，并乐此不疲。然而，这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差别对待有时不免让我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我没有一个美国爸爸啊！”有时我甚至会产生一种中国人就是不如外国人有价值的错觉。

但是一个人改变了我的观点，让我重新考虑一切的一切。

这个人就是邵黄将军，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读到一篇介绍他作为一名华人后裔如何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名古巴的将军，并担任劳尔的秘书时，我以为这都是瞎编乱造的内容，“古巴华人将军，哼！怎么可能？华人只配在厨房工作，怎能越过俎案成为领导？”我一度是这样想的。内心那种长久被压抑的潜在的民族自尊迫使

我偷偷开始寻找一些关于邵黄将军的资料。万幸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这本名为《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的访谈录，这本书通过对邵黄将军以及蔡、崔两位华裔将军的访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古巴的近现代史。

当我一页页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震惊了！古巴历史上除了邵黄将军外，还有很多华人都为古巴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在政治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何塞·黄、何塞·卜、何塞·托龙·黎华、阿曼多·蔡、古斯塔沃·崔等，这些华人为中国人的海外史谱写了震人心肺的篇章。

看来中国人并非生来就是给人做饭的，中国人也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差，生为一个中国人并不是可悲的，更不是可耻的！那么古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华人在这个国家里具有在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地位呢？邵黄将军说："……就在于在古巴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消灭了以肤色决定优劣的种族主义。从更高的角度讲，这一革命清除了经济上和社会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

消灭种族主义，消灭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所带给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的外国人无论肤色如何，无论是否富有都会得到善待，甚至热情的款待。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一书通过采访邵黄将军、崔将军以及蔡将军，反映了他们所经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

命，以及革命前后的古巴状况。他们亲自为我们讲述了在古巴的华人的奋斗状况，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们并非站在一个特殊的人种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古巴的立场上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共同为古巴的解放而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种族之分，只有争取自由的双手。

■

感谢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给我提供的这次翻译机会；感谢父母一直以来对我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帮助；感谢王新民导演对我的指导和鼓励；感谢张明智先生、刘向群先生对我的信任，为我提供《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的英文原著；感谢张芝兰女士、刘国华先生提供的古巴相关历史资料；感谢王路迪、孟冉、Charo Costa Canovas对本书西班牙语部分的翻译；感谢王平女士的校译；感谢赵海先生为出版本书所做的努力；感谢玛丽-爱丽丝·沃特斯女士及探路者出版社在本书翻译及出版的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所有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理解和支持的人们，没有你们我将不可能完成此书的翻译。谢谢！

那些不会为了其他人的自由而斗争的人，

也不会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而进行斗争。

——菲德尔·卡斯特罗

责任编辑：李　潇　殷亚敏
选题策划：张芝兰　向　群
封面设计：晓　燕　路　沙

阿曼多·蒙、古斯塔沃·雷和莫伊塞斯·都贵，三位华裔古巴青年，经过地下斗争和 1956 ～ 1958 年的革命战争洗礼，逐渐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正是这场战争推翻了美国支持下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打开了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他们一生中的革命事迹，使他们成为了古巴革命军中的将军。通过他们在本书中为我们所讲述的关于古巴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到是什么使古巴获得了新生，并为我们开创了新纪元。

我们看到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些统治者视而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拒绝接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生活，为了他们的梦想走上历史舞台，改变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自己获得了全新的自我。

ISBN 978-7-80247-331-7
9 787802 473317 >
ISBN 978-7-80247-331-7/K·
(2368) 定价：28.00 元

P9-CXR-610